



第十三辑

韶關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 抗日战争前粤北教育事业概况·····梁观福(1)
- 韶关早期办学情况及其他·····许宗熙(12)
- 韶关私立德华女子中学·····华细英(16)
- 抗战时期在粤北的穗港澳学校·····杨发麟(24)
- 中大在坪石回忆片断·····何 湘(36)
- 志锐中学十年·····欧 准(40)
- 抗战时期迁韶的广州女师·····冼鸿遇(46)
- 植桢中学在粤北·····黄植农(50)
- 九龄农学院创办纪实·····黄兴亚(57)
- 师表长留演武厅
- 记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之叶应科先生·····侯崇言(65)
- 过去·····(台湾)叶世强(68)
- 民国时期曲江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黄开光·····黄兴亚(72)
- 韶州师范老校长黄焕福·····侯崇言(76)
- 李沛文与坪石岭南农学院·····李锡龄 杨国威(83)
- 刘荣基教授在韶关工作二三事·····黄兴亚 冼鸿遇(86)
- 艰苦办学、为革命捐躯的徐尚同校长·····侯崇言(91)
- 李心钧先生生平史略·····何希贤 谢君豪(97)
- 韶关体育界老前辈司徒显·····龚伟平(108)
- 始兴留穗同学会成立经过和活动简况·····饶纪寰(112)
- 坪石小忆·····(香港)叶惠恒(115)
- 抗战期间的韶关粤剧·····唐志琨(117)

解放前韶关的文化活动·····	苏 信(122)
忆韶关新建设出版社·····	陈 荡(127)
爱国艺人关德兴·····	王斯德(134)
民俗学家张清水·····	刘坚南(139)
附：容肇祖教授回忆张清水情况的复信·····	(145)
回顾国画家许筠台·····	邱占宜(148)
忆西南作物品种改良繁殖场·····	谭 报(152)

抗战前后粤北医疗卫生概况·····	张念希(155)
解放前曲江循道医院·····	张玉俊(160)
抗战时创建的广东省立医院·····	赵秀生(171)
抗战后期的一七七医院·····	陈劲、何桃(175)
抗战时期的一八二医院·····	刘远廷、谢彦枚(183)
韶关名中医李仁溥·····	张念希(186)
毕生从事医疗事业的李精龙·····	甘非比(192)
记陈大勋中医师·····	李子德、张艺(198)
把一生献给护理教育事业的陈爱心·····	黄筱曼(205)
解放前韶关市私立医院、个体诊所调查表·····	张汝开(212)

在韶关青年会的国际友人骆爱华·····	谢琼孙等(218)
利玛窦在韶州·····	梁观福(223)

· 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

仁化云龙寺塔·····	张树棠(229)
南雄三影塔·····	庄礼味(232)

· 小资料 · (六则)

抗日战争前粤北教育事业概况

梁观福

粤北教育事业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28年粤省北区善后委员会公署（以下简称北区公署）和1932年粤省西北区绥靖委员会公署（以下简称西北区公署）相继成立后——为粤北教育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使粤北的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就所掌握的有关史料，将粤北这一时期（重点1928年至1934年）的教育事业状况分述如下。

一、教育行政情况

1906年后，粤北韶州府及所属各县，按学部奏定的劝学所章程规定，改前教育管理机构——教谕署为劝学所，每所设视学一人，兼充教务总督，负责当地劝导从学、劝捐办学和教育管理等工作。后来劝学所裁并，另置学务委员。辛亥革命后，粤北有些县成立督学局。1915年各县奉令恢复劝学所，均设所长一人，劝学员二三人不等，佐县知事办理教学行政事宜。1923年又改为教育局。当时的教育行政机构，由于地方多故，可说是不太健全的。

北区公署期间，对粤北的教育事业有所重视。在健全各县教育机构上，曾于1928年7月通令没有设立教育局的县，限期两个月内成立。在配备县教育局长问题上，为反对以往

“滥竽备位”的做法，于是年颁布了教育局长任用资格条例。条例指出：教育局长“关系到全县教育之兴衰，至为重要”。因此规定，凡有下列条件之一者，才能充任县教育局局长：曾在国内外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毕业，取有毕业证书者或曾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取有毕业证书者。同时，还要求各县政府对该县现有教育局长，如有不合格者，应即改委补充。据查，当时曲江和连山等县接到通知后，很快就将本县教育局长情况列表上报。1932年西北区公署成立后，对各县教育局长的配备，也提出过须挑选既有学识又有相当资格的人担任的要求。

1934年间，粤北大部分县设管教育的第三科，配科长一人，科员一至二人不等。此外，始兴、仁化、乐昌、连山、连县、南雄等县政府内还设有教育科，配科长一人，科员一至二人不等。

为便于教学管理，1928年7月，北区公署奉省教厅之命，通令所属各县以县行政区域划分学区，并按学区成立校董会。各县基本实行。当时的区校董会由该区内各乡推一人组成，负责管理该区内之学务及经费等事宜。

1932年间，曲江、乐昌、英德、始兴等县还设有教育委员会，各重点学校设有学生自治会。曲江县还有教职员联合会。曲江、乐昌、仁化等县设有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

民国初一段时间，粤北各县不少重点学校校长，多由当地要职人员担任，或安排亲信充之，也有由发起办学者的担任。二十年代起当选校长的资格逐渐严格。1928年7月，北区公署为改变过去配备校长存在“用非所学，或滥竽备位”的做法，颁布了各级学校校长任用资格条例：①曾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取有毕业证书者；②曾在初级师范学校本科毕业

取有毕业证书者；③曾在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取有毕业证书，并办理学务五年以上卓有成绩者，并要求各地要按此条例执行。至于公私立初级学校校长，也作出相应的规定。当时，南雄、曲江、翁源、连县、连山、乳源等县，对所属学校不合格的校长如实上报，待后更换。可以看出，当局对教育行政领导和校长的配备问题是比较注重的。

二、教育经费及其管理

抗战前的粤北教育经费来源，除省属学校有部分专款下拨外，大都由当地钱粮项拨助，以及铺屋、田地和其它租税、学生学费。另外也有一些地方名人士绅资助。尽管如此，1928年至1934年间，粤北各县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困难的。

为解决教育经费困难，1928年7月，北区公署作了一些规定：①各县普及初级小学经费，除原有之外，不足部分，由各县钱粮税契附加补足；②各县纸烟、洋烟、色酒税，增加10%，用作教育经费；③各县庙尝、神会，以及各族学田、蒸尝等费，除留部分费用外，均悉数拨归当地办学之用；④各县地方税，应一律按标准拨作教育经费。

为了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北区公署1928年在《广东北区各属县地方财政委员会章程》规定：在各县地方财政委员会中，专设教育经费出纳股，该股主任应由教育界所选出的本会委员兼任，负责教育经费的计划拨发以及监督等事宜。至于县属各区教育经费的管理，规定由该区校董会负责。

西北区公署期间，对教育经费问题也颇为重视。如公署成立后的第一次大会上，就教育经费应如何补充作出专门议

案来讨论。会上，公署委员李汉魂强调指出：“欲学校办理完备和教育普及，必有待教育经费的充足。欲改善教育和谋教育之推广以至普及，必须谋教育经费的独立与增加。”大会认为：教育经费为教育之命脉，必须设法增加。为此，作出了如下决定，令飭各县执行：一是实行教育经费在各县财政独立。组织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管理本县教育经费；二是设法增筹教育经费。其措施：①各县商行由县政府加收烟酒屠二成，解缴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以作推广教育事业之用；②各学校励行造林，以充各该校经费；③组织庙尝书贍委员会，派员分赴各乡调查神庙尝产、书田贍学，将其产业尝费按规定提作办学经费；④各县推行举报工作。各区乡如有举报公团神会尝款变卖得款者，将所得之款，扣出二成，以奖赏之。

1928年至1935年间，粤北部分县的教育经费情况大致如下：乐昌1928年约54000元，1933年为80264元；翁源1928年为13800元，1932年为36200元；连县1928年55492元；仁化1928年增加1500元，1934年8400元；曲江除韶师和外籍人办校外，1932年约44000元，1934年约43818元，1935年为78749元；南雄1932年14580元；阳山1932年6350元；乳源1928年13800元。这些数字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出当时教育经费的状况，但也可以看出是有所增加的。

三、中学和师范教育

清末至抗战前的粤北中学教育，称中等教育。师范教育称师资培训或培植师资，亦属于中学或中等教育范围。为记述方便，现分中学和师范教育进行介绍。

粤北的中学教育，亦是在清末兴起的。1903年，韶州南韶连道奉“各洲郡倡办中学”的谕旨，改北江书院为北江高等中学堂（后改韶州中学），1913年又改为韶州中学校。至1928年粤北开展中等教育的有：曲江、连县、始兴、仁化、翁源、南雄、乐昌等县，多属初中。其中，间数最多的要推曲江，除韶州中学外，还有县立中学和德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德华女子学校。

至1934年，粤北的中学教育有一定的发展。除乳源没有外，各县均设有中学。其中曲江四间，清远三间；南雄、始兴、乐昌、英德、连县、翁源、连山、阳山、仁化各一间，而南雄的为省立第六中学。

1932年4月，西北区公署鉴于本区各县高级中学甚少，“为奖进高才，振兴教育起见”，作出各高级中学设立高中公费留宿生，招考确系贫苦之高才生，送入已立案之高中就读的规定。为确保其经费，还规定各县教育局在当地教育经费项下，酌量拨给。

粤北的师范教育，是在清末兴新学入学者增多，师资日益紧缺的情况下兴起的。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始规定师范教育制度。几年后，粤北逐渐开办师范教育。早期的师范教育，只是在本地中学或高级小学内开设简易师范讲习所、速成师范科（班）或简易师范科（班）来进行。如1906年乐昌县立中学堂，就开设简易师范讲习所一班。1913年又开办单级师范一班，1918年又办师范讲习所一班。当时师资受训的时间短则六个月，长则一两年不等。

1928年前，粤北师范教育开设班数较多，设立专门学校的县是曲江。1906年7月，曲江县城开设官立初级速成师范科，招生60人，半年毕业。同年，韶州中学堂招收简易师范

一班，60人，一年毕业。私立德华女子学校于1915年增设师范班，开设有一年毕业速成师范和三年毕业简易师范两种，招生延续12年。1926年前后，意大利天主教会在曲江县城，创办私立励群师范男女两校，均属三年毕业的简易师范。经办时间不长，是外籍人在粤北创办较早的私立专门学校。1921年，由原省立第二中学校（即前韶州中学）改办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是粤北最早、最正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间，素称粤北师资培植之总汇。

1928年，北区公署成立后，为普及全区小学教育之需，曾两度通令各县开展师资培训工作。同年7月，公署鉴于“教育人才，端赖师资”、“县师资又异常缺乏”，通令各县开办师范讲习所，开设三民主义、各科教授法、管理办法、算术、体育、唱歌、图画等科目。时间于本年7月15日起三个月毕业，次年春季即出任各小学教师。为了确保办学经费和学员质量，规定讲习所经费由县地方财政管理委员会拨给。1930年，北区公署再次飭令各县开办小学教员讲习所，并规定凡不合格的小学教员（合格的自愿），都应参加当地小学教员讲习所学习和补习。

1932年，西北公署为推广乡村师范教育也做了一些工作。当年暑假后，规定每县至少筹办乡村师范学校一间。如确有财力困难，一时不能开办者，应在该县原有的中学内，附设乡村师范科或乡村师范班。

粤北的师范教育，除上述形式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方式进行。1928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北江公署还在韶州举办北区夏令教员讲习所，聘请各地名流分科讲演。规定本区各高小以上专科教员和新任教员，均须参加。此外，1933年连县还输送学员，参加省立小学教员函授学校学习。

四、小学教育

抗战前的粤北小学，从体制或性质可分为公立和私立（含私塾）两类，从等级上又可分为高级、初级和完全小学三类。

1928年七、八月间，北区公署为普及粤北小学教育，作了如下规定：第一，从速调查各区内学龄儿童，限期成立初级小学，保证次年春开学。具体办法和要求：一村内设有高初小学的，初小必须附属于高小；一村内因经费不足，不能单独设立一校的，应联合附近村落共同设立；各具各区小学开办经费，由各区自行筹备；第二，试行强迫入学。规定适龄儿童一律强迫入学，先在县城和圩镇试行，然后推至乡间；第三，取缔和改良私塾。当时，私塾在各县都大量存在。1928年，曾两次通令各县取缔私塾，并按有关私立小学的规定对私塾进行改造。所需经费，由办学人自行解决，对原有塾师经过甄审，凡具备小学教员资格者，方能施教。1932年4月，西北区公署对私塾应如何取缔改良，也专门作出议案。

粤北各县私塾，在多次严令取缔和改良下，各县城内，至1934年已大部分取缔，改为私立小学。但由于旧科举积习相沿日久，陈旧思想尚未改变，所以，乡村中私塾仍大量存在，一直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被彻底取消。

在普及和筹增小学问题上，1932年4月，北区公署在大会上强调指出：本区各县小学在量的方面极力扩充，鉴于目前失学儿童实居多数，必须筹增小学，并采取如下措施：①每区设立高小一间以上；②每乡人口满二百户者，至少应设

初级小学一间；③以上各项应责成各区、乡公所负责筹办，随期三个月内完成，其经费由各区乡自筹。

五、职业教育

抗战前的粤北职业教育，除师范学校外，没有其他正规职业学校的设立。而当时的职业教育，多在一些普通学校中进行，开展得较早的是曲江县。1912年韶州中学曾招收甲种农业一个班，于1914年毕业。

1928年7月，北区署为推行职业教育做了如下两件事：

第一，公署会议上通过了《教育职业化案》，飭令各县执行。提出：①近农村的学校宜使其农业化；②近山村是学校宜使林业化；③近工场的学校宜使其工业化；④近商场之学校宜使其商业化。总之，办学校应根据地处不同，适当增加实用学科，灌输实用的知识于学生。

第二，根据粤北山区林业的特点，推广林业职业教育和培训林业职业教育人员，决定1929年春由曲江教育经费项下拨出一千多元，在曲江城举办蚕业讲习所一间，聘请中山大学农科学院教师授课。并规定曲江办起后，推广到各县。

西北区公署时期，对职业教育也颇注重。1932年曾做出决议，制订具体办法：①各县如有当地特色之工艺技能者，应设立该种工艺技术学校；②各县应依地地方的需要，设立职业学校一所，举办职业农、林、蚕桑或水产等科，如不能单独设立的，可在现有初中或高小内附设职业班；③各县根据当地情况，多设各种职业补习学校或夜校，对已有职业或失学者，授以日常生活必需知识，以及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

在推行职业教育中，西北区公署注意做好试点工作。1932年底，在南雄开办一间民众职业实验学校，教学时间和课程为三分一耕田，三分一学工，三分一读书，采取教、学、做相结合的方法。所学的工业技能，是一些简单的化学和纺织手工业，如造电池、竹器、织布、织袜、织毛巾、车衣服等。

1933年，西北区公署通令各县，凡未办有初级农工职业学校的县，至少成立一间，如确有困难的，应在现有学校附设职业班，发展初级职业教育。为振兴粤北农业，培养农业人才，西北区公署于同年三月，在曲江城抗日路旧镇台衙门内，创办了一所西北区农业讲习所。林友松任所长，欧技正、华清任副所长。第一期共开两班，男生班218名，毕业生199名；女生班78名，合格者40名。这期粤北各县毕业的学员，多被派往各县农业机关工作。

1932年，曲江县设有平民工艺厂一间，因经费不足只设木工一科，利用晚上上课，白天做小手工业的办法进行职业教育。1934年，仁化县立乡村师范，开设女子职业一个班。同年，曲江县城设有平民工艺厂两所，一间私立开明工科职业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德国基督教会在曲江开办的私立德华女子中学，也附设盲女班，招收学生12名，进行针织技能教育。

六、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是指通过民众教育馆、夜校、识字班等场所和形式，对社会民众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教育。粤北的民众教育，考其源流早在清代就开始了，当时称为“义学”。民

国后，不少的县也采用一些形式开展民众教育。

1928年与1932年，北区公署与西北公署均先后通令各县要重视民众教育，推行识字运动，以挽救失学男女，减少文盲。并分别制定推行民众教育的措施与办法。

这段时期，粤北各县的民众教育有所发展。如成立民众教育馆，开展民众教育就是其中一个标志。据1934年统计，成立民众教育馆的有始兴、曲江、南雄、清远等县。开办民众学校（或称平民学校；也有称夜校的），进行民众教育，是当时的主要形式。据有关资料统计，1928年，始兴一间（60人）；1930年，曲江一间（30人）；1931年，曲江7间、乐昌2间；1932年，始兴、南雄、阳山各1间，乐昌、翁源、英德各2间，连县30间；1934年，曲江2间、阳山3间、清远6间、连县21间。

在粤北的民众教育中，开展得比较正规而成绩又较为可观的应推曲江城内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该校1928年前后就开展民众教育。1933年，鉴于本地失学儿童众多，又恢复民众教育。首先在本校内开设民众夜校一间。有明确的办学章程，以辅助平民识字，促进民众文化为宗旨。第一期共招收城内失学儿童93名，分为具有小学二三年级程度者、略识字者不识字者三个班级。上课时间，除例假外，每日下午六时至八时。课程有党义、国语（分作文、写字、语言、信札等科）、算术（分笔算、珠算两科）、常识、唱歌等。以五个月为毕业。

为使民众教育向乡村推行，同年韶师还于城北皇岗山下的大冲窑（即现北江畜牧公司内），开设民众第一分校（日校）一间。主要招收附近农村失学儿童，第一届招收32名，分略识字和不识字两个班级，以一年为毕业。上课时间，除

例假外，每日上午八时至十时，下午十二时至三时。所学课程比上述夜校增加园艺、音乐、体育三科。

韶师在开展上述两校的民众教育中，除有各项章程制度外，为对民众实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导，还在韶师选出黄道琴、李达能、林永春三名教职员，组成民众学校指导委员会。此外，民众学校还设主任干事（苏春平）、教务干事（沈斐然）、事务干事（罗秀麟）、训育干事（华秉琦）和雷英才、秦玉华等三名班主任，负责民众学校的教学和有关事宜。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续编》，1928年；
- 《广东北区善后委员会公署月刊》，1928年、1929年；
- 《广东西北区绥靖会议专刊》，1932年；
- 《广东西北区绥靖月刊》，1933年；
- 《三师概览》，1933年；
- 《三师学生》，1934年；
- 《广东全省地方纪要》，1934年。

韶关早期办学情况及其他

许宗熙

民国初年，在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韶关的一大批老知识分子，接受了新的学说，新的思想。他们行动起来，利用当地的寺观祠庙的房舍、田产，办起了除省立中学及私立小学外的三间高等小学、九间初等小学。另还发动广大士绅殷商，捐资兴学。井巷许氏宗族，利用许家花园作校舍，并办私立修齐女子小学，大概在1919年左右才改为公立，拨给经费，更名为县立第三高等女子小学（详见本刊第九辑）。此外，还有城内的达德小学、河西的务本小学、东河的墨江小学，极一时之盛。

当时，韶关最高学府为“省立韶州中学堂”，系利用相江、韶阳两间最大的书院为校址，接收整顿院产为校产。第一任监督为许祖端。原改为“省立二中”，迁往广州越华路。因此，又在原址办起省立“三师”，校长为黄遵庚，系晚清诗人梅县黄遵宪先生之弟。后因军队占住校舍，逼得在韶阳书院不正常地上课，因此班级及学生人数甚少。1929年左右，黄焕福接长“三师”，将学校搬回相江书院，除原有初中班级外，先后开办了高中师范科，高中农科，简易师范或乡村师范、幼稚师范，并附设初中及小学部。后又改为“省立韶州师范学校”。黄焕福长校二十年，招收各地学生，特别是韶属英德、乐昌、仁化等县子弟，扩大了学校规模，收回及扩建了校舍，清理和接收旧书院存款，拍卖茂林

园（府学宫东邻）校产，建筑附小校舍。

韶关的曲江书院，在始巷头裁废书院后，用来办曲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为叶应科。为县校模范小学。设有军乐队，穿制服，列队巡行时担任前导，队伍严肃、整齐。县立“二高”在韶关法院东邻，原为资福寺，以校产多在东乡，所以校长教员多为东乡人，曾一度称为“东水学校”。县立“三高”是县校首倡穿统一校服及器械体操的学校，校长为庞淑卿。1926年辞去职务，由黄幅雄担任校长，迁校至下后街，男女生不分校。原该校裁撤学生并于其它小学。市内还有九间初小、分别设于大鉴寺、三界庙、吕祖阁、义仓、文昌宫、赵公庙等地，多为复式教学，后来因经费不足，陆续裁并。

当时中小学制采用四二四三制或称四二制。即：四年中学、两年预科、三年高小、四年初小。四年初小，又称为国民小学，即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制。三十年代推行新学制，废预科，改为三年高中，三年初中，并高、初小学为完全小学，实施六年一贯义务教育制，简称为“三三制”。

至于外国教会在华传教，兴办学校、医院等教育慈善事业，虽具有殖民主义者的某种目的，但对开道民智、倡导科学，也有一定作用，不可偏废。当时，韶关有四股教会力量在从事争取教会青年工作。他们的力量可以达到穷乡僻壤、山沟荒野，为政府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

一、韶关循道会，办了英光男、女小学、河西医院及进德会、礼拜堂等，使用的语言是广州话。其广州堂惠师礼牧师（英人），创造了许多广东话汉字，翻译了广州语《圣经》。在乐昌、英德、曲江、樟市、桂头有其分支机构，并和香港卫理公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佛山华英中学、协和神学院等有

联系，以香港为大本营，与长江流域的青年会有联系。“英光”的男女校长，都是英人，说英语、唱英文校歌。自从“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以及汉口、九江英租界之收回，工作开始衰落，学校停办，英人回国，医院、教堂，委由中国人料理。其中，杨伯诚医师祖籍福建，入籍韶关（日本东京帝大医学博士），范亦峰医师（英德人）继续经营河西医院，一年以后亦结束，改办济群医院。教堂及进德会犹存，由该西医院培养出来的助产士谢淑英（人称陈师奶）陈幸慈、侯慧姬（人称大姑）、许宗霞等，都分别在曲江、乐昌两地开设保产医社，基本普及了西法接生，开创了妇幼保健事业。谢、陈还利用职业关系，掩护和收留过烈士遗属多年，解放后始为人知。此外，还培养了陈克汉、范秀阁、王小鲁、龚善初、龚善同等军医人才，均挂牌开业，服务社会。

二、天主教会在韶关设立南韶建教区和主教府，受罗马教廷及南京中国总主教于斌所管辖，俨然象我国行政区域建制，办理他们教会事务。该教区初在河西民建校后，迁城内正式设立“励群制鞋工艺学校”、“励群男、女中小学”及育婴堂等。励群学校估计在廿年代即已设立。笔者在1926年下半年曾在励群初中或师范（初办时不明确）就学，那时叶应科教数学及教育心理学，邓成基教国文，温副主教及容神父教英文，校长是意人毕加里神父。励群学校在清曲江县衙废址及师井头钟、招两家宅第建成。学生晨起睡前及每顿饭前，必须念天主教的祷文，在胸前划十字架，守礼拜，做弥撒，念经唱诗歌、忏悔、祷告，一如小说《牛虻》所述。这对受过1925—1927年大革命洗礼的青年学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一次，有的学生，自发地振臂高呼：“打倒毕加里”

的口号。由于这次“闹学潮”，我被劝告离开了该校。

三、德国巴陵会在城东南门外购地设教堂，办理女子学校。该校是否经教育部门批准立案，校长、校董是谁？不得而知。后来洋人回国，也停办了。这个教会说客语，在高雄、始兴均有分支机构。

四、美国侵信会在韶关风度中路设礼拜堂，在现市委宿舍东南角设再生医院筹各处，在东河有普光孤儿院。但这个教会历史较短，洋人亦早已回国，由英德人潘允源、潘允和医生管理，讲客话。

此外，在这一段期间，当时的士绅及知识界还研究和推行了地方自治，成立县议事局，以邓孟熊（字兆初）为议长，许德彝（字炽传）为总干事，作为做政、评政机构。后来停办了，改办汉医会（在祀庙街龙王庙，后停办）、劝学所。以后，发动群众办理及维护会馆、善堂、义庄、养老院、消防队等慈善社团，颇著成效。其中汉医会，还组织全市名医师邓兆初、周凤歧、魏玉堂、叶德宫、吴粤昌等办理赠医业务。此外，在1917年还推选邑人林熙畴为民选县长，选派有志青年如邓汉铮、许德宣、邓云龙等赴广州攻读法政、工专、测量等专业，学成回乡服务。在此之前，曾动员叶应科、李宗尧两位前清秀才就读于两广优级师范，黄开光、虞竣修等就读于高等师范，培养了人才。林熙畴系清代末科拔贡，后任广州法院推事，在上海执律师业。其弟林熙绩亦任推事，后与李玉龙、李皓等在韶营律师业。这些师范及司法、工专毕业生，以及当地名流邓成基、许祖业、谭人俊、许应锡、黄一存、刘瑶江等，成为当时有名的教师，受到人们尊敬。（刘萍整理）

（作者简介见本刊第11辑）

韶关私立德华女子中学

华细英

在旧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妇女，都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枷锁束缚下，使她们失去了入学读书、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从清末康梁改良派的新主张，提出废科举、办新学、革固鼎新的号角吹起，接着是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使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大。“五四”爱国运动新潮的掀起，冲破了孔孟之道的堡垒。于是，我国教育旧制，才得解体，进而适应时代潮流，走上革新道路。从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兴办学校，妇女开始得以入学。

民国初年，由韶关当地基督教会，首先创办起一间唯一的纯女生的学校，那就是“韶关私立德华女子中学”。该校附设有女子小学部和盲女班。三十年代初期，我是该校女小部的一名小学生，在德华小学上学多年。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历历在目，现将当时该校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一、创校时间与人事组织

私立德华女子中学（包括小学部与盲女班）。是韶关最早的由当地基督教会于民国初年所创办起来的一间全女性的中小学。具体诞生年月未详。该校在人事组织上，有个校董会，董事长一职，是由德国籍主教（牧师）担任，并肩负全

校主要领导责任。下为校长和教务主任，是由校董会聘任，以主持校内日常有关行政和教学事务。一般教师（包括中、小学部的）多从教会人员中选聘。当时学校的董事长，先后有两位德籍姑娘，一个叫邓姑娘，另一个叫美姑娘。校长张春荣（曲江马坝人），教务主任方柏西（广州人），校医是一位德籍的徐姑娘，盲女班的主任教师江××（女盲人，忘其名）。中、小学教师，有的同任未分。我记得当年在校的部分教师，计有教地理的刘国钧，教体育的华重新（女），五年级的宋××（女，忘其名），六年级的刘君振。其他有些中、小学教师，因年深日久，已经忘记。只闻早年曾在该校担任过英文的有黄开光先生，以及担任过图画的许筠台先生，这两位教师都是当年韶关的知名人士。

二、学制与课程

学制：初中三年，小学六年，课程读完，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发给文凭。盲女班，作为当时社会慈善福利救济事业开设的，该班学生皆入学留校，长期教养。有的于年长结婚，也可离校自行生活，并无限制。

课程：中学（初中）计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历史、地理、植物、卫生、公民、图画、劳作（手工）、音乐、体育等科目。小学计有国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等科。盲女班只有国文、算术（珠算）、音乐、手工（劳作）。

三、班级与人数

当时中学部只有初中一至三年级，每级一个班，计初中

三个班；小学一至六年级，每级一个班，计小学六个班。另盲女一个班。全校总计十个班，每班平均约四十人，连同在校的教职员二十余人，全校师生员工总计约四百余人。

四、学生来源及其学年年龄

学生多是教会中人士的子女。此外，就是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子女。除韶关本市外，遍及邻近各县，如南雄、始兴、仁化、曲江、乐昌、英德等城乡地区的女子。另外，盲女班的学生，都是直接收自社会一些无依无靠的盲女入校，她们作为长期教养，以安置其生活和学艺的。这也是符合当时教会所谓施行慈善救济福利事业宗旨的。全校学生一般年龄偏大，因为当时招生不限年龄，有的初中习生，已上了二十多岁。小学生中，有的高至十七八岁。盲女生也不例外。那时，一般女生，虽已超过了入学年龄，但面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女校初办之时，刚好碰上有入学求读机会，所以，年龄大些也争取入学。当时，在一般家长的眼里，已看到时代不同了，男女同样要受教育，觉得自己的女儿，今天入校，能识多几个字，总比一世文盲好。他们考虑到女儿上学读书，一方面，有利于女儿日后参加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又便于她们将来在婚姻上，能找得一个好人家。因此，积极地鼓励自己的女儿争取报考入学。而且还认为，女校单纯，可以放心。由此可见，那时的旧思想观念，已开始了转化，从而推动了女子入学接受新文化教育，开创了当年时代社会的新风。

五、课堂教学情况

该校中、小学的课堂教学，是与一般公办学校相同。只有盲女班的教学稍异。由于盲女生已无视力关系，盲女教师在教课时，手持粗针，教盲生在自己的空白厚纸簿上，先行刺上符纹，使成字句。随后，由教师引导她们用手指按摸字纹，边摸边读，并听老师逐句逐字的讲解。至于手工劳作课，由老师教授织毛线衣物的技能。先在课堂上讲明织法要点后，再直接手把手作示范性传授。同时，还在班中培养几个手艺较好的尖子作助教，使盲生很快掌握编织技能。当同学们掌握了这些织法技能后，由学校向社会统一承接一批毛线衣物原料回来，分发给各盲生加工，作为勤工俭学。将所得的手工钱，用以帮助改善盲女学生本身的生活福利。

六、学生生活与作息时间

一般中、小学生，大多数都规定要入校膳宿的。除小学一、二年级因不能自理生活者，可以走学，或家住本市的少数人，得经学校批准可免外，学生白天上课，留校的晚上一律集中课室自修。课室设有煤气灯照明，并有教师巡堂指导。学生每天的作息时间表，都安排得很紧。一早起床梳洗完后，就要先行集中礼堂，听讲耶稣基督教义、唱圣经诗歌，然后才回课室上课。上完午前课后，随即又要到礼堂再行听唱圣经歌一次，才进午餐。中午有段时间休息。下午课完，便进晚餐。饭后，各人可在校内自由活动或洗衣、洗澡等。晚上，一下自修课，仍须再一次集中礼堂，在听唱圣歌完

后，就得回宿舍睡眠。每天早、午、晚三次的主持讲经领唱者，多数是一位年龄老迈的李大姑，或是牧师。她是董事会中的一员，每次讲唱圣歌约半小时左右。有时，她在讲授圣经中，还趁机讲些“中国抗战一定会胜利的，上帝也会保护大家安全”等语，以免政府和群众指责她单纯宣传宗教。该校除唱圣歌之外，每周还有一节音乐正课。那两位德籍的邓、美姑娘，是兼管全校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纪律的。她俩平时也会巡堂听课，晚间查看自修和宿舍及睡眠情况等，并纠正一切不良现象。对宿舍内务，要求整齐清洁。舍内卫生，由学生轮流自扫。盆桶用物，规定放处，毋使凌乱。室外公共场地，概由校工负责清理。如发现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都要再次补行完成。在学校的严格要求下，学生们对学习非常认真，内务整洁，生活秩序井然。

七、经费来源与学生用费

学校经费的来源，除由德国上级教会拨款和国内外教友的捐助外，就是收学生的学费。

学校平日的经费开支，计有学校的行政费和教职员工的工资，以及校内的修缮、图书、仪器设备的添置等。

学生缴校的用费，寄宿生，包括全学期的学费和膳宿费在内，一个学期交当时的银毫二十七元。而自用书籍文具用品等，则由自己购备。那时的入校学生，除少数人家庭经济较好外，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一般贫困人家的儿女。学校为了不加重学生的家庭负担，使学生能读下去，收费尽量做到合理。

八、学生住校的生活情况

学生住校的一般生活情况是不错的。因为校内环境优美清静，校园绿树成荫，青草满园，而且鸟声悦耳，真是一个幽雅的读书好地方。同学们于课余饭后，都可在校内舒畅地进行活动，阅读书报、打球、跳绳、踢毽子等等。我当年家在韶关市区，但同样要入校膳宿。住校学生，除星期天或节假日外，平时一律不许离校外出，有事须有家长证明，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出去，假满即须返校，不许有误课业。那时请假外出艰难，学生很少外出请假，可是，在校的生活习惯了，即使长时留校，也不感到寂闷。

九、学生学习情况

学校是在当地上级教育行政机关立案的，并受其领导。凡是国家规定的一些重大节日，如“三八”、“五一”、“五四”、“国庆”、“元旦”或临时全市性的集会等活动，都要同样出队参加。中、小学女生的夏季校服，为白衫黑裙、黑鞋白袜。冬制校服，是蓝衫、黑裙、黑鞋白袜。

当年德华女中在校学生，是处在军阀统治的混乱时期。但她们仍能在校安静地上课学习，自是感到难能可贵的。因此也感到欣幸和自豪。为了争取本身妇女的自由和解放，以及自己未来的工作生活和前途，她们在校学习，都非常自觉和用功。学业成绩，不断提高。一些毕业出来的同学，有的考取了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有的走出社会，参加工作，或在小学任教，或进入医务界，同样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十、发生在校内的一件事

德华女中的学生，在学校的教育和当时社会进步的新潮影响下，对于她们的思想认识和反抗精神有了一定的提高。

记得当年小学部五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忘其姓名），年龄已经十七八岁了，家住韶关市区。其家长还是按过去的老规矩，认为儿女的婚姻大事，应用父母作主。于是叫其女儿退学，尽早出嫁。该生坚决不从，卧床不起，绝食多天，以示反抗。事情发生后，学校和社会都受到很大震动。后来，校长和校董事长邓、美两姑娘通知其家长到学校商谈解决办法。通过校方做工作，向家长说明当今社会，是不容许强迫自己的子女婚嫁的，儿女本人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和权利，终于使家长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同意配合学校劝导该生恢复饮食，打消忧虑。最后，完满地解决了此事。这次小学生起来抗婚事件的传播，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婚姻残余思想观念，给了学校和社会一次较大的震动及影响，对提高当年妇女界地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一、学校停办的时间及原因

德华女中一直办了多年，也出了不少人才。可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因韶关时遭敌机轰炸，而校址又位于市区薰风路（即现市委此址），距当时南门飞机场（即现中山公园与体育场此址）近在咫尺，学校时时遭到轰炸的威胁，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国已对日、德、意三个轴心侵略国宣战，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饬令国内所有敌国的传教

士和侨民都一律限期出境，于是，该校无人承担一切，从此停办。但在停办之时，所遗下的盲女班，后来转到始兴县城南的刘镇营德国教堂里去了，以后该校已不复存在了。

〔作者简介〕华细英，女，现年70岁，始兴县人，广东省立南雄中学高中师范科修业。解放前，任始兴县太平镇中心小学教师，解放初，曾任韶关市水上人民子弟小学教师。

陈济棠提倡读经

料小 陈济棠主粤期间，于1933年6月18日，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请通令全省学校读经。并拟具“正学风办法”：（一）由教育厅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编为经书教科书；（二）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科，每星期至少授课六小时；（三）作文命题，经学题应占其半；（四）唱歌一科，将诗经及古圣贤之雄壮诗词采入，“以养成浩然之气”；（五）考试成绩，以操行为主。以上均经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陈济棠随重刊《孝经》，颁发各部属及学校诵习，并为之序。同时由总部秘书处选派经学深邃者数人，轮流到军校担任主讲。

（摘自《广州百年大事记》）

抗战时期在粤北的穗港澳学校

杨发麟

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政府迁至曲江县城韶关（后期迁平远大柘），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近八年时间里，许多穗、港、澳的公、私立大、中学校辗转迁至粤北各地，于是一向文化教育落后的粤北山区，顿时呈现出一派教育繁荣的景象，成为抗战时期的教育中心。

（一）

1938年夏，广东当局成立“广东省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规定全省大学生和高中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分别集中在广州石牌的国立中山大学、广州河南的康乐村私立岭南大学、广州市东北郊的鸡颈坑进行军事训练。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惠阳县大亚湾登陆后，参加军训队的学生纷纷疏散，不少大、中学校辗转迁至粤北，其中大专院校有：

国立中山大学

广州沦陷，国立中山大学大部份学生离开军训队，部份学生无家可归，随军训队转移至连县屋子镇。这是粤北山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一所最高学府。至1939年1月，该校一度迁往云南省澄江县。

1940年6月，中山大学从云南省澄江县又迁回粤北，许崇清再次出任校长。校本部和先修班设在乐昌县坪石镇，文理学院设在坪石镇的铁岭，理学院设在坪石镇的塘口，工学院设在坪石镇的三星坪，医学院设在乐昌县城外河南水，法学院设在乐昌县武阳司（后再迁至车田陂），师范学院设在乳源县管埠。中山大学迁校坪石时，复设附属中学，附属于师范学院。由于校舍分散，设备极差，给教学上带来很大困难，但师生艰苦奋斗，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教学，终于在迁校的当年就有415名学生毕业。

1945年1月22日，韶关沦陷，中山大学师生纷纷疏散，于是校本部和各院分别转移到东江地区和连县，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广州。

省立文理学院

该学院前身是省立教育学院。广州沦陷时，省立教育学院部份学生随军训队转移至连县屋子镇，部分学生疏散回家，那时学院已迁至广西省。至1939年8月，学院及其附属中学从广西省融县迁至乳源县侯公渡，易名为“省立文理学院”，仍由林砺儒担任院长，并附设体育专修科，将省立体育专科学校裁并。年底，再迁至连县东陂。由于林院长聘任进步人士郭大力、张栗源等任教，以民主方式办学，平时引导学生看进步书报，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以停拨经费作威胁，逼林辞职。因此，学院里中共地下党组织便领导进步师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挽林”运动，带领学生由连县东陂步行至韶关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林留任，未果。林卒于1941年冬离职，由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兼院长。

1942年春，文理学院从连县东陂迁至曲江县桂头圩（今乳源县桂头镇），翌年由黄希声任院长。

1945年1月，曲江沦陷，师生仓皇疏散，学院遭受重大损失，最后才在连县东陂旧院址收容师生，不久，便迁往罗定县复课。

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1940年春，在韶关西北郊塘湾创办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初名为“广东省艺术馆”，设戏剧、美术、音乐三个部。馆长由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兼任，副馆长赵如琳兼戏剧部主任，教务主任胡根天兼美术部主任，黄友棣任音乐部主任。学生来源是由机关、团体、学校保送有一定基础的艺术爱好者并经考试录取，学习期限由三个月至半年。当时，曾组织学生演出抗敌戏剧、歌曲和举行画展。

1940年底迁至连县，1941年初又迁回韶关，在北郊五里亭设校，建大棚七、八座作校舍，易名为“广东艺术院”，学制改为两年毕业。一年后，由于院内科系尚未达到学院体制，仍复名“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2年底，再迁校于韶关西北郊上窑村。当时，师生组织“实验剧团”，所演出的内容和演技方面不断提高，颇负盛名。1944年底因战事又迁至连县。1945年1月韶关沦陷后，再由连县辗转迁往连山、广西等地，后至罗定县复课。

省立法商学院

它的前身是省立勤勤大学的商学院，由陆嗣曾任院长。学院曾先后从广州迁至遂溪、信宜等县。1941年秋，迁至曲江桂头圩（今乳源县桂头镇），把当地原有的数座粮仓，稍加改建，并添建简易平房多座，于当年10月底正式上课。仍设立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学系，也曾一度增设统计学系（只招了一年级新生一班便停办，学生约50人，于升上二年级时分别转入其他学系）。学院还开设适应战时需要的战

时经济、战时财政两门讲座，并为广东省银行培训行员，开办过银行训练班一期，两年毕业，属大学专科程度。全院学生约200余人。当时由于师资奇缺，只得聘请迁来韶关的中央、省机关单位的一些专业人员兼课，同时还聘请一些专家如秦元邦、蔡世英、曾仲谋、彭尘舜、陈南山、吴胜己、丁景堪、区萃仑等来院上课。1943年1月，陆辞职，由迁至桂头之省立文理学院院长黄希声兼任。1944年1月，黄辞职，由黄典元教授接任。1945年1月，曲江县沦陷后，再迁至信宜县。

私立岭南大学

1941年底，香港沦陷，私立岭南大学校本部从香港迁校于曲江县仙人庙大村，农学院（二年级以上）则迁至乐昌县水牛湾，医学院分散在韶关河西医院及江西中正医院上课。校长是李应林。1945年初，农学院部份师生在李沛文院长带领下，从乐昌县水牛湾转移到梅县。抗战胜利后，全校迁回广州。现任美国总统府出口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飞虎国际航空公司总裁、国际人民交流协会执委的陈香梅女士，曾于仙人庙私立岭南大学文学系就读。

私立广州大学

广州沦陷后，私立广州大学迁校于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迁校于韶关西北郊上窑村，将文、法两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停办教育学系和社会学系。增设商学院，内设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和工商管理学系。计政班增设银行班和新新闻班。计政分班则设在曲江县桂头圩（今乳源县桂头镇）。

1943年8月，校长陈炳权赴美考察兼为广州大学募捐，由王志远接任校长。1944年冬，粤北战局紧张，部分师生疏

散至罗定县复课。1945年1月曲江县沦陷，全体师生辗转疏散至连平、兴宁等地设校。

私立中华文化学院

私立中华文化学院的前身是中华文化学院国文专科学校，创办于1942年秋。院长吴康。当时设校于乐昌县坪石镇。1944年秋，增设大学部，设置中国文学系、史地学系、新闻学系，并设置文哲学部、史地学部、生物学部等三个研究部，共有学生一千多人。1945年1月，坪石一度陷落，学院遂东迁梅县。

私立广东国民大学

香港沦陷后，私立广东国民大学迁于曲江县，校长为吴鼎新，1944年迁至罗定县。

私立南方商业学校

该校属大专院校，创办于1944年1月，校址在韶关北郊黄岗小学内，以张导民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许崇清为校长。设财务、会计、银行三科。同年夏，战局紧张，韶关进行紧急疏散，乃迁校于连县。1945年1月，又迁往梅县与分校合并。

(二)

抗战时期，从穗、港、澳辗转迁至粤北各地的中等学校为数也不少。有普通中学、中等师范、职业中专。国立、省立、私立的都有，在私立中有教会办的学校。抗战胜利后，绝大多数学校迁回原址，但亦有极少数学校仍留在粤北，成为粤北地区的学校。

一、国立学校：

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创办于1909年，原为两广优级师范附属中学。广州沦陷后停办。1941年，中山大学迁校乐昌坪石，复设附属中学，校长司徒汉贤。

国立华侨第二师范学校

1942年8月创办，10月开学，学制三年毕业，学生公费待遣，第一届招生240人。该校归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领导，校长为郑伯豪（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成员），校址在乐昌县武阳司。1944年底，战局紧张，遂迁校于江西省安远。

国立华侨第三中学

1942年春，设校于乐昌县安口村。1944年下半年，迁往连县三江（今连南瑶族自治县县城三江镇），设高中、初中，校长周元告。

二、省立学校：

省立粤秀中学

它的前身是省立文理学院附属中学。1939年8月迁校于乳源县侯公渡，由丁景堪任校主任。同年底，迁校连县东陂区塘头坪村。1944年改名为“省立粤秀中学”，独立设校，校址从东陂区塘头坪村迁至学院旧址江夏村。

省立执信女子中学

香港沦陷后，于1941年11月从澳门迁至乐昌县，当时金曾澄任校长。1943年，改名为“省立执信中学”，招收男女

生。同年2月，由林宝权任校长。1944年底，迁校于仁化县恩村。

省立仲元中学

广州沦陷后，于1939年秋迁至韶关南郊二公里鹤冲乡，学生约300人。当时的校长为邓仕采（北伐战争前，国民党粤军将领邓仲元之弟）。不久邓去了惠阳当县长，由黄敏余代校长。是年冬，韶关战局紧张，遂迁至连县星子。1940年1月迁回韶关。1941年夏，由梁镜尧任校长。1944年冬，日寇紧迫韶关，师生纷纷疏散。1945年1月24日，当日寇侵犯韶关时，校长梁镜尧率领留校师生员工30多人进行抗击，不幸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有梁校长的长子梁铁、教师梁冠球、学生张国常、邓焕燎、张永涛、梁加林等，受伤的师生有五、六人，其中教师许家宝（中共地下党员，现名许克）和梁校长的次子梁元博（现是广州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水声学学会理事，中共党员）身负重伤（后致残废）。除许家宝就地掩蔽护理外，其余师生用担架抬着伤员向东转移至兴宁等地。198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梁镜尧、梁铁为革命烈士，发给证明书，同时发给梁元博特级残废证。

省立志锐中学

它的前身是广州建国中学，于1937年8月改为志锐中学，校址在当时的广州德宣西路中山纪念堂之右侧。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停办。1939年12月在始兴县学宫（今始兴中学，复校，校长仍为张天爵。当时在四战区难童中挑选80余人为基本学生，加上一部份由四军送来之先烈遗裔，共约百人。由于年龄、程度关系，编为初中一年级两班，复式小学三班。

1941年7月，由于粤北战事紧张，遂迁校于广西省柳州大桥。同时，在韶关笔峰山麓（今韶关市北郊十里亭）着手兴建新校舍。1942年春，迁至十里亭新校舍，有教室及学生宿舍五座，教职员住宅六座，秋季办高中部。在此期间，日本飞机袭韶，两度滥炸该校，落弹数十枚，以致全校建筑暨图书、衣服等遭受重大损失。四战区司令长官、学校名誉董事长张发奎电至，谓“敌人毁之，我必复之”，并一面收拾颓垣，继续上课，一面拨款修葺，历时三月，又恢复旧观。1943年冬，耗资110万元，建大膳堂、寝室、课室、总办公厅等五座，并辟周径400公尺之运动场一个。1944年春季雨季之前，赶筑广达百尺之天然游泳池，至夏季，全校建筑大致完成。同年9月，由于韶关战事吃紧，又再迁校于始兴县城。

韶关沦陷后的1945年6月29日，该校学生暴动，将反动校长杨瑜、事务主任李哲、军训教官李子述枪毙。迨后全校师生被迫离校，从始兴县东行旅次连平、梅县、龙川、广州到番禺县，暂借市桥乡辅群中学为临时校址，于11月开始复课。次年8月迁回韶关互励路复办（校址在今市委大院内）。抗战胜利后仍留在韶关，几经变迁，遂成为今天之省立北江中学。

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

该校创办于1908年，广州沦陷后停办。1940年6月在韶关北郊黄壩坝复校，设师范科、简易师范班及初中，后再增设附属小学。校长仍由李雪英担任。当时有学生373人，教职员26人。1942年6月，迁校连县城西鹭鸶嘴，兼办国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班，学习期限半年毕业。

省立江村师范学校

该校创办于1929年3月。广州沦陷后，迁至韶关北郊黄

壘坝，校长戚焕尧。

省立广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它的前身是省立第一农工职业学校。不久，该校易名为省立广州农工职业学校。广州沦陷后，于1938年12月21日迁校于乐昌县北乡，1944年又易名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为黄巽。

省立仲恺农业职业学校

1940年2月迁校于澳门，不久，迁至乐昌县桂花村，由金曾澄、陈颂硕先后继任校长。当时停办初级农蚕科，改设为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3年1月改为省立学校。1944年6月，迁校于新兴县。

三、私立学校：

私立知用中学

1942年秋，从澳门迁校至乳源县，不久，又迁校湖南省宜章县白石渡。翌年夏再迁至广东省郁南县。当时的校长为张瑞权。

私立南武中学

广州沦陷后迁校于香港，香港沦陷后停办。不久，该校粤北校友复在韶关筹办南武中学，设高中、初中。校长由该校早期毕业生范公超、郭荫棠先后继任，校址在韶关市北郊河边厂。

私立培正培道联合中学

该校为美国浸信会办，原为广州培正中学和培道女子中学。广州沦陷前夕，均迁往香港，后因香港战局紧张，于1941年11月先后迁至乐昌县坪石设分校。当时，因培道女中没有能力单独办分校，遂以培正中学分校教职员为主，成立

“私立广州培正培道联合中学”，以培正中学事前建好的一批临时校舍（计九十大幢）作校舍，校长为赵恩赐。1945年初，坪石沦陷，联校迁于湖南省桂东县。

私立真光中学

该校为美国长老会办。广州沦陷后迁至韶关西北郊上窑村，设高中、初中，校长何荫棠。

私立培英中学

该校为美国长老会办。广州沦陷后迁至韶关东河坝，设高中、初中，校长傅世仕。

私立青年会中学

该校为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办。在广州沦陷后迁至韶关。

私立岭南大学附属中学

美国基督教会学校。香港沦陷后，随岭南大学大学部迁至曲江县仙人庙。岭大校长李应林兼校主任。

私立基督教联合中学

该校是在1941年9月，由迁至粤北各地的私立岭南大学附中、培正、培英、真光、美华、协和、真中和香港的岭英、协恩、澳门的广中等10间中学合并而成。1942年7月立案，校长简国铨。校址在连县城西双喜山（今连州镇一中校址）。抗战胜利后，各校均迁回原地复办，基联中学则留在连县，改由连县基督教会接办。解放后，县政府接收，改为连县第一中学。

私立中德中学

该校为留德同学会所办。广州沦陷后，迁至韶关西河，设高中、初中，外语课只教德语。校长潘尹，校址在今沙湖公园路口附近。1945年1月，韶关沦陷，师生疏散至曲江大塘、枫湾，然后转移到东江地区。

私立黄埔中正中学

广州沦陷后，迁至韶关东河坝，设高中、初中，校长邓振亚。1945年春，从韶关迁至阳山县七拱，同年迁广州改为省立学校。

私立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沦陷后随大学部迁校于香港。香港沦陷后，又随大学部迁至韶关西北郊上窑村，设高中、初中。

私立华英中学

美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主办。1941年底从香港迁至韶关河西，以英光小学校舍为校址。1942年复课，有学生300人，教职员20余人。当时杨景循校长辞职后，由校董会主席司徒卫兼任校长。在此期间，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各科教授亦先后来校辅导教学。1943年底，在粤北运动会上获女子总锦标。1943年度下学期，谢志理任校长。1945年5月，粤北战局紧张，学校组织未能疏散回家的员工学生80多人分水陆两路去连县，借双喜山基联中学宿舍暂住。9月返韶在原址复课，学生增至400多人。1945年1月又疏散至曲江县龙归多田村租民房上课。抗战胜利后迁回佛山原址。

私立力行中学

广州沦陷时停办。1942年8月在曲江县犁市设校，只开设初中。校长黎英。

此外，在抗战期间，曾一度迁至粤北的学校还有钦州师范学校（址设连县东陂）、琼崖中学粤北分校（在韶关西河，今北江中学后山）等。

(本文根据广东省和韶关市档案馆、广州中山图书馆《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文史资料》、《韶关文史资料》，以及老教师座谈会、个别采访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

(作者系韶关市教育局副科长、《韶关市教育志》编写组组长)

解放前广东省小学与学生数

料	小
·	资

1947年4月16日国民党广东省民政厅公布，全省人口总数为3866万零3829人。

1948年6月3日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统计：全省现有中心国民学校3775间，国民学校21118间，省师附小12间，县、市公私立小学3130间，幼稚园45间，学生共246万零9966人。

中大在坪石回忆片断

(1939—1942)

何 湘

迁往坪石前后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原在广州石牌的中山大学于当年底迁往云南省的澄江县城。由于迁校没有群众基础，师生们在澄江生活很不习惯又不方便，虽说澄江离昆明近，但地处穷僻山沟，公路破坏不通车，来往靠步行或骑马。学生们除上课啃书外，便没有什么课外活动，生活十分枯燥。学生们多数来自沿海城市，家乡战火纷飞，父母兄弟姐妹们怎样，千里迢迢，思乡心切，同时，1939年春夏之交，当地出现“死病”，学生病死多人，学校虽有医学院，但无法防治，这与缺药也有关系。这些原因，成为学生们（包括教师）再次要求迁校的理由。但当时学校当局认为刚迁来不久，没有答允。随着时间推移，矛盾越来越大，不久，出现全校性罢课、游行示威的风潮，国民党教育部也没有办法平息。学校一度成了无政府状态，上课很不正常。以后，许崇清接任校长（1941年由张云代理校长；1942年下半年又由金曾澄代理），才决定将学校再迁乐昌坪石。由于坪石跟韶关（广东临时省会）较近，交通便利，敌机骚扰少些，离自己家乡也近些，因而师生们没有什么抵触意见（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也赞成）。这次迁校，由1939年冬开始，至1940年

初才迁完。因为坪石是一个小镇，地方有限，除校部设在坪石镇外（校属升大先修班亦在坪石），各学院分散设在附近各地：文学院在铁岭、法学院在武阳司（后迁车田坝）、工学院在三星坪、农学院在源堡（湖南境）、理学院在肖家湾、师范学院在管埠、医学院在乐昌县城。各学院虽如此分散，但仍感校舍不敷使用，以致1940年录取的新生，不得不安排在坪石西南的梅花墟集训，编成几个中队，由军训教官管理。校长许崇清，教务长张云，训导长王慕尊及少数教授曾到队讲话。大约两个月后，新生转移到坪石的车田上课，由一年级起，才分别回到各院系学习。

学习生活片断

中大是一间综合性大学，学校的七个学院所设的学系和专业是比较齐全的，它一届一届地造就了大批知识分子，为革命爱国事业或国家民族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学生，距今四十多年了，回忆当年的战时生活，可说是艰苦备尝。住的是木板造的或用竹片编织加石灰黄泥批盪、上盖杉皮的平房（或租用民房），教室的桌子凳子，亦是用木板或木条钉在泥地上制成。学院分散，来往一概徒步，照明是菜油灯（有时教室用煤油汽灯）。几年来，大家都没有看过电影，一年半载遇有一两次话剧演出，大家争着去看，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在学习方法上，一般的说，学路不广，形式不多，上课听讲，下课啃书，学术交流讨论会很少，也没有社会调查和实践，理论与现实脱节，更没有什么学术攻关，或计划填补什

么空白学术等。不过，同学们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一般还是很好的。许崇清任校长时（解放后仍一度任校长），同学们对他能罗致国内的名教授来校任教印象较好。有些教授的确除上课外，还不辞辛苦写讲义、编教材、课外辅导、指导写论文、解答疑难问题等，良师益友之情十分感人。他们对稳定和鼓舞同学们的学习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学校毕业后（各学院除医科五年外，一律四年），都叫做“学士”（学校那时没有设置硕士、博士或研究生等学位）。学校虽说每年毕业生不少，但处在抗日战争生死存亡的时刻，实在难于安心读书钻研，实际与老百姓一样受灾难。如有一批同学从香港经惠阳乘船来坪石，被日本飞机开枪扫射，法学院政治系一同学（冯禄仕）当场中弹死亡。又有一批同学从香港经越南返校，因要乘坐河内至昆明的窄轨铁路火车，至滇越边界一带高似云层般的群山时，当时正是春节后不久，天气很冷，火车厢破烂，凛冽寒风吹进，同学们十分难受，要求列车员解决。因列车员是法国人（那时越南在法国的统治下），他们不予理睬，同学们只好把行李堆起挡风，但列车员不管三七二十一，破口大骂，把行李踢倒蹂躏，凶恶非常，使人气愤……。

几位名教授

当年中大的师资队伍是较雄厚的，有各方面的学派人材。如法学院有几位教授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王亚南教授（解放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曾与郭大力合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是教经济学的，一周上课只几个小时，但学生没有人缺席，而且别的班甚至别的学院学生也

自动来听课。他没有进课室，那里就早已座无虚席了。又如李达教授（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是教社会学的，也很受学生的欢迎。他们主要一个特点，是敢于在反动统治时期，讲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为时不久，形势变化，都被先后解聘了。

（本文作者，原在大宝山矿务局工作，现已离休）

志锐中学十年

欧 淮

志锐中学创办于1939年12月，这时正是日本侵略军企图从广州大举向北进犯。张发奎将军在完成指挥淞沪战场右翼作战，挫敌凶焰之后，回师广东，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了抗战建国、培养人才的根本大计，他联络旧日袍泽、海外侨胞，集资兴建了志锐中学（纪念已牺牲的原第四军26师师长许志锐），并兼任学校名誉董事长。当时的四军军长欧震任董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驻东江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驻西江的卅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担任副董事长。第一任校长是张天爵、教务主任是江葶。最初在始兴郊外的文庙设校开课，学生100多人。学生来源，大部分从四军子弟和广东儿教院中挑选，享受公费待遇。

张天爵是爱国华侨，开明人士，拥护国共合作。他除聘用了一批素质较高、社会上知名的教师，如廖辅叔、卢焕镛、李本山、陈原、陈恭哲等外，还用了不少共产党人任教，如：吴华（中共省委青年部长）、吉联抗（中共特别支部成员）还有地方党的许侃、王炎光、谢桂文、邓文礼等人。1941年，随着第四战区司令部的迁移，志锐中学也一度搬到广西柳州大桥上课。四战区的中共地下特支领导左洪涛，又派孙慎、郑黎亚、黄凇、吕璧如、杨野明等中共地下党员到校任教。因学生来自战火苦难之中，觉悟提高很快。如朱舜韶、程途、曾心影三位同学，还不到入共产党年龄，就积极

申请入党，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共党员。全校学生，国家民族观念也很强烈，有的还考入了国民政府的幼年空军学校和幼年海军学校，想早日报效祖国。《我们是小铁军》，是志中校歌（吉联抗作曲、孙慎和声），歌词是：“我们是小铁军，我们是小铁军，不怕风霜，不畏艰辛……铁的纪律，火的热情，踏上革命的大道前进！我们有好模范，我们有铁将军学习、学习！汀泗桥、武胜关，保卫民族、解放人群！革命需要我们，我们是小铁军！”歌词表达了学校的历史、宗旨和愿望。校歌是天天唱的，使学生受到很大的激励。

“公、诚、廉、毅”是志锐中学的校训。为了使学生对校训每个字的含义，有较深的理解，在1942年至1943年，学校还发动同学写文论，用以进行思想教育。

1940年冬，张天爵校长因从事侨务工作离任，在第四战区司令部工作的杨瑜，自荐接任。

1942年春，志锐中学在韶关十里亭的新校舍建成。即迁到新校上课。新校舍是竹木结构，一座座的楼房散布皇岗山麓。矗立在校中心的是铁军堂。广场上，有周环400米跑道的田径场地，有篮球场、排球场。两旁山坡是课堂，课堂后面是宿舍、图书楼、办公室、理化室，再远一点是教师宿舍区，靠近后山是厨房和大食堂。在战时，这些竹织批盪瓦盖的建筑物，算是很不错了。

志锐中学学生质量，也很受人称道。1942年夏，韶关举行纪念“五四”校际十项竞赛，仅有200多初中生的志锐中学，却取得了诗歌、书法、美术、歌咏、话剧、象棋、露营……等九项冠军，在当时众多的省港迁韶的学府中，一间初中竟然能有这样突出的成绩，的确在韶关轰动一时，树立了

学校的声望。

志锐中学在德、智、体等方面，是很有成绩的。我在1942年秋进入新设的高一级学习开始，不论在一般的教学中，或是严格的军训中都受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救国而读书的教育，明确了学习目的，因此，能比较自觉而勤奋地学习。加上老师的水平高，素质好，使我们学得多一点和快一点。例如，教我们高一英语的陈原老师，懂七国文字，除教我们英语外，还鼓励我们学世界语；教我们数学的卢焕镠老师，用英语讲课，幸好数学词汇不多，翻来复去地听，也就习惯了。到高二后，袁老师强调预习和多做习题，不论测验或考试的题目，都是他先行试做，他能做多少题（对学生减少五分钟），便出多少题。如果平日练习少，考试稍一迟疑，很容易不合格。那时，两科不及格，便要转学。严格的要求，使我们在高二的暑期中，多数人留在学校做高三的数学习题，到高三上数学课，便感到轻松，有较多的时间和老师探讨数理上的有关问题。我读高三的班主任是于亮生老师，他对古典文学，造诣较深。他在语文课，常引导我们探讨朱儒学案中理和气的关系，并把全班十八个人分为两组进行辩论。他以孔孟之道的忠恕，教育我们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团结抗日，保持气节。军训是效仿正规部队，要求绝对服从。高中军训，每人一支步枪。操练队列、三角瞄准、刺杀、斥候、测量、筑城都要考评。陆军礼节，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军训不及格要留级，培养我们严格守纪的作风。有时还在半夜紧急集合，提高敌情观念，实施战时教育。

劳动教育，在战时的志锐中学是经常进行的。每个班都开荒种菜。每当饭后黄昏，大、小同学到菜地上淋水、施

肥、除草，有说有笑，洋溢着热烈愉快的气氛。蔬菜收获多少，因关系到伙食的好坏，虽然从1942年开始自费生愈来愈多，但在学校风气的熏陶下，将官子弟、名门闺秀，也一样荷锄挑粪，在劳动中体会农民的艰辛。

1943年，广东全省运动会于韶关西河体育场举行。我班的陈荣穗，夺得三级跳远冠军，长跑项目上，李克也取得好名次，这说明了师生们都重视体育教学和锻炼。

学校的师生关系也很亲密。如1942年秋，日机轰炸志中，投下大量燃烧弹，学校升起几处浓烟烈火，日机刚离皇岗山头，同学们纷纷跃过火苗，冲向燃烧着的教师宿舍，一边泼水灭火，一边抢救老师的衣物。后到的同学，也跑向图书馆、学生宿舍灭火。有的同学还把老师脏的铺盖、家具，拿到山溪洗刷，再搬到老师临时住宿的地方。又如1945年除夕，住宿在始兴罗坝的志中师生和教工家属，在日军大举清乡扫荡时，摸黑行军，向清化撤退。我们班年岁较大，走在大队之后，一则帮助掉队的老弱教师和小同学，二则准备阻击追兵。突然，右面山传来了“三八”枪声，后面还混杂着机枪和迫击炮响声。回头看，红色的信号弹划过山林的上空。我的牙齿开始打颤。走在前面的人，泥泞路滑，走得很慢，摔倒的小同学，还要我们背着走。我们班，每人只有两百发子弹和两枚手榴弹，碰上敌人，也不够火力。我们本来可以绕道左边的山林走在前面，但想到老师、老师家属及众多的男女同学，我们没有这样做。虽然紧张得提心吊胆，但还是两个人一组在前后拉大距离，以便早发现敌人早响枪，给前面的队伍及时进入山林作掩护。

1944年暑期，衡阳失陷，韶关告急，志锐中学搬到始兴县城上课。1945年1月，日军进攻始兴，无家可归的同学随

学校撤往罗坝。农历除夕，日军从澄江、马市向罗坝区合围扫荡。志中师生又撤退到始兴清化，在彩岭张发奎办的风度小学小住十多天，再搬到月武圩旁、始兴二中的新建校舍上课。我们高三班只有十三人，朱舜韶提出要到抗日前线去，于是高三提前毕业。这时，张天爵校长已任广东侨务处长。他在沦陷后的但没有日伪进驻的曲江大塘下坪乡办起华侨中学，以宣传组织民众抗日为使命。张校长和风度中学的中共地下党派来的石根源主任带领我和朱舜韶、陈志坚、吕式根、陈宝铨、茹侠忠六位同学到了曲江下坪。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1945年6月末，抗日的风度大队，讨伐反动顽固的始兴县长江锦兴、志锐中学校长杨瑜。本地的志中学生，有不少人也参加了风度大队，而大部分员生，由教务主任李本生带领步行到东江找副董事长李汉魂，安排在龙川住宿。8月，日本投降，董事长张发奎在广州受降，指令志锐中学到番禺接收辅群中学。这一年，私立志锐中学改为省立。冯肇康接任校长，在市桥开课。有高初中各三个班，学生三百多人。

1946年暑假，志锐中学从市桥迁回粤北山区。学校设在韶关互励路。此时，学校有藏书二万多册的图书馆，有全套完备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设备的实验课室，有大礼堂、食堂、医疗诊所、疗养室、学生宿舍、教工住宅。有初中和高中各六个班，学生六百五十多人，已颇具规模。学校保持勤奋的学风，保持关心社会进步、关心祖国命运的优良传统。1947年8月，林为栋接任校长，再次返回志中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扩大，学生的进步活动风起云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学联、民主青年同盟。许多进步书刊

如：《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在进步师生中广为传阅。一批批的师生进入游击区。志锐中学成了当时韶关学运的中心，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粤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50年，志锐中学和曲江县立一中、韶州师范曾一度合并为北江中学。后来曲江一中、韶州师范已回复原有校址继续办学。

（本文作者系民革韶关市委员会副主委）

抗战时期迁韶的广州女师

洗 鸿 遇

广东省立广州女师创于清末，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校址原在广州莲塘路。

烽火中坚持办学

1937年全面抗战展开，广州常遭敌机轰炸，女师迁往南海西樵筒村上课。广州沦陷，一度停办。1938年底，留在香港的师生组织自修班，仅有师一、二、三年级。借知用中学的校址，在夜间及星期日上午上课，是战时临时措施。1939年暑假，留在港澳的女师、女中，及广雅三间中学的学生共200余人，联合呈报广东省教育厅，要求解决继续就学问题。后决定在中山县湾仔开设临时中学，专门收容这三间学校的学生，另再招考新生补充。日寇入侵中山，学校辗转澳门，香港。同年八月，省教育厅再派老校长李雪英率领全校员生取道沙鱼涌转上韶关，在黄垌坝复课。跟校同入内地的学生有30余人。因师三班在香港自修班已毕业，师二班在“中临”亦学习期满毕业，原师一班已升至师三班亦跟同学校入内地继续学习。未启程前，还在香港招有师一及师二插班生各一班，共120人，正式复校上课。

复课后朝气蓬勃

在黄垭坝的校址，是新搭起的茅棚，靠正北江岸边，真正是青山绿水，风景怡人。但吃的九二米（扑米再碾一次，至九或二便是）。青菜也不多，配以少量的肉食。学生伙食费完全由国家供给。教职员要自付伙食费，吃的标准与学生相同。各人从未叫过苦，也没有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冬天虽然是寒风凛冽，也不用热水洗澡。课余，冒着寒风在北江河边洗衣裳。学生由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因此更加努力学习。除了学习本身功课之外，还根据个人的志趣，学习专门的学科及艺术。如：书法、图画等，如高中三年级有位名叫刘宝珠的，写得一手好字，绘得一手好画。有些同学还排演了救亡话剧，演唱救亡歌曲等，既增加充实师生的文娱活动，还藉此激发当地农民爱国热情。

学校也比较重视学生的军体训练。常组织学生从黄垭坝跑至马坝，后学校搬至连县，同样组织学生从鸬鹚咀跑步至连南三江。

学校变成一大家庭

整个学校如一个大家庭，校长李雪英称学生是自己的小孩，凡对外人介绍都称“我的小孩儿×××”，说得十分亲热。学校的其他主要人员如主任、导师、及实习教师对学生也同样称呼。而学生对校长及老师，也象亲人一样。同学与同学之间，举行姐姐班与妹妹班的联系。在班里，又排出姐姐与妹妹。做到全校姐姐爱妹，妹妹敬姐姐，象大家庭一

样，亲亲热热，形成和睦的气氛，减少离乡苦惱。

复课后班级的调整

女师在黄埭坝复课，除了港澳跟随入内地的同学120人外，还在曲江招收初中生及附小生。幼师师资因未能适用于内地，故暂不开办。为了适应内地师资的奇缺，尤其是初小的师资，因当时农村普遍办国民小学（1—4年级），如果等待普师毕业生的派出，时间实在太长（因普师是招收初中毕业再读三年）。为配合当时各国民小学教师的需要，故多办简师班。因简易班是招收小学毕业生，三年毕业，时间可缩小三年。而初中及附小，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扩充。由于班级及学生不断的扩充，女师师资也出现严重缺人问题。李雪英想到就地取才的办法，商诸兄弟单位领导，介绍能胜任的教师兼教。这时大学生最多的单位算是农林局。因该局是技术单位，除了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外，文、法、社、科的毕业生也不在少数。农林局长刘荣基也很支持，凡被聘为女师兼任教师的人，只要能将本身工作做好，都不加阻止，所以能顺利地解决教师问题。1943年底，韶关局势又告紧张。女师又迁往连县的鹭鸶咀。那时各县的小学教师更缺。女师请准省教育厅的同意，开设速师训练班，半年毕业，凡具有初中以上程度的，由各县选送到校学习，培养她们的教学能力；毕业后将她们的成绩、特长，作出鉴定，送回原送单位，量才录用。这个班级学习时间虽短，但在当时师资缺乏的情况下，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毕业生，除各自找学校任教外，亦有由学校协助安排的，而且负责到底（因校长李雪英颇得学生家长信赖。

故学校迁入内地复课时，学生家长能放心让女子进入内地求学）。学校还经常派出实习老师到各县了解毕业生的工作情况，遇有问题，及时予以解决或协助。记得1941年入内地第一批毕业生分配工作时，英德县长左新中派出教育科长谭雨亭前往女师，要求校长派一批优秀毕业生到县城的英城小学。校长即介绍刘宝珠，带同蔡丽英、沈梅、胡楚坚、叶秀珊、吴秀贞、黄润德、梁桂龄等七人前往，她们分当一至六年级班主任，梁桂龄当总务，蔡丽英兼教务，待遇不分高低，一律月薪48元，学米平均分配（抗战期间因教师待遇低，教育当局动员每个学生每月斤米养师活动）。由于她们的努力，第一学期初见成效，一年以后，全校改观。英德县因在这年度的全省教育评比中，名列第一。第三学期开始时，有些教师表示下学期不受聘，刘宝珠也有些灰心而想辞职。李雪英校长闻讯，即派出教师周作福赶赴英城小学处理此事。处理结果，刘宝珠打消辞意，各教师不愿续聘可自由，但所缺教师，由女师保证在本期毕业生中派出优秀毕业生补上，此事便得到完满的解决。

以上各点，是本人在抗战期间任省农林局岁计股长兼任女师教师时耳闻目见的史实，现在回述，不周之处，请知情者斧正。

附注：当时校长李雪英，早年留学日本，她在陈济棠主粤时任女师校长。陈济棠下台后，她转香港德明中学任女中部主任。后举家由港迁入内地。

植桢中学在粤北

黄植农

私立植桢中学（以下简称“植中”）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陆军中将黄植桢在粤北南雄县创办的一所中学。1939年，黄植桢在曲江接长军政部第廿三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以下简称“补训处”），辖下补充团七个和直属大队达十个，驻地多在粤北远郊，管佐人数众多，子弟入学困难，黄先在韶关“补训处”驻地帽子峰下创办南华小学，后因粤北战局吃紧，“补训处”处部迁往南雄犁口桥。为了解决粤北各地撤退来雄失学青年和当地居民升学难的问题，1941年，黄在南华小学的基础上创办植桢中学，以纪念他的长兄黄植桢（其一生在原籍惠州从事教育工作）而定名。

创校前，成立校董会，报准广东省教育厅备案，黄自兼董事长。董事由省内知名人士、教育界和黄的亲属担任，如张友仁、周醒南、黄植文、黄焕秋、黄植农等均曾任该校董事并大力支持办校，校长由黄植农代理。

1943年秋，植桢中学农场（在南雄县泰怀乡）建场规模初具，植中从犁口桥迁校农场，并扩办高中部。校务由黄植农主持，下设三处。教务处主任岑国纪、李康寿（中共地下党员）；训育主任张培生、陈现文；事务主任马群英、黄焕培；体育主任黄焕滋；军训团负责人梁福洋、钟佰猷、黄焕发、列健引（中共地下党员）；童军主任陈全宽。

1944年底，粤北战局紧张，日寇进犯韶关，入侵南雄，

该校迁往和平县贝墩乡继续上课。1945年九月，日寇败降，该校从和平迁回南雄植中农场原址开办。黄植农离雄赴穗，力荐李康寿代主校务并兼教导主任。黄煥培负责事务，陈云阶（中共党员）主持训育工作。1946年夏，该校从粤北迁穗，由黄植文、黄植农主理校政。

创校目的

植桢中学是抗战时期黄氏家族在粤北创建的纪念中学。黄植楠等创校目的也因应客观需要。当时，粤北韶关、南雄一带从广州和各地撤退前来的家庭不少，失学青年众多，当地中学无法容纳，植中的开办，相应解决了部分青年读书难的问题。其次，黄植楠等人对教育事业一向极热情，在广东部队将领中，黄以办理军事训练教育成效显著为当时人所称道。陈济棠主粤时，曾抓委任黄为广东燕塘军校教育长，后因故未果。1935年底，陈济棠、余汉谋为培养军事教育人才，资送黄赴德国研习军事。1936年陈济棠下野，余汉谋继续资助黄留德学习，1937年，芦沟桥事变，全国奋起抗战，余汉谋即电召黄回国，出任66军中将军参谋长，参与保卫广东、南京诸役。再次，黄的长兄黄植桢生前在惠州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桃李遍天下，在惠州西湖边筑有“维周亭”（植桢别字“维周”）以资纪念。黄及植桢门生过去已有在惠建校培育人才，并对植桢纪功颂德之意，抗战军兴，广州沦敌，惠州三度失陷，有关人士相率退居粤北，促成创办该校之举。

管教特点

日寇侵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为了争取胜利，一切服

从抗战需要。青年学子，报国心切，要求学好本领，保家卫国，为救亡图存作出最大努力。植中在师生的配合下，实行严格的军事管教。初中学生除接受童军训练外，并与高中学生一同参加军事训练。每周军事学术科时数达6时之多。军训主任、教官则由校遴选南雄警司暨“补训处”在军校科生出身的军官任教。黄利用掌握部队的枪弹，发给学生实弹射击，并参与南雄警司突击检查户口，打击汉奸坏人的军事活动。有的学生军训成绩优异，则以“补训处”名义保送正式军校深造，毕业后优先分配军职，参加抗战部队工作，为了便于加强管教，并帮助学生解决远途跋涉上学困难，实行师生集中寄宿，晚上集体自修，并由老师随堂辅导，学生宿舍实行军事化内务，由校统筹借发毛毯等床具，晨起后整理内务，参加朝会、晨操，虽届冬令，亦无一人迟起误课。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植中还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

(1) 广聘国内知名大专院校(如中山大学)出身的，且学有专长、热心教育事业的老师担任主要学科中、英、数、理、化、史、地等的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好，颇得学生家长和有关人士的好评。当时，粤北南雄是抗战时军政要员前来省会韶关再赴江西赣州飞回陪都重庆必经要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教育部长陈立夫，省主席李汉魂、省府秘书长郑彦棻、省教育厅长、省府委员许崇清、黄麟书以及其他知名人士黄国梁、李国俊，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等途经雄，耳闻目睹植中校况，深为嘉许。陈立夫并为男生宿舍题赠“模范宿舍”匾额。许崇清在校图书馆见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称誉嘉勉植中忠实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不分政党、信仰、阶层，目的只是一个，培育广大青年，

团结各族人民抗击日寇，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2) 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该校招考新生都经过严格入学考试，不徇私情。在每一学年开始时，全校学生参加甄别考试，成绩优异的表扬奖励或越级升班；对不合格的学生，进行耐心辅导；屡教不改的留级、退学。通过甄别考试，大多数学生成绩跃进，少数学生得到重点辅导，亦不断进步，校内学习气氛日见浓厚。

(3) 注重体育运动和各项有益活动。校内经常举行班际球类比赛，数次组织校队参加广东省在韶关举办的“汉魂杯”等篮球比赛，多次获得冠军，校誉大振。慕名前来报考的新生不少。此外，还组织专人前往东江、北江各县招考新生，学生来源宽广，质量不断提高，较之在南雄公私立三间中学——省立南雄中学、县立中学、珠玑中学毫无逊色。

经费来源

植桢中学经费主要由创办人黄植楠负责，并请校董、各界知名人士捐助。黄在南雄担任南雄警备司令、补训处处长，调配有关人力、物力支援，如植中农场的耕种，校舍的建筑，图书仪器的添置，师资的调配，军事管教的设施，均由黄植楠、黄植文暨警司补训处以及热心教育的人士捐赠或乐助。南雄沦陷，使学校图书设备校舍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黄又想方设法迅速重建校园，依时开课，黄等悉力筹划，全力以赴，堪称倾家办学。植桢中学农场种植稻谷、桐树、烟叶、良种蔬果、养鱼，收成可观。教务主任李康寿是中山大学农学院高材生，主持农场以来，成绩卓著。农场从

财力，物力等方面有力地帮助解决了学校在财政上和师生生活上的问题，使植中校务在战乱中仍能健康发展。

革 命 斗 争

植中校董会和行政上主要负责人多为国民党人，但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热爱祖国拥护抗战的开明人士，有培育英才誓为抗战救亡的民族感情和愿望。因此，校内的进步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禁止。相反，他们采取巧妙、积极的措施，进行有利于团结、进步，同心合力为抗战救亡而效力的活动。具体表现在：校中主要负责人恪守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校的国民党、三青团组织除了无法避免的发展党团员外，对国民党订发的所谓“防止奸党活动方案”，规定每月（季）工作报告中的所谓“异党活动情况”等项，学校当局均采取消极态度，进行抵制。在上报中，只强调办好植桢中学、南华小学（上报国民党中央时，把两校作为补训处特党部主办），提高官兵（指补训处）师生抗战热情，学好知识和本领，参加抗日斗争的行列。在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中能够办好两间中小学校，实属罕见。因此“补训处”、植桢中学的国民党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不止一次地获得好评，并不因拒绝搞针对进步人士的秘密情报工作而受到责难。另一方面，在粤省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下，植中亦遇到不小干扰。1943年底至1944年初这段时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风闻植中有革命活动，密电南雄县党部，大意是：“李肃文（李康寿在防城县中原用名）、张雪馨夫妇从防城潜赴南雄活动，李在植桢中学，张在南雄县府，希严加防范。”（其实张也在植中教

书)。国民党南雄县党部书记长何腾鸿接奉密电，以植中是警备司令黄某创办，不敢造次，乃电话约我，出示密电。我巧妙地说，植中并无“李甫文”老师，电文误指张在县政府，我更避而不谈。回校后，与黄植楠等主要负责人密商，决定由黄植农、岑国纪（教务主任）、张榕生（训育主任）联名去函向省党部保证李等在校积极办学，没有政治问题。这一保证函请黄植楠赴韶关专送省党部负责人。同时黄在韶关专访省社会处处长、中统特务陶林英，希望有关方面不要无理迫害植中师生，陶亦无可奈何。省党部接到我们保证函后极为恼火，电责南雄县党部不应把绝密电报泄露给我。何腾鸿接电后哭丧着脸向我求援，我严正地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应为抗战效力，作育英才才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份内事，不应横加干扰。我敢保证，责由我负，你怕什么，就这样回复你的上级吧！”通过这次较量，国民党特务制造借口，迫害进步人士，践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协议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我把事情全过程详告李老师，并嘱其安心工作下去。从此，植中的革命活动在中共地下党和李老师的巧妙部署下，顺利开展，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或明或暗的干扰和破坏。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陈云楷、胡德成、李秀群、陈允高、钟淑颖、林英干、黄焕月等在学习上与许多同学一道表现热情积极，带头参加校内外各种进步活动和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在南雄沦陷前夕，校内外遍贴革命标语，宣传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鼓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抗日救亡。在粤北抗日斗争史上添上动人的篇章。此后，有的同学毕业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担任县委书记、中学党委负责人和其它较重要的职务，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显著的贡献。有的考上知名大学，留学国外，

成为专家、教授、社会活动家，为人民效力。

（本文作者系民革广东省委宣传处处长）

九龄农学院创办纪实

黄兴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广东籍官员掀起一股办学热。最先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广州市长陈策，他在1946年6月倡办了海南大学，校址设在海口市；1947年8月，前广东省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跟着创办海珠大学，校址设在广州市东山竹丝冈。

1946年秋，国民政府主席驻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亲自召集粤北地方人士在行辕官舍座谈，张氏倡议创办文献大学——后改办九龄农学院，校址设在韶关十里亭。办校经费主要来源，是由广东省第二行政区所属十五县（南雄、始兴、仁化、乐昌、连县、连山、连南、阳山、清远、英德、佛冈、新丰、翁源、乳源、曲江）地方集资（田赋附加）和个人捐献。从1946年秋开始筹备，到1948年暑假在广州、韶关两地设考区招生，报考学生七百余人，取录农艺、畜牧、农经三系学生122人。9月正式开学上课。到1949年7月韶关解放前夕，学院经费来源断绝，自动宣布停办。

私立九龄农学院，是韶关解放前唯一的最高学府，在韶关市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一、创办九龄农学院的意义、目的及筹办经过；二、教学方针、学制及学系设置；三、农场及农村建设实验计划，对九龄农学院作全景式介绍。

一、创办九龄农学院的意义、目的 及筹办经过

粤北是一大农业地带，为全省农业生产重要基地，以农业为生的农户占绝对大多数。但土地贫瘠，生产技术落后，农民教育不普及，“以致得天独厚者反而日渐凌替，瞠乎人后，甚至于衣食不足自给，胼手胝足之伦，相率挣扎于载胥及溺之苦海。……揭櫫农业专门教育，此其时矣。”（严任杰：《本院创立宗旨及办理方针简述》·《九龄农刊》第一卷创刊号）九龄农学院是针对现实需要而创办的，它肩负着两重使命：一是研究农业高深学术，注重基础学理及实用技术之融合，反对空谈学理及偏重知识传授之弊；二是造就农业专门人才，要求养成“实用手脑”、“专业精神”、“服务节操”、“健全人格”、德才兼备的技术干部，体现了院训“致用崇德”的精神。

“院以九龄名，则所以纪念先贤张公也”。（引语出处同前）张公九龄祖籍始兴，公元678年出生于曲江。系唐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其功业、道德、文章流芳千古，足为后世之楷模。“九龄农学院之设，第一在师法张公立德之精神，以德性涵养体智，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努力；第二在师法张公立功之精神，为粤北大农业地带而至举国举世之农村农民而努力；第三在师法张公立言精神，为农林科学上学理与技术之阐扬与创获而努力。”（引语出处同前）

1946年秋，张发奎在行辕召集地方人士座谈会时提议筹建文献大学，藉以纪念先贤，培育人才，提高文化。文献乃

张公九龄谥号。1947年4月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以何春帆为主任委员，华振中为副主任委员，参加筹备委员会的有黄昌贤、卢从善（兼总务组长）、刘平、董百洵（兼总干事）、严任杰（兼计划组长）、沈秉强（兼曲江办事处主任）、关照祺、许伟

九齡農學院紀念

以農立國
以學興農

張發奎敬題



东、冯肇光等。在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上决定改名为九龄农学院。5月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改推华振中为主任委员，严任杰为总干事，撤消总务、计划、财务组。5月11日第三次筹备会上，决议定期成立董事会，办理董事会立案手续，草拟办理方针及计划，并推定华振中、卢从善、许伟东、董百洵、严任杰为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9月20日在广州行辕官舍由张发奎召集扩大筹备会议，出席扩大筹备会议的共36人。会上依案组成董事会，由张发奎、薛岳为名誉董事长，何克夫、华振中为正副董事长，张瑞贵、何春帆、官

九齡農學院
學忠教農

薛岳敬題

祎、王名烈、张勇斌、官其钦、薛汉光、黄昌贤、卢从善、冯肇光、黄菩荃、韦镇富、严任杰为董事。扩大筹备会上还组成包括粤北十四县的省参议员暨各县士绅共47人的基金筹备委员会。基金筹备委员会中有张瑞贵、张百川、张嘉斌、张勇斌、张显岐、张毓葵、张国元、张仲沂、薛汉光、张泽卿、丘国维、莫雄、刘平、王名烈、李大光、许伟东、廖炯然、黄昌贤、刘复英、虞泽广、严任杰等。其后，董事中因职务变动关系，加推林为栋、沈秉强、韩建勋为董事。另推聘张昭芹、崔广秀、李及兰、欧震、刘如心、刘平等为名誉董事。董事会成立后，筹备工作由董事会直接办理，由华振中、沈秉强、卢从善、韩建勋、林为栋组成常务董事，负责筹备工作。董事会推聘黄菩荃兼任院长，严任杰为代院长，代理院长职权。

二、教学方针、学制及学系设置

九龄农学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院务。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各设主任一人，规定由教授兼任。教务处主任聘请伊钦恒教授兼任，训导处主任聘请陆鉴熙副教授兼任，总务处主任聘请杜太为教授兼任，农场主任聘请王敬止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即聘请副教授梁家勉兼任。学院原定设农学系、园艺系、森林学系、畜牧学系、农业经济学系。学院开办伊始，办学条件未臻完善，故第一学年先开设农艺、畜牧、农业经济三个学系。农艺系由王敬止兼任系主任，畜牧系由余英敏兼任系主任，农业经济系由陆鉴熙兼任系主任。学院设立农村建设委员会，为农村建设实验机构，由陆鉴熙副教授主持此项工作。

除聘请专职教授并兼任行政领导外，学院另聘请兼任教授罗溥霖、程克、林刚、黄焕福四人，以加强教学力量。为提高学生研究兴趣，促进全校学术风气发展，学院特增设学术讲座，敦聘专家、名教授丁颖、侯过、黄昌贤、赵善欢等定期来院作专题演讲。学院专任讲师3人，兼任讲师1人，助教4人。

各学系开设科目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科目按部定开设，选修科目参酌地方特点和需要，酌量增加应用科目，并适当增加习作时数，引起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农学为应用科学，学理与技术并重。学理课程讲授后，随即在实验室研究、验证。与此同时，还很注重适于当地环境之各种特用作物之栽培、试验及种畜改良，如马坝之油粘，仁化之白芒茶，始兴之蜜梨，阳山、英德之鸡等等，均须加以研究改进，以发展本地区农业生产优势。使学生收到学以致用之实效；而农民则可以增加生产，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本科学制四年，采用年级及学分混合制。第一年级须修规定之共同必修科目，第二、三、四年级除修规定之必修科目外，另修选课。学生在四学年内，须修满142学分，始得毕业。第一学年须修满36学分，始得升入二年级；修满72学分，始得升入三年级；修满112学分，始得升入四年级。规定每学期最少须修18学分，最多不能超过20学分。学分计算方法：凡每周讲授一小时满一学期为一学分，实验两小时或三小时作一学分计，农场或林场实习以四小时作一学分计。学生在四年内，修足所规定之学分外，并须完成：①平时及暑期之农林场实习与工作；②研究论文；③农场、牧场或林场之经营报告，始得毕业。

三、农场及农村建设实验计划

学院附属农场耕地面积达3800余亩，地段毗连，其中冈岭地约2500余亩，可辟为林场或畜牧场；倾斜地约六七百亩，可作茶园或栽植果木；倾斜度不大，可栽植烟草杂粮地约300余亩；地势平整，可作水田或栽培蔬菜地约百余亩。

农场的经营管理分实验与经营两部分，以50亩为实验区，供员生实习试验之用；以150亩为农、林、畜牧生产事业之经营区。其余耕地分期拓展。试验农场将学院研究试验所得之良种良法，以及引进良种经区域试验适于推广之品种，设法尽量推广于农民。同时，编印各种试验研究报告、丛书、定期刊物等，以灌输农业知识，并派技术人员率同学生，遍赴各乡，指导农民推广。经营农场主要目的在于示范作用。所有播种、栽培、管理、收获及畜牧经营，均求其经济化、合理化，引导农民参观比较，起示范作用，同时可为学生将来经营之参考取法。另一方面，经营农场收入，补助学院经费。

九龄农学院为粤北最高学府，亦是唯一的农业教育与工作机构，对农村建设负有重大责任。因此，学院特设立农村建设委员会，作为农村建设实验机构。以各系学生、专修科、训练班学生为实验工作的干部，由学院拨出专款作实验工作经费，并请农村复兴委员会给予“美援”及技术援助，或请地方人士予以经济及政治上之协助。

农村建设实验工作分两大部分：

（一）农业生产方面：

1. 基本建设：①改进农田水利，筑山塘蓄水，植林垦田保持水土，推行凿井、机械灌溉等；②开垦荒地以增加生产；③指导农产加工，以增加农产品收益；④推行农地改革，使农民有合理之利润。

2. 科学或技术方面：①指导人工制肥，推广绿肥、堆肥，普及施肥知识；②成立育种试验场，搜集良种，广育良种，经风土试验后推广；③倡种抗病虫良种，制造防除病虫药剂器械，普及防除病虫基本知识；④发展推广农业机械及新式农具。

3. 社会或经济建设方面：①指导及推行农业仓库；②协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如生产、消费、运销利用等合作社，保障农民经济不受损失。

（二）农村教育文化建设方面：

1. 组织训练农民，充分发挥农民集体智慧及力量，如组织各种训练班、联谊会、福利会等。

2. 设立民众夜校，义务教授农民各种知识，推行识字运动。

3. 普及医药卫生常识等。

从招生开学之日算起，私立九龄农学院存在时间仅仅一年，历史很短，对粤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农业技术干部，发展粤北山区农业生产，提高粤北地区经济生活水平，虽然谈不上发生过什么重大影响或创造出什么显著成

，但它毕竟留下了历史脚印，实属可贵。在地瘠民贫，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粤北山区，他们那么热心教育事业，脚踏实地、集中人才、艰苦创业的精神，给后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本文作者系韶关教育学院副教授）

师表长留浚武间

——记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之叶应科先生

侯崇言

我市教育界知名人士、原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叶应科先生，字登元，曲江县武城镇人（现为韶关市北江区）。生于1885年，于1967年病逝家中，享寿86岁。

叶先生是晚清末科秀才，后毕业于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曾先后就任曲江县立模范小学校长、私立励群中学董事长、教导主任等教导行政职务，并先后受聘于乳源官立高等小学（晚清年代）、私立修齐女子小学、私立德华女子中学、私立励群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曲江县立中学、曲江县立第一中学任教师。任课学科以国文、数学、地理为主。遍及英、理、化、史、图、工、音、体，有“全能教师”之称，从教四十余年如一日。由于热爱本职，教学有方，效果良好，深得地方人士推崇，学生尊敬。如授地理课讲到那个地区，就快速地在黑板上绘出与地图无异的图示，加上板书秀丽，给人以美感和深刻记忆。在教学中，他善于探研规律，总结经验，并常以口语化歌诀形式，概括知识规律和公式，辅助学生，深化记忆。如代数之“同号相加，符号照公共，异号相减，符号照大数”，就为学生熟记不忘。

叶先生守时观念极强，办事十分认真。如上下课准时，珍惜课时的每一分一秒。课外作业，严格要求如时交卷，而

自己亦必认真批改，绝不马虎塞责或滞留迟发。每次收发习作，必自备包袱布包好，避免损坏或散失，并亲自携带来回于学校与住家之间，不要学生代劳。偶尔小病，亦坚持授课，从来不轻易请病假，做到言传身教。

清光绪戊申（1903）年，南韶连道府州厅县中小各学堂逐层比较表载（该表系省视学员郑祖仁列呈 宪 台 核准刊于“广东教育官报”）：全道高等小学教员统较有十一人为最优，叶先生是其中之一人。

民国三十三年（1944）三月，广东省教育厅检定先生之教学业绩，授予（文字第369号）服务奖状，彰其德行。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飞机对韶关市区狂轰滥炸。学校迁离市区，叶先生因不具备举家随校迁徙条件，乃携眷避难于曲江县龙归乡亲友家，靠从事中医维持生活，当地乡民因慕其名，纷纷携子弟来请教授中学课程，他本着诲人不倦精神，来者不拒。其教室则由有闲屋的学生家长提供，按程度之不同分级教授，学生人数少则数人，多至二、三十人。他认为此项教学活动，乃属国难时期权宜之举，不肯订出收费数目。而学生家长们为表达酬劳心意，只好以米粟茨芋之类的农产品代替修金，坚请他收纳，于是者数载不歇。

叶先生不慕名利，爱生如子。而弟子亦敬师如父母。如抗日战争期间，其学生、国民党军长欧震，曾敦请他出任官职，不应；再拟请挂职领薪，又婉却。如民国三十七年（1948），在韶关工作的昔日门生倡议为先生祝寿，他也婉辞。卒以诸弟子之再三致意，盛情难却，但仍囑戒从俭。于是有学生集资为老师祝寿之美举，门生故旧闻讯而至者二百余人，盛况空前，传为美谈。

叶先生对解决在乡村推行新教育问题，敢于针对时弊，

知无不言。如民国三十七年（1948），广东省立韶州师范学校召开第七届师范教育座谈会，他应邀出席，力陈推行新教育在乡村尚未建树信仰，难于进震之症结在于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微薄，提出须增加教育经费之呼吁。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故居，立即应曲江县立第一中学聘请，以六十四岁高龄继续任教。至1947年，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才离开教育岗位，以其精研得来的肺科良方，悬壶济世。因誉闻海外，香港、加拿大等地来函汇款购药者颇众。对贫困病者，亦常赠医赠药，深为闾里称颂。

建国后，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延聘他为馆员，按月汇寄生活费用，使能借此安度晚年，享受终生。

先生工书画，楷书、行书皆有较深造诣。七岁，即能代写春联，得资帮补家用。今曲江县马坝镇何屋村，尚保存有其墨迹。有画册，惜已散失无存。桂头乡莫家祠堂大门门额及两旁石柱对联的刻字亦为先生所写。当时身高不及门楣之半，只能站在小凳上为人写春联。

叶先生有四子一女，均能秉承家训，各尽其能。次子世雄，现居台湾，已退休；四子世强留台湾任教；长子三子均已作古。

附启：此记资料来源，除在旧档案、刊物搜集之外，还请叶先生女孙叶金凤，姻亲张彭老先生父女、阮云贞姥姥、冯清流老师及成剑萍、罗坤、叶培基等先生，提供补充，谨此致谢。如有错漏，仍祈知情君子，惠予补充订正。

（本文作者是北江中学教师）

过 去

(台湾)叶世强

离开父亲很久了，我想写点记忆。

一八八五年，乙酉三月十九日，父亲应科字登元，出生于北粤重镇，历代古战场的韶关，这儿三面环河，山峦围护，形势极是动人。风景优美，民风是诗情画意了。比起其他地方，我还是喜欢我的故乡。祖居近文魁楼，这楼阁，飞檐四起，漆黑薰烟，矗立在青石板的路旁，两旁是寻常人家。我依稀还记拆楼建路的情景，可惜一座古迹。

曾祖父叶长荣，举人，父亲是末届秀才。科举停办，转念两广师范，应是最早的学校。这期间，父亲的一位老师，留学日本，非常认真，无论教学与人格，都非常之好。我还小，很可惜已完全忘记这位长辈的名字。这长辈，大概是那时代最早的留学生吧！国家民族艰难，能够想起要出国留学的，必然是精英分子，有志之士。回国后，如要获得高官高禄，应很容易，但却选择清苦的教育工作。为的是，民族命脉，国家的下一代吧！又许，淡泊名利，只知埋头工作，不知自己，一忽儿被人遗忘。那时代被遗忘的恐怕不在少数，令人感叹。然而，归于无物，或更伟大。我缅怀这位从未见过连名字也不知的前辈。

幼时，曾经见过父亲画的南韶连地图，倍感亲切。父亲曾在这上面许多地方教书。依稀记起的有乳源和连州。一次，我和友人聊天，谈到辞职回乡任教，校工挑着行李送到

远处搭船，途中校工信口唱“长工送长工，一送送到半路中，一个西行一个东。”我们笑了。北粤多山，山歌自然很盛，乡村的人都可以信口成歌的。

在韶关城，父亲在德华教了几年，而以曲中、励群最久。励群的主教神父、修女非常敬重父亲。主教住在学校旁边的一座三层欧式大建筑里，前面有大片花园，有不少神父住在一起，学生们有时会到里面走走，我念小学部。耿主教时常会请父亲过去吃中餐。一次中午，我不知道父亲在里面，经过餐厅门口，转头望见父亲坐在主教旁边。凹字形左右两排长桌，坐着十数位身穿白领罗马装黑袍的神父。餐厅朴素整洁，安祥肃穆。主教金丝眼镜，说广州话，招手要我过去，当时我真不知过去好还是不过去好。随即一位穿白上衣的厨子过来帮忙，我才一步一步，规规矩矩地走到他面前。两旁的神父微笑着看我。主教当然是称赞我几句，问我几句，又用叉子一叉一叉的喂我几口甜糕。大约我表现得还得体，看得出父亲满心欢喜的样子。吃过后，我又一步一步，规规矩矩地走出餐厅。

毕少怀会长，早些时大家叫他毕神父，励群可能为其创建，后升会长。凡是见过他的，不论老幼，都会很喜欢他敬爱他，就像遇见一位菩萨一样。他对父亲分外看重，有很深的友谊，亦是最了解父亲的人，还特别拨出一间与校长相同的房间给父亲工作和休息之用，这是全校各教师所没有的。

虽然如此，六岁时，一次我进入这间屋子，都是粉笔味。桌子、椅子、百叶窗全是灰。不是尘灰，而是粉笔灰。盛洗手用水的酒坛，有子了。没有挂字挂画，没有瓶花，没有任何陈设，只有粉笔和学生的作业本。

曲中以前设在府学宫，相当规模的宫殿建筑，位于风采

楼近侧。牌坊式大门进去两旁有荷池，中间广场，环绕的回廊殿宇和大殿，花木参差其间，好幽雅的阅读环境。曲中的学生作风踏实，毕业后大多散落粤北四乡，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和影响。街道的另一头是道台衙门，从外望去，有几颗大榕树衬托巍峨雄伟。

我喜欢看父亲和客人喝酒，猜拳行令。也喜看父亲和客人谈天，不只是风度潇洒，而且带来愉悦和祥和的气息。教课如此，待人接物亦如此，大家很喜欢和他亲近。

有次，父亲带我去白土邓兆初老先生处看病，途中经狮颈，不远处，一位老农夫看一条水牛在河边小路上吃草，看见我们，不由得激动地叫出声“老师”。当时我很感动，父亲有这么好的一位学生呀！学成后，不图名利，回家放牛。边走边谈别后的事，到了前面不远处的冯屋，赶紧进去吩咐家人准备丰富的饭餐。临别，送了我们一段路，回头看见他还依依不舍地站在那儿，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见面难，再见亦难，人生如此！

狮颈冯屋，就在河边。对岸那边，扁石山背后官塘，是一位将军学生的故乡。一个是河的那边骑军马，立功立业天下闻。一个是河的这边放牛吃草，立行立德无人晓。牛也好，马也好，这边也罢，那边也罢，同是一条河，都是父亲喜爱的学生。是一首诗，是两幅画。

这一带有山有水风景好，河边有许多竹搭两三丈高的水车灌溉田亩，远近不时听到牛童唱给牛听的歌。

父亲喜爱书法，常有人请他写字写招牌。各街道，远处近处，总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不知什么时候消失。每逢过年，请写春联的更是多了，我充当临时书童，替父亲牵纸搬字。看到一个一个字出来，心里就高

兴。父亲没有教过我写字及做人，也许这就是教了。

数十年如一日，父亲的学生好多，尤以粤北。还有许多三代同堂，成为教育亲戚。学生遍及各行各业，皆有很好建树，以及纯洁的人格。

父亲没有著作，没有留下什么，也许已留下了。

子夜，梦中醒来，窗外，遥远处挂着一颗星。

无夜鸟

一片黑夜

一点星光

注：本文作者早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大气科学研究所任教授，现在台湾任教授，是叶应科先生之子。文章原用直行繁体字书写，除改横排和易简体字外，其他均无变动。



无夜鸟
一片黑夜
一点星光

葉應科

◁这是叶应科先生墨迹

民国时期曲江教育事业 的开拓者黄开光

黄兴亚

黄开光先生（1893—1966年），字子明，曲江县人，世居曲江县重阳乡黄土坛村。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曲江县城韶州（今韶关市）。先生幼从塾师学，性敦厚，勤奋过人。所授四书五经课业，熟读强记，背诵如流，且每有心得体会。1907年参加韶州府会试，年仅十四岁，为会试中人之最年幼者，然而成绩优异而获居榜首，故远近知名。

民国三年（1914年），先生毕业于韶州中学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前身），即投身于教育事业，在韶州第三国民学校担任校长，并在许家花园私立修齐女子小学兼课三年。民国六年（1917年），考取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国立中山大学前身）英语部深造。民国十年（1921年）毕业成绩优异，旋即受聘于母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曲江县长林熙畴（曲江县人）以服务桑梓，发展地方教育重任，请先生出任曲江县署教育局长。计自1922年起至1931年止的十年间，先生曾二次出任曲江县署教育局长。任职期间，一方面仍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兼课，一方面竭力开拓发展曲江县教育事业，成绩卓著，为县人所称颂。

先生出生于清末，长于民初，属于新旧交替的一代。他与同代热血青年一样，深受西方各种新思潮影响，思考社会

改造的途径，探索致国家民族于富强的道路，而先生与别人不同之处，则更富苦干实干的实践精神。民国初年，他在修齐女校任教时，即为创建重阳乡国民学校而奔劳。他耐心说服当地父老乡亲，将附近大舍庵、善化寺、皇公寺僧尼遣散回家务农，自食其力，然后收回庵寺每年贰万余斤租谷，用作办学经费。经先生极力筹划，先后办起曲江县第四区立第四国民学校（校址设在重阳暖水）和曲江县第四区立第七国民学校（校址设在登高约社学即重阳公馆内）。学校开设国文、算术、修身、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新课程。节假日先生探亲回乡，亦到校代上体育、音乐课，解决了因请不到体育、音乐教师而不能开课的困难。重阳乡地处曲江县西北部山区，远离县城50余华里，交通阻隔，地瘠民贫，风气闭塞，然而创办新式国民学校，却居曲江县各区乡之先。民国六年（1917年）暑假，他到广州出席广东省教育会议，以书面形式提议在改良私塾讲习所内筹设半夜学校，使一般普通人民，日间工作，夜间求学，学校所费无多，仅茶水灯油而已，教员则由学校职员教师义务分任。迨至先生主长曲江县署教育局任内，除曲江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校址设在始巷头原西水学堂今和平路小学），系1907年由曲江书院改办成立外，经先生手先后创办的还有，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校址设在东堤路原东水学堂今市人民医院）、县立第三高级女子小学校（今建国路小学）。此外，开办初级小学十数间，分设在城区各街道，以便年幼学生就近入学。县各区乡开办高初级小学近60间。曲江县立中学（后改称县立第一中学）是先生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亲手创办的。数年间使教育之花开遍曲江县城乡各地。

先生家境清贫，其父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忍痛将四个

女儿先后送与他人作童养媳。先生对四个女妹不幸际遭深感悲痛，决心要帮助她们挣脱枷锁，恢复独立人格，走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道路。及至先生在修齐女校任教，以坚强意志节衣省食，从微薄酬金中蓄积点滴余钱，将尚年幼的三妹采苹、四妹采繁赎回，送往修齐女校读书。二人先后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私立德华女子中学师范班毕业，全部费用均由先生负担。采苹师范毕业后，即留母校韶师附小任教，毕生从事教育事业，1986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采繁师范班毕业后，亦从事国民学校教学工作多年，高龄已达八十岁，与夫婿许炳贤（退休教师）白发齐眉，同事清福。人们称誉采苹、采繁二先生为曲江“妇女解放”的典范，也更敬仰先生是“民主”、“科学”思想的先驱。

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在任曲江县教育局长时，广东省政府意欲任命先生为曲江县县长，然而，他自甘淡泊，无心仕途且深恶政界腐败黑暗，况弃教从政，有悖初衷。为避免纠缠，只身走往广州，受聘于广东省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任教，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始回曲江，在省立韶州师范学校（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韶州师范学校先迁曲江马坝，先生与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日寇大举进攻粤北，战局紧张，韶州师范学校再迁仁化县水南村。是时，先生因病住院施行手术，不能随校前往，留家休养一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任乳源县教育科长。民国三十年（1941年）任广东省教育厅视导员，其职责是调查考核并督促指导省内各县市国民教育。先生克尽厥职，巡视足迹遍东、西、北江各县，其舟车颠簸，不堪劳瘁矣！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曲江沦陷，省教育厅东迁兴梅一带，

他举家避居重阳、一六两乡交界的瑶山半年。日寇投降，举国欢腾。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先生在谕兴县立中学任教。是年秋回韶，受广东省立志锐中学聘任为英语教师。1949年10月，韶关解放，先生以品学兼优，德高望重的教育界耆宿出任北江临时联合中学（志锐中学、韶州师范学校、曲江县立第一中学三校合并而成）副校长，1954年转任韶关中学副校长，1955年退休。退休后，被推举为韶关市政协委员，后又受聘为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1966年病逝于韶关私寓，享年73岁。

先生品德高尚，自奉俭朴，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其子女儿媳六人，并女弟侄辈等二十余人，受先生言传身教薰陶，俱在教育界服务，群众誉为粤北“教育世家”。

注：本文系就曲江县教育志办提供资料并作者访问黄开光先生后人口碑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韶州师范老校长黄焕福

侯崇言（整理）

黄焕福先生系广东省惠州市人，于清光绪十七年（1900年）出生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自幼耳濡目染，故有以教师为业之志。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应聘到台山县、新会县任教。甫三年，又图深造，升学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尚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已兼任广东省第二中学（广州越华路原广府中学）教员，并两次担任教务主任。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接任广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35年改称韶州师范学校）校长，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卸职，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嗣后赴任广州私立思思中学校长。建国初，任私立思思、植桢联合中学校长。后转业于制作供教学用之生物标本的工作。虽曾一度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仍一本爱国初衷，善始善终地走完了人生的历程。现将其为粤北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事略，简述于后：

一、发展规模与教学设施及效果

在黄焕福先生接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之前，该校曾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间一度驻军，致使设备损失不少。1923年，又因经费无着，师范班被迫停办，只有初中一个班，处于徒负“师范”虚名的苟延局面。原任校长黄遵庚，苦于经费困难，屡经辞职，竟无人接替，故未获脱身。持续至1929年秋，黄焕福接长之时，学校仅有初中、小学共四个班，呈

现门庭冷落状态。其时，适名教育家许崇清掌省教育厅，注重抓师范教育和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工作，黄焕福借此时机，以其为教育事业献身之精神，力争到增加办学经费，即招收师范生一班，初中新生一班，一下子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班数。次年，全校发展为十个班。第三年为十五个班，逐年增长，至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至仁化县水南村办学之时，已办有幼师、乡师、农科、中学、附设小学等近三十个班（确数未详，此系根据校友们的口述），在仁化办学期间，尽管是战时形势，困难重重，但由于人为的努力，不见其衰，反见其荣。学生人数达一千多人，教学质量逐年提高，校誉亦与日俱增。

黄焕福先生对完善各种学校规章制度是有其独具匠心之处。如改革建立校务的各种职能机构，设置有具体职责的教务、训育、图书仪器购置等等的委员会，以收群策群力之功；订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以明事有所循，职有所守；设置如“每月家庭报告表”之类的纪录表报，以稽核和督促教学工作；健全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参加各项活动和办事的能力；将以往只收高小学生入学的小学班扩展为具有一至六年级的附属小学，给师范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习园地；创设生物园，博物标本展览室，以提供更多的实物教材促进教学的效果；还创办民众学校、农场、员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学生消费合作社等等。创办以报道教学为主要内容的《韶师周刊》在校内分发并寄发给在韶各机关团体，公开通报本校办学动态。因而校誉日隆，气象一新。师生的精神面貌亦为之焕发。

黄焕福对遴聘师资，建立起比较精干的师资队伍是极其认真的。由他聘用的教师，皆是学有专长的人员，或是前清

拔贡生、廪生，或是留学生、大专院校毕业生、名画家、音乐家、体育家等。如陈希哲、邓西垣、李仲才、虞泽甫、司徒显、许筠台、胡瑩等一大批名师，均被罗致应聘，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德才兼备的建国人才。其门生遍及粤北各县，工作卓越者不可胜数，在国内外做出贡献者，亦大不乏人，如中央空军政治主任黄艺华、全国音乐界知名人士李凌，华东孩子研究院院长胡永畅、广东科学分院电子研究所所长邓乃炯、广东省人大秘书长林名勋、韶关政协主席陈仲舒等。人材济济，固出于名师教导和诸生之奋进，然担负选聘师资之责者，亦不无劬劳。

黄焕福在奋力发展学校工作的同时，还关注到社会民众的教育工作。他从既可以供本校师范生在学期间有机会多实习，以培训其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又能为民众教育工作尽一分力量着想，举办了一间民众学校，吸收七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失学民众免费入学，编非师范生担任授课，指定教师负责指导，还免费供给书籍文具。日校设在近郊，下午上课，方便附近乡村之来读者。夜校附设在校内，容纳市内学生。对促进平民识字，促进乡村文化作出了贡献，深得地方人士好评。

创设动物园是黄焕福办校的特色之一，这在当时的粤北山区中等学校里是独一无二的。园中收养有数十种珍稀动物，对增长学生的见识和引起对生物课程的兴趣，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黄焕福从一个几乎是“烂摊子”的学校接手过来后，奋斗才三年，就在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全省教育成绩展览会上，被评为各种成绩优良，获得“普通奖”；博物标本被评为制法妥善，神形逼真，获得“特别奖”。因而得到省内不

少公私立学校的约请代为制作博物标本。1932年12月30日，在举行“第三师范学校成立十一周年纪念大会”之际，得到各军、政、社团、学校、社会人士赠送的祝词、镜屏、银盾等贺礼者有80人（集体）之众。其中，以曲江县私立德华女子中学的祝词允称概括，其词曰：“三师建校，在我韶阳；长校得人，提挈有方；英才乐育，济济跼跼；十一纪念，成绩优良；莘莘学子，进步无疆；文化普及，学界有光。”，此后，还出版了一本熔史志于一炉，有社会名流题词，有师生照片的《三师概览》巨著，为该校史实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开办农科、农场、农民问事所

由于当年的粤北乡村经济困难，农业技术落后，农民食犹未足，遑论送子弟就读了。是故欲求在乡村推行教育，必须先求发展农业生产技术问题。早在清末民初，韶州府中学堂曾有农业班之设，卒因当时地方风气闭塞，招生困难，于民国十一年停办。黄焕福有感于师范学校之性质，当然负有改良乡村教育之责任，故自接长伊始，立即招收乡村师范生一班，并在校内辟隙为园艺之所，给学生以实习之用。及后招收高中师范、农科生，实习场地显然不足，乃发动教职员捐资，连同日前师生合办之农团余资，购置田地12亩，组成附属农场，以一半供学生实习之用，一半作员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既解决了实习场地，又办起勤工俭学。还在校内附设农民问事所，免费为粤北各县农民解答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疑难问题的函询或面询。此举在当时来说，实属创新。

三、采集和制作标本

博物标本是学校实物教育的重要教具。而依靠购置则不

唯所费甚巨，而且难得珍稀之品。黄焕福以其所学之长，亲自率领学生远出到省内名山、瑶山、产地，猎取和采集各种动植物，亲自教授制成标本。在接长后的三年之内，就收集有哺乳类37种，鸟禽类155种，矿物类100多种。既收到以实物深刻教育学生的知识和制作标本的技能之效果，又节省了一大笔购置费用。使该校博物标本品种之质与量，均为省内中等学校所稀有。

四、体育文娱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

学校的体育活动，在黄焕福的重视和亲自带头参与下，有如熊熊烈火，在全校师生的心坎中炽燃。校内师生之间作友谊球赛是经常有之。校外比赛则几战无不胜。学生的球队、歌咏团、话剧队等活动频繁。组织学生环市赛跑则为韶关之首创。在参加韶关市环市赛跑、万米跑、一百米赛跑均取得男女子第一名的荣誉。参加全省体育比赛二次，均获团体冠军。参加省“青年杯”男女子篮球赛，均获第一名。参加“中正杯”球赛亦获优胜。参加西北区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一。参加曲江全县学生演讲比赛，女生罗顺招获丙组第一名。参加全省抗日宣传演讲比赛，女生刘铿获第一名。

抗战军兴，韶州师范学校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黄校长的鼓励下，在师生中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和进步师生的倡导下，如火如荼。每当课余之暇，歌咏团、话剧队、宣传队都忙于演唱排练，救亡歌曲声传四野，节假日则到附近乡村宣传。寒暑假期间，即布置回家乡度假之学生组织抗日宣传分队，在各自的家乡进行演讲、歌咏、壁画、话剧等宣传活动。演出剧目有：《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顺民》、《塞上风云》等。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和唤起民众同仇敌忾，起到积极的效果。这些，亦招致国民党反动分子

对学校进步师生的“非议”和迫害。

五、惜才与保护进步师生

爱惜人才，敢于冒险，挽救进步师生，是黄焕福最使人不能忘怀的事迹。广州起义失败后，各地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1930年，广东省公安局派侦缉到韶关逮捕韶师生刘志强，刘经不起恐吓，供认参加了共产党。黄焕福先生得知此事，即通过曲江县县长的同学关系，到狱中看望刘志强，教他翻改口供，并要求县长复审。结果同牢另二人被杀害，刘得幸免，送广州市南石头惩戒教场，数月后释放。在抗日战争期间，学生有来自沦陷区的孤儿，亦有来自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遣散的政工队青年，其中不少人接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进步思想教育，勤于学习，亦热衷于抗日工作。新聘来的教师，学识丰富，思想多趋向进步，校内进步活动，常引起社会上某些人啧有烦言，以黄焕福的阅历，不可能不察觉，但他却以“听而不闻”对待，容许进步师生之活动，不理社会上某些人之非议。如有一次，某教务员郑重地对他说：“最近时期，国民党省党部经常来文指示‘防共’，你放手让他们（进步师生）终日宣传抗日，不怕被……”话未完，黄焕福即扯开话题说：“你当你的教务员好啦！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又如对陈志良女生，已知她的思想倾向进步，但爱她成绩优异，人品又好，办事能力强，敢于圈定她任学生会主席。闻知女生庞志芳被第七战区政治部以“异党嫌疑”逮捕，即偕同学生自治会主席陈志良去探监，并设法营救。不久，陈志良又被捕，他明知事出有因，但为了怜惜她的才华，敢于冒险，亲自往见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请求释放。李说：“陈某系正式共产党员，你不必理这件事！”黄焕福却严正地回答：“她是我的学生，我知道她

的言行较详！你所听到的是下级向你的报告，未必真实！” ，并恳切要求保释。李稍考虑，即提出要保证在六个月内随传随到，否则担保人要负法律责任，甚至要杀头为条件。他毫不畏缩，立即具结把陈志良保出，并在校内以额外 职员 名额，安排陈志良在候传限期内之生活。约过了三个月，陈志良提出想辞职往外地去，请示肯不肯让她走？黄焕福不经思索，立予同意，甘冒六个月内无人应传的风险。

在任用进步人士为教师和设法掩护其脱险方面，黄焕福也是胆略过人，做了不少工作。如原中共地下党增城中心县委负责人钟培农被国民逮捕，获释后，因爱其才，聘用他为教师。教学质量很好的女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陈孝真（是地下党员周康仁的爱人）为人热情爽朗，不慎把自己刻有“国共合作，共产党万岁”字样的项练盒随便给人看，暴露了身份。黄焕福先生得知后，立即找到陈孝真，并批评她：“你真傻！这些东西都能随意给人看得吗！”示意她赶快离校，免遭不测。又如对待再次应聘的李曼晖老师，明知他和自己参加了共产党的弟弟黄焕秋关系甚密，也敢于任用为训育主任。当得知国民党省政府要捉拿李曼晖之时，又授意他于次日离校，避免罹难。

上述事迹虽已成过去，但仍然能使人记忆犹新。仍为教育界中人深深乐道，故而为记。

注：资料来源，系根据原中山大学离休校长黄老焕秋以及老前辈司徒显老师口述纪录、《三师概览》和存放在广州机床厂的《黄焕福档案》。如有错漏，敬祈知情者不吝更正和补充。

李沛文与坪石岭南农学院

李锡龄 杨国威

抗战时期，原迁香港的岭南大学农学院，1940年10月又转迁粤北乐昌坪石建校。1941年9月开始担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李沛文教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发展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毅然离开家庭，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师生员工跋涉辗转于粤北穷山僻壤之间，在抗战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并且多方筹集资金，广录人材，开展柑桔等果树科学的研究。

李院长是广西苍梧县人，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又是民革创始人之一。已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的长子。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爱国的抱负，立志学习和研究农业科学，走上了科学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他留美获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工作。

李沛文教授专精于柑桔栽培学。早在他回国初期，即积极进行柑桔研究。三十年代，他在潮汕建立了柑桔研究所，进行柑桔无病母树的选种工作，防治黄龙病，柑桔贮藏研究。同时，对果实贮藏加工技术研究，也非常认真，发表了多篇论著，培养了众多的人材。他是我国果蔬贮藏加工科学的带头人。

自1942年起，原在香港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都陆续回坪石继续学习。从这时起至1944年秋，为坪石岭南农学院全

盛时期。教授多达十余人，学生人数140人多。学院农艺、园艺、畜牧三个专系。李沛文院长除总揽全学院教务、总务、财务工作外，还担任《农业概论》和《气象学》的课程，责任重大，工作繁忙。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想方设法与高教部、农业部及广西大学农学院联系，礼聘昆虫学赵善观、生物统计马保之等教授来学院讲课。李院长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教学内容丰富，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时值抗战期间，教师、学生生活甚为艰苦，李院长为解决师生生活困难，向外募捐，设置工读助学金。鼓励教师种植瓜果，饲养牧畜，补贴生活费用。在学校经费拮据、仪器设置不足的情况下，他发动师生自制教具，因地制宜，广辟场地，开源节流，使各个专业系都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农艺系附有水稻、甘蔗种植场。园艺系则有番茄、花卉、蔬菜、瓜圃园地。当时农院师生所种植的香豆花、番茄远近闻名。畜牧系则有养猪、养鸡、牧羊等场地以供学生实习。在短短两年期间，岭南农学院已具规模，蜚声国内。他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材，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外著名的农业教育家、科学家和国内科研、教育骨干。

抗战期间，岭南农学院在粤北坪石巖水崖之间，生活条件差，物质奇缺，在盛暑严寒迫人的情况下，李院长与全院师生员工同甘苦，共患难，不搞特殊。当时他的父亲李济深将军在广西桂林当行辕主任，他出身官宦，家境富裕，但他不慕高官厚禄，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兢兢业业，为农学院办了许多好事，甘愿牺牲许多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陈济棠将军主农林部，重金礼聘李沛文为农林部司长，而他再三却聘。其淡泊名利由

此可见。李沛文院长确是一位深受岭南农学院师生员工敬重的院长，至今尚为人们所乐道。

解放后，由于受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国家领导人、他父亲李济深的教育和影响，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从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比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尽管多年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李沛文教授是原华南农学院的主要筹建人之一。他一生身体力行，在培养优良校风学风，加强学科建设、罗致人才和培养师资及加强教学设备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十年动乱中，他受到迫害摧残，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抵制。他对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充满信心，并且付诸于晚年的行动。虽然年逾古稀，但老骥伏枥，奋发地从事教学、科研和学院领导工作。多年来，他充分利用他在国内外的社会关系和学术影响，积极促成了亚太地区蚕桑培训中心在华南农学院开办。从事荔枝开花生理研究，以及荔枝贮藏运销加拿大，都获得显著成效。

李沛文教授，生前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广西省一届人大代表，广东一、二届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生于1906年10月16日，终于1985年4月16日。享年80岁。

注：本文资料，参照李明启同志编写的有关李沛文史料、岭南校友简讯9期，谨此致谢。

刘荣基教授在韶关工作二三事

黄兴亚 洗鸿遇

原华南农学院韶关分院教务长刘荣基教授，广东台山县人。早年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畜牧兽医专业，获硕士学位。刘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在台山县中、女师、女中等校任教。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兼代拆代行中大校长职务的邓植仪教授，知其在畜牧兽医方面有专长，聘其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刘在教学和防治家畜疾病中逐渐显示出才华，被晋升为畜牧兽医系主任。

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远迁云南澄江。刘荣基当时滞留香港。适李汉魂主持粤政，起用一批专家学者担任政府部门要职。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原是中大农学院刘教授的学生，对刘的学识为人有所了解，推荐刘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刘荣基于1939年春夏之交，携同在香港的黄干桥、刘伯基、黄耀苍、邓浩存、谭沛荣、徐家鼐、孔昭英等到粤北韶关履新。当时农林局设在韶关市东郊约二公里的田螺涌。刘荣基到韶关后，号召中大农学院的同学及有关人员参加农业工作，共赴国难，为国出力。在刘的号召和影响下，农学院的同学及其他有志人士纷纷前往报到，听候安排工作。

刘荣基出任农林局局长后，把全副心血倾注到农林业生产工作上。他非常重视行政领导和技术人员的素质，严格挑选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和技术员。局内行政机构每个课的负责人，都是由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具有一定

工作经验的人担任，下属机构的领导，如稻作改进所所长黄干桥、畜牧防疗所所长黄耀苍、农业示范场场长邓浩存等，都是专业技术骨干，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行政人员，同样严格要求，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按才使用，发挥其特长。由于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懂技术，所以工作效率较高，推动了全省农林生产的发展。

面向农村，为农林业生产服务，是刘荣基主持农林局工作的一大特点。局内设有农业课、林业课、畜牧兽医课、蚕丝课、园艺课、推广课、经济调查课等行政机构，除此之外，刘荣基还在基层设有稻作改进所、畜疫防疗所、农业示范场、森林管理处等机构，直接指导和管理农林业生产。稻作改进所，在全省各地设有72个分所，每所设技士、技助各一人，主要工作是指导水稻改良和推广优良水稻的种植技术。中大农学院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教授，经过悉心研究，培育出一批优良的稻种。稻作改进所的技术员就把这些稻种带到各地，贷给农民试种，并无偿地作技术指导。使全省各地的水稻种植大大提高了产量。稻作所的工作人员，还经常走村过寨，指导农民进行田间管理，作技术指导。刘荣基也常常到各县巡视和检查工作，有时甚至偷偷越过沦陷区，前赴粤中、粤南巡视。

为了防治耕牛疾病，解决进口药品短缺的问题，刘荣基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业专长，领导畜疫防疗所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试验，终于研制出防治牛瘟疫苗和血清。畜疫防疗所按期购备一定数量的耕牛，每周一至二次，给选定的牛注射疫苗，待被注射的牛发病时，吸取血清，装入针筒，然后到牛疫区给病牛注射，使牛增强抵抗力而免于发瘟。一旦在某地发现牛瘟，只要有电报到农林局或畜疫防疗所，农林局

便马上派兽医会同畜疫防疗所的技士赶往治疗，深受农民欢迎。

刘荣基身任局长，但从摆官架子，对局内人员都一视同仁，有才干的，就提拔使用，没有门户之见。因此，局内上下的关系较为融洽。刘荣基很关心下属，对专业人员更是备加爱护。当时有一位姓黄的技士，是中共地下党员，有关部门曾密令刘要予以处理，刘见他工作积极，业务精通，不但不予处理，反而以本人的名誉，向上级作出担保，让他继续留在局内工作。由于他的领导，使全省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起色，增产了粮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荣基返回中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农学院独立建院，改名为华南农学院。刘荣基继续留在华农任教授。

1958年，华南农学院在韶关成立了分院。刘荣基主动提出到粤北山区，支援分院办校。他于1958年暑期来到韶关，任分院的教务长。随同他前来任教的，还有龚可望、邓国光两位讲师，分任畜医系、农作系主任。

刘教授在大专院校从教二十多年，来分院担任教务长，可说是轻车熟道，经验丰富。在分院建设上，他特别注重图书资料积累和实验仪器的配置。认为图书馆和实验室，是大专院校教学工作的中心，是办好学校关键的一环。在短短几年中，他想方设法使分院图书资料积累达七万多册，为韶关各院校之冠。分院有较多课程，都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要使学生多做实验，巩固理论知识，实验仪器的购置，同样成为刘最关心的大事。刘通过各种渠道，购置了一批教学仪器，还带动师生自己动手制作，补充了一批仪器，使实验仪器基本上满足了教学要求，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利条

件。

刘教授学识渊博，业务娴熟，畜医系全部课程，都可以担任。因此，在课程安排上，他先让教师们自己选择，剩下的尽是偏、深的“硬骨头”，都由自己开课；有时连英语课也要由他担任。他常常勉励青年教师，要多看书，多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传授给青年教师。

“大跃进”年月，各种各样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教学秩序被打乱，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刘教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对学生负责，保证教学质量，他在各种会议上仗义执言，反对因搞运动而影响教学秩序，有时甚至坚决抵制停课去搞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

刘教授1958年来分院时，已年过花甲。他原是华南农学院的三级教授，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相当优越。为了支援山区发展教育事业，他甘愿舍弃各种优越条件，把家属安置在台山县老家，孤身来到粤北山区，一晃就是五年。住的是单间平房，房内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几张木椅，极为简陋。一日三餐，粗茶淡饭，都是自己动手做，但他从没有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坦率随和，人缘很好，全院师生都很乐意接近他、尊敬他，说他是一位难得的有事业心的老学者。

华南农学院韶关分院，从无到有，三五年间发展成为一间颇具规模的大专院校，这是很可贵的。据不完全统计，韶关市县的农业或科技单位，都有分院毕业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长为业务骨干，也有一部分人担任行政领导。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技术专长，为祖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才智。每当我们回顾分院初创、发

展的历史时，对耗费不少心血的刘教授，莫不寄予无限的钦敬和怀念。

（龚伟平根据黄、沈二人来稿综合整理）

廖平子与彭加木

1942年，彭加木（七十年代后期，以科学家身分到新疆沙漠考察，后来失踪）到韶关仲元中学求学，当时17岁，叫彭家陆。教彭“国文”的，是廖平子先生。彭家陆勤奋好学，极得廖先生喜爱。廖平子擅长丹青书法，大亨每以重金求其画而不可得。但他却挥毫作画赠送彭加木。彭加木于1943年9月毕业，考上中央大学农学院化学系。就在这时，廖先生病逝于韶关。

廖平子先生是个多面手，不但能诗善画，而且自办杂志，宣传抗日。在澳门时，刊发《淹留》《天风》等。这些杂志没有一字是刷印的，全部是手写本。（每期约15册）在韶关，曾编出过《予心》五期，后即病逝。

（叶、艾）

艰苦办校、为革命捐躯 的徐尚同校长

侯崇言（整理）

“可爱的翁中，是坚强青年的孕育地，是民族战士的制造场……炮火锻炼了它坚强的意志，铁蹄激起了它复仇的怒吼。你看那瓦砾场上，不是重现出它的英雄的姿态；那绿荫底下，不是再来了它的雄伟的新装！”这是徐尚同校长面对翁源县立初级中学三华镇原址断瓦颓垣，毫不气馁，把激烈胸怀和雄心壮志寄托于教育好下一代的抒怀诗句。

徐尚同，字兴业，广东省翁源县翁城镇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于1948年1月25日被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九师指挥部以“奸党”之嫌扣押，严刑逼供，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嗣被解至国民党军事机关广州行辕，于同年7月13日晚上，被押至广州流花桥秘密杀害，时年45岁。1950年2月，翁源县人民政府决定，把翁源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改名为“尚同中学”，并在翁源县城建立“尚同亭”，以悼念徐尚同校长的英烈事迹。

徐尚同出身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代的邑庠生（俗称秀才）。他自幼秉承父亲徐懋庸的启蒙教育，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一向优异，德行兼优。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在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化学工程学系毕业。曾先后在翁源县立初级中学、防城县立中学、始兴县立

中学等校担任数学、物理教师，翁源县立初级中学（后改称翁源县立第一中学）、翁源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校长（兼授数理化课程）。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徐尚同应聘到翁源县立初级中学任教，由于思想纯洁，为人耿直，对当地的不良风气极抱反感，乃于民国十六年冬愤而辞职，远走他乡执教。嗣因家乡公正人士之热诚相请，才应聘回翁源，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效力。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翁源县教育会以徐尚同年青有为，工作能力与教学水平均优，一致选举他接任翁源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当时，该校校风不正，偷、赌劣习，时有所闻。徐尚同并不因此而畏却，慨然以办好学校为己任，并表态说：“如办不好，马上引咎辞职，主动让贤。”并明确提出：“苦干、实干、硬干”的办校口号，订出狠抓校纪学风的整顿方针。首先对上学期犯规的学生，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做害群之马，否则决不宽容。又严申禁止偷、赌劣习，建立起良好的教学秩序。既统揽全局，又深入教学，团结友爱之风，油然而生，扭转了以往不良的校纪学风局面。

徐尚同接任校长之初，正值日本侵略者挑起“七七”芦沟桥事变之时。形势的变化平添了办学的困难，延师、迁址、经费等问题，一个接一个亟待解决。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不得不亲自到广州聘请教学水平较高、又能领导学生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教师来校任教。1937年冬，因日寇大举南侵，广州实行大疏散，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部撤退到翁源三华镇，占用了全部校舍，学校不得不于翌年春迁到县属周陂雁鹰石的“陈氏宗祠”办学，厉行节约，想方设法克服

经济困难。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治大队”，曾先后到翁源县立初级中学发动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为适应救亡图存的形势要求，徐尚同乃将该校的教学内容，改变为除国文、英文、数学三项主科照常安排之外，其余课程，改为战时教育内容，包括防空、防毒、急救及如何组织宣传民众抗日的知识；把童子军课改为军事训练，音乐课，则亲自教唱抗战歌曲和指导排演宣传剧目。又亲自带头穿草鞋、吃粗粮，晨早集队跑步到河边洗盥，以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习惯。“同仇敌忾”和“卧薪尝胆”的风气，洋溢于校内，亦影响到社会。

1939年12月下旬，日寇企图打通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干线，由广州向北侵，首次窜犯翁源。徐尚同乃率领全校师生转移到翁北黄洞山区。在艰难岁月里，一边学习，一边准备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嗣因日寇退出翁源，乃迁回周陂。只见校舍满目疮痍，各种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无力修复，故于1940年春将校址迁往龙仙镇“蔡氏宗祠”（原东升小学），继续办学。四月间，中共翁源地下党组织，通过做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教导团政训室的工作，在龙仙镇召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坚持团结抗日为内容的军民联合大会，徐尚同在大会上作了声讨卖国贼的讲话。他强调，不仅要打击公开的汉奸，还要检举揭发暗藏的张精卫、李精卫，要加强军民合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那激昂的讲演，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未几，当地一些代表封建势力的豪绅，不满徐尚同治校的进步思想和刚毅的表现，乃散布谣言，恶毒攻击学校聘用“赤化

分子”等等，并串通翁东区的四个乡长逼徐尚同下台，还迫令翁源县立初级中学要搬出翁东区。由于进步力量的支持，学校易长之议虽未得逞，但迁校之举，却成事实。1941年，学校又迁回三华镇原址办学。徐尚同目睹断壁残垣，无比悲愤。面对山河破碎和当时的政治逆流等严酷现实，他并不气馁。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以诗言志，写下了一首《可爱的翁中》，抒发了雄心壮志的情怀，其后还谱成歌曲，在翁中校庆纪念会上演唱。

翁源县立初级中学迁回三华后，徐尚同有见于本县初中毕业生要远涉外县，才能升读高中，增重了家长的负担，稍贫者则无力升学的情况，觉得对发展本地方教育事业，培育人才，极为不利。于是积极提出筹办高中的倡议。获准后，立即四处奔走，发动全县各界人士集资办学，同时亲自到临时省会韶关遴选师资，1942年秋，办起了高中一年级，校名也改为“翁源县立第一中学”，为翁源县创办高中，克尽劬劳。

1942年秋，徐尚同被调到位于翁城镇的“翁源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接任校长，仍一本过去的严实办学之精神，认真整顿校纪学风。如1943年，国民党和三青团别有用心分子唆使校内个别品质恶劣、经常在校聚赌的学生，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制造混乱局面，还持枪威胁辱骂思想进步、认真管教的戴敏老师（共产党地下党员）。徐尚同立即进行严肃的处理，制止了闹事学生的嚣张气焰。1945年春，日寇第二次窜犯翁源。徐尚同率领留校师生转移到翁城和平村“郭氏宗祠”继续办学。当时经费来源十分困难，但师生同甘共苦，至日寇投降后才迁回原址。1946年12月，学生在墙报发表题为《蝗虫》的讽刺文章和《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漫画，影射

国民党驻军抓老百姓担石上山筑碉堡的虐政。当地驻军看后，气势汹汹，包围了学校，当时适徐尚同公出，驻军就威逼教导主任，要交出写文章作漫画的学生“查办”，一连闹了几天。面临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祸，幸得徐尚同回校与驻军营长据理力争，反问“学生写蝗虫枉食稻米有什么不对，错在哪里？”，并说：“我是校长，有问题由我承担，无需打扰学生！”理直辞严，解决了一场将要发生的灾难。

徐尚同知识渊博，文理兼通，尤擅长数理化教学，工书法、好弹琴和游泳，一向深得学生爱戴，美誉为“百晓先生”。在担任校长期间，六次迁校、远出延师、筹措经费、创办高中等业绩显著。亲自担任高年级数理化课程，深入教学，做出表率。凡有教师请假，必亲自代课，不使学生耽误学业，为培养一代新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输送出大批高质量的人才。已知的学生中，有厅、处级干部何俊才、林名勋、何兴裕、许先觉、廖拔成、梁怀珠等十数人，烈士陈德新、刘树坤等多人。对贫穷好学的学生除免收学费，捐廉资助外，还从思想上给予淳淳的教育鼓励。据其学生梁怀珠的回忆说，在一次极端困难的时候，徐尚同曾亲切地对他说：“怀珠！穷不要紧，只要有志气，积极努力，好日子总有一天要到来的……”。这数十年前的一席话，梁怀珠却记忆犹新。

徐尚同胸怀宽广，胆略过人，咸以助人为乐。被翁东区豪绅逼迫迁校后不久，闻知该区另行创立南浦中学之讯后，立即致函热烈祝贺，力争与翁东区人士捐弃前嫌，共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闻知翁城士绅拟筹建第二初级中学，立即倡议成立筹委会，不遗余力地协助解决延聘师资问题。嗣后，该校首任校长傅象环受到国民党翁源县党部书记长王亢

排挤，胡说傅校长是“守旧派”“年老昏庸”，并扬言要取代校长位置。在讨论该校校长问题的校董会议上，徐尚同主持公道，作了肯定傅校长晚年办学深得民心的发言，与会校董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由傅象环继续留任校长的决议。

徐尚同之任校长，正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而当时的抗战形势，又往往使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他在工作中，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教育，于是不顾个人安危，投向光明，毅然于193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并掩护地下党组织安全，经组织研究决定，可以参加国民党翁源县党部改选书记长的竞选。由于徐尚同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于1945年7月，被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任命为翁源县县党部书记长，仍兼任翁源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校长。同年8月，他的长子徐伯忠（共产党员、17岁）为北上抗日部队当向导，在返回翁源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扣押在韶关狱中五阅月，折磨至死。他虽失去了爱子，却把悲痛化为力量，继续为革命事业坚持不懈。

徐尚同虽被夺去了生命，其艰苦办校的业绩和为革命捐躯的浩然正气，长在人间，永式楷模。

（本文根据翁源县教育局提供之《徐尚同传》和《翁源党史资料》第1、4、14各期刊载之有关资料，以及走访离休老干部廖拔成及徐校长女儿芳芳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

李心钧先生生平史略

何希贤 谢君豪

李心钧，字少白。1904年3月出生于翁源县李村乡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李时珍是清代秀才，长期在乡村执教，胞叔李善根是拔贡。辛亥革命那年，他已八岁，和大人一起剪辮子“反正”，开始接受反封建的洗礼。学生时代，他勤奋好学，且在乃叔李善根的辅导下，对古典文学、格律诗词，打了下扎实的基础。后入翁源中学，校长许虞梅，亦是清末拔贡。他的文科成绩，常为全校之冠。十八岁负笈广州求学，适应时代的要求。

1923年考入广东大学预科（即中山大学前身）。当时的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主张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他既亲自听过当时在广东大学任教的郭沫若的讲课，也去黄埔军官学校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多方面受到革命思想和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和行动都开始倾向革命，还报名要去苏联留学。1925年，他与同乡徐尚同、张清水、李德厚等人，以翁源留省学会名义，编辑出版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燃犀》杂志，猛烈抨击当时以翁源地方团总陈子巽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向偏僻落后的粤北山区，传播大革命的火种。后来，对方亦组织出版《燃燃犀》杂志（主办人：许虞梅、涂泰等）与之进行论战。

1925年冬，李心钧等人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之命，组织回乡团，返翁源宣传禁烟禁赌，及筹建国民党翁源县党部，

沿途在英德等地发表慷慨激昂的街头演说，《燃犀》杂志里就记载了李心钧在英德县大镇街头发表《坚决反对日本出兵南满》的演讲详细经过。但他们这种革命行动，竟然遭到了翁源各地乡绅和封建势力的反对。陈子巽还宣布开除他们的县籍。但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负责人杨克文就曾给李心钧、徐尚同、李德厚、胡丰年写了表扬信，赞扬了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这封信登在《燃犀》创刊号）。

这时期，李心钧除了倾向进步之外，在文学专业上，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使他耳目一新。他刻苦攻读中西方文学书籍，又顽强地学习外语。短短的两年，他就掌握了英语和粗通法语。在广东大学直接受到郭沫若等的教导、启迪，完成了《海涅诗选》的翻译，并陆续在当时的《红棉旬刊》发表《自然、神话》等译作。由于他文学根基深，受过格律诗的严格锻炼，他译的新诗，也别具一格，为师生们所赞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后，正是他在广东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目睹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反动派把广州投入血雨腥风之中，革命的工人和学生血染珠江，大搜捕夜以继日地进行，不仅他想去留俄的愿望实现不了，连在广州呆下去也不可能了。他抱着忧郁和悲愤回到了乡下，无所事事，又加上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精神和身体都呈现出极度衰弱，1928年，他填过一首词《捣练子》：

人未老，魄空存，身世苦怜早处裙，欲薄云霄无健翮，
生涯如此太消魂！

这首词反映了他这个时期思想上受到的压抑是多么巨大，也

反映了面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惨遭失败后的痛苦心情。寻求怎样的出路呢？李心钧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教育救国。他深感翁源文化落后的面貌不改变，一切革命都无从谈起。要救国救民，必须首先振兴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此后，他决心献身教育，立志做一个乡村教师。从1926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他在翁源当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安心于教育事业。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国大地，当时李心钧是翁源第五区高等小学校长，他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将学校从南浦迁到偏僻的李村，并在学校实施战时教育。他为学校购置了大量进步书刊，亲自为学生报告平型关、台儿庄的光辉战绩，给学生讲红军长征的故事，邀请抗先队来校教唱抗战歌曲。为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将学生宿舍全都冠以历代英雄的名字，如“天祥室”、“可法室”、“武穆室”、“继光室”……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学习战场救护等。

1938年冬，他毅然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抗日救亡的队伍，再一次迸发出大革命时期的那股勇气。

他最先到韶关加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五政治大队”，任上尉书记（相当于秘书职务）。这个队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以留学日本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为骨干（如第二中队长卫国尧，第一、三中队区队长陈启新、叶傲霜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招收了大量进步学生、文化人组成的。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初为陈诚，后为张治中，周恩来任副主任，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第五政治大队大队长是谢静生，连平陂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他把李心钧当作大队部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经管队里来往文件的起草等工作。李心钧随这个抗日的文化队伍，

走遍了北江、西江、粤桂边前线，与广大军民一起，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也结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如解放后在广州文化局工作的黎明、广州房管局局长黎沃能、广州公安局工作的何琼玉、中山纪念中学校长江义（江士驎）以及《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等，都很友好，大家了解他是一个热情很高的爱国人士。李心钧这段时期还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同情工人阶级的斗争。

后来反共高潮开始，“政五”大队被迫解散，他经谢静生的保荐，去了陆军通讯军官学校任少校政治教官。当时这所学校驻在贵州省麻江附近，他在那里讲授历史、地理课程，对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由于他对历史深有了解，且为人正直，学识广博，很受学员尊敬。但学校的教务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湖北人），常常暗中检查他的信件，偷听他与学员谈话，处处排挤他，使他难于工作，最后愤然辞职。后来南京大学陈志方挽李心钧的对联：

贵州、邇匀视特务为怪人，丢官昔日；
银梅、南浦育幼苗成干部，遗爱今朝！

所指的就是这件事。

1941年夏，翁源东区筹办南浦中学，乡中父老频频电催他回乡出任校长。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觉得在军队中已无法工作，就下定决心，接受父老邀请，返乡任教，开始了他第二个十年的教书生涯。

他主办南浦中学时，正是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情况十分艰苦，物质条件也很差。他身为校长，还亲自上语文、英语、历史、卫生等课程。他还将在“政五”大队时认识的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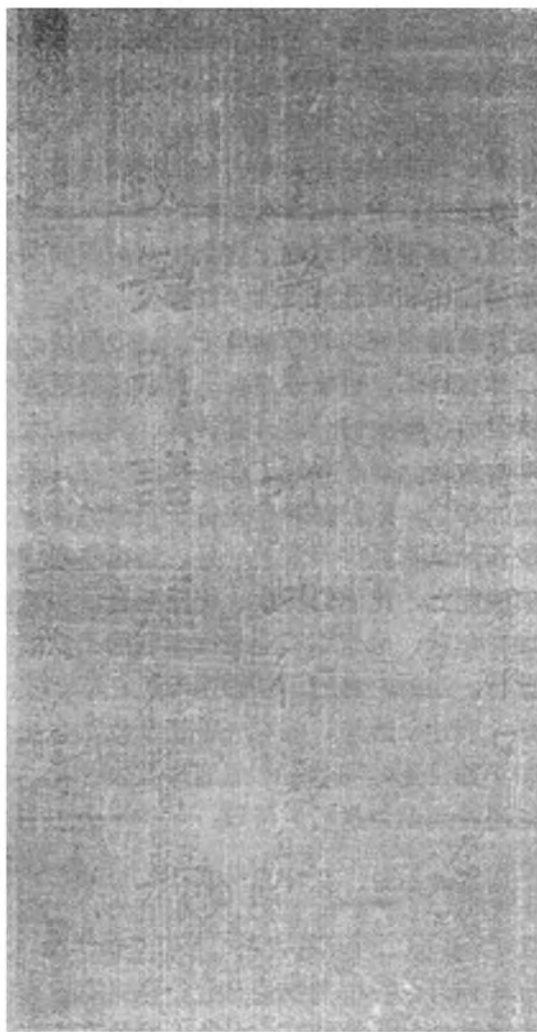
中共地下党员请到南中任教，并罗致了一大批从香港、广州疏散到翁源的文人学者，组成了他开创南中的基本队伍。此外，还派人跑遍曲江、衡阳、桂林，采购回大量抗战图书。和他在南中共事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有黄萍、郑盾、李琼英、杨裕豪、曲志民、霍玲等。他们协助李校长把南中办得很出色，首先是政治气氛十分活跃，学生不仅可以唱所有的抗战歌曲，甚至还可以唱上饶集中营被囚的共产党员创作歌曲《黎明曲》和陕北流行的《红缨枪》等。学生在这批政治、业务素质都很好的教师哺育下，进步很快，学业成绩普遍良好，体育训练，也收效显著。为了克服艰苦的物质条件，改善生活，师生们一起开荒种菜、养猪，大家又受到了热爱劳动的教育。现在各地工作的翁源干部，不少人是南中这个时期的学生，他们都对母校寄予很深的怀念。

李校长除认真抓好课堂教学外，还很注意培养学生进入社会的实践能力，让他们观察、接触社会，开阔视野，增长见识。1943年秋，他组织毕业班同学到国民党模范区——新赣南去旅行。当时，蒋经国任赣南专员，革新政治，破除陋习，禁烟（鸦片）禁赌，颇有一番新气象，在社会上影响不小。耳闻不如目见，同学们都想到那里去看看。在同学们启程时，他还特别赋诗送行。诗曰：

闻道赣南好，此行真壮哉！

临歧无别语，虚往实归来。

1945年元月，投降前夕的日寇，曾对翁源进行最后一次窜扰。当时翁源县长曾匪石，对敌人进攻不战而逃；敌人一退，他又瞒报灾情，大发国难财，群众议论纷纷。四月间，他无故扣留了五凤乡乡长及乡民代表，激起乡民的反抗。李



这是李心钧先生书赠学生赋诗墨迹

心钧等人更是愤慨，曾联名向省政府告发。孰料官官相护，控告未成，却被曾匪石以“勾结奸匪，指挥暴动”的莫须有罪名，撤去他南浦中学校长一职。李心钧感到在翁源工作，安全已无保障，遂步行至平远（当时省府所在地）再次控告曾匪石。返回之后，即留在连平陂头。恰好这时陂头创办银梅中学，那儿的乡绅就聘请他担任第一任校长。由于他办学有方，深得学生和家長以及社会人事的拥护，当时“南中”和翁（源）北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去了银梅中学。

开办银梅中学也是备尝甘苦的。他仍利用多种关系，招聘了很多得力的教师和他一起创业。短短三年，就把银梅中学办成学生家长都很满意的一所学校。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的教练梁焯也在当时银梅中学任教。这时期，也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与他共过事，有一些学生参与了地下党活动，但从未有过共产党员在他的学校被捕或受歧视的事情发生。对李心钧的为人、政治品德，可以概见。

1947年冬，解放军转入反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翁源开始动荡，地方绅士选举李心钧为县参议长，要他从连平回来，协助维持地方，不让当时的县长官家骥胡作非为。但这时李心钧正在埋头教书，多次催促，仍坚辞不就。一直拖到1948年夏天，经不住地方绅士的三番五次相劝，他才正式回到龙仙就任了县参议长，当时还兼任银梅中学校长，因为那儿的师生坚决挽留他。

在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敌败我胜已成定局的时候，李心钧竟而出任县参议长，确非他的自愿。当时翁源国民党的党政军矛盾重重，徐尚同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翁源县党部书记长，他深知李心钧不是顽固派，回来出任议长，可以从旁制约官家骥，何汝坚是联防大队长，也希望李心钧回

来，以便增强地方力量，与官家骥抗衡；官家骥也十分清楚，李心钧这个人“书生”，不会像何汝坚那样与他争权夺利，因此，李心钧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没有这个背景，离开翁源已三四年，且对翁源政局十分反感的李心钧，是不会出任议长的。

在他担任参议长至翁源全境解放才一年多一点。在这段时间中，他目睹了官家骥嚣张横霸、乱捕滥杀，只能在心里着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凭藉自己在地方上的一点名望和有个合法的身份，多次出面担保和营救了一些被捕的学生和红军家属。但后来连他最心爱的学生在广州文理学院就读的何秉欧也被官家骥在回乡的半途中抓来杀了，也感到毫无办法。他十分痛苦，曾多次告人：“官牛（指官家骥）一定会自取灭亡！”他出任议长，正是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他只是想维持一下地方，并不是对国民党存有什么幻想。这时，他写过一首寄银梅诸生的诗：

弯弯一水面三合，桃李春风满径栽；
赢得情深怀白也，梦魂长此绕银梅。

表达了他十分厌倦官场的斗争，留恋教书生活。

1949年春，官家骥曾以二百支枪、五千银元、五百担谷引诱李心钧代理翁源县长，好让他自己脱身外逃，李心钧坚决拒绝。后来，官又拨给二百担谷的“疏散费”，要他一起逃跑，李心钧自问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既不准准备逃跑，也没有领这笔逃跑费。1948年冬，他还兼任蓝李中心小学校长，翁源解放前夕，还再次兼任南浦中学校长。

1949年9月，解放军包围官家骥残部于龙仙城里，参议会在外围，已先由解放军占领，一位姓薄的解放军政委和李

心钧作了长谈，要他向官家骥劝降。这时，正遇官家骥派人来向李心钧打听可否向新丰方向突围的事，他就给官家骥写了大意如下的一封信，连同解放军约法三章的布告一起叫官派来的人带去。

“先生守土之责已尽，实已无愧于党国，今日与共产党结城下之盟，亦并非耻辱，望先生深明大义，效傅作义将军之义举，苟能停止抵抗，使龙仙免于战火，则功在先生，益在翁人……”

不久，官家骥即放弃突围计划，派人出来接洽投降。另外，李心钧还对南浦守敌林占鸾、陂头守敌谢岳臣发出劝降信件，亦收到了预定效果。李心钧这一行动，经过查证核实，广州军区在1985年6月给他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肯定了他这一历史史实。1986年2月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他过去的恰当判决，重新作出了“撤销原判，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书。

解放后，李心钧虽然收到了香港德明中学的聘书，希望他外流，但他不为所动，安心在家乡蓝李小学教书，一方面从事译述。他带病译完了苏联长篇小说《收获》和《列宁传》的大部分，直到错误被捕入狱，一直还是个爱国爱乡的教师。

解放后第一个春节（1950年），李心钧在他自己居住的青云居门前贴了一副春联：

青鸟传书，人民胜利；
云霞绚彩，国运昌隆。

他为人民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唱出了出自内心的赞歌。

1950年冬，他赋诗四首，送子参军，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

国的感情。诗曰：

久病情怀苦寡惊，绒开得悉你参军；
初闻喜极因涕泪，移孝原知应作忠。

教鞭放下请长缨，此是先声足夺人；
只嫌诗少幽燕气，吟就未能壮你行。

未固吾国美帝狂，年青争欲向疆场；
保国卫国抒壮志，不让先忧宋危郎。

长夜漫漫欲曙天，百年国耻快全湔；
此去应知珍重好，何劳汝父费叮咛。（注）

李心钧在个人生活上，十分纯朴。他憎恶烟赌，与糟糠之妻一生恩爱，白头到老，在乡间深受人们尊敬。李心钧青年时久病之后，还涉猎了大量医书，积累了不少行医的经验。他乐于给群众看病，不仅不收诊费，对穷苦的乡邻，还常代付药费。他的医术、医德，都十分为人称道。他在监狱里，也常常给犯人看病。

1959年4月9日，他自知病危，在弥留之际，给子女们留下了一封简短而诚挚的遗书，4月25日就病故于英德劳改场。信云：

“近日病情加剧，已从枇杷山生产队转回场部留医，咳嗽水肿，自知不久人间。你们是有前途的，望为社会努力工作，勿以我为念，祝你们幸福！爸爸李心钧 四月五日”。

他身处逆境，无嗔无怨，临终还谆谆教育子女要努力为

新社会工作，何其感人！现在他辞世已30年，历史还他清白，他如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注：李心钧次子李岳阳参军抗美援朝，这几首诗曾在志愿军中的一分报纸《抗美援朝前线》刊登过，成为当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热潮中的一段佳话。

韶关体育界老前辈司徒显

姜伟平

司徒显老师，是韶关体育界的老前辈。1908年11月25日出生于广东开平县，从小喜爱体育活动。中学时，就读于香港英华书院，寄居在堂兄司徒卫家里。他堂兄经常教育他要好好学习，洗刷中国人被污蔑为“东亚病夫”的耻辱，要强国，首先要强身。堂兄的教诲，更加激发了司徒显对体育的热爱。

1928年，司徒显考入广东体育专科学校。半年后，被老师推荐到北平（即北京）民国大学体育科继续深造。由于球技突出，司徒显入选民国大学排球队。在北平大学组排球赛中，民国大学队获得冠军。不久，司徒显被调入北平市排球队，打三排中位置（九人制排球）。1931年，北平队将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远东排球赛，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球赛被取消。不能出国比赛，为国争光，成为司徒显一生中的一大憾事。

大学毕业时，司徒显的海外亲属纷纷介绍他到国外工作，他都婉言谢绝，回到广州，做了一名薪水微薄的小学体育教师。1938年，经同学邹逸余介绍，司徒显来到粤北韶关，在广东省立韶州师范学校任体育主任。广州失陷后，韶师迁往仁化水南村的一间教堂里。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司徒显对体育工作从不松懈。为配合战时需要，司徒显经常组织学生开展爬山、越野、实弹射击、渡江、划船等体育

活动，使学生们炼出了强健的体魄。他除了上好体育课外，还组织了一支篮球队，利用早上和课余时间，进行严格的训练。因广州沦陷，韶关云集了许多大中学校，司徒显常常率领篮球队与各校进行比赛，次次都取得了好成绩。韶师篮球队成为韶关当时很有名气的一支球队。在1940年、1941年“青年节”里，司徒显带领韶师篮球队出征全省“青年杯”篮球赛，两次夺得男女子冠军，省府主席李汉魂给他们颁奖。韶师篮球队一时名声大噪。

司徒显初到粤北时，排球运动在韶关基本上是个空白，很少人喜欢打排球。司徒显出生在排球之乡，从小就爱好排球运动，对排球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立志在韶关推广排球运动。他和一些排球爱好者先在学校推广，向师生们传授排球技术，让他们掌握排球规则和基本动作，使排球运动开展起来，成为学校不可缺少的一项体育运动。学校普及后，排球运动便越出校界，推向社会，使韶关爱好打排球的人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后，司徒显离开韶师，先后到广州、清远等地任教。解放初期，司徒显被聘为韶关商联体育会总干事，全面负责商联的体育工作，指导基层开展体育活动，并为商联培养出一支篮球队。

怀着对教师职业的眷恋之情，1952年司徒显又回到教师队伍。到曲江中学，担任体育科组长。司徒显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学校体育工作积极负责，一丝不苟。尽管各种类型的课上过了无数遍，同一个教材也不知上过了多少次，但每次他都象第一次上课那样，认真钻研教材，不墨守成规，结合学生的程度和学校场地、器材的实际来编写教案。他上课形式多样，生动有趣，寓有创造性，非常受学生们的

欢迎。司徒显还坚持抓好两操和课外体育活动。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其他老师的配合下，司徒显把课外体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一到，全校的师生都行动起来。运动场上、课室旁边，跑步、跳高、打球、练单双杠、拔河……，整个校园都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这个时候司徒显最忙之时，他要负责督促学生进行锻炼，又要安排好学生活动的场地和器材，同时还要兼管学校运动队的训练工作。工作虽然辛苦和琐碎，但他从没有半点怨言，并且把课外体育活动当作经常性工作来抓，许多曲中的老师回忆道：“司徒老师在校的那段时间，是学校体育工作开展得最好的时候，特别是‘文革’前两三年，更是学校体育的黄金时代。司徒老师搞好体育工作，真是呕心沥血。”体育运动的开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师生们以饱满的精神、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促进了学校德、智、体全面发展。“曲中”当时的升学率，年年都排在韶关地区前三名，成为韶关地区颇有名气的中学。司徒显对教学和工作责任心，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1958年教师评级时，司徒显被评为曲江县唯一的一个四级教师。

司徒显还十分关心和支持社会体育工作。1956年，韶关市组建女子（成年）篮球队，缺乏教练。市体委聘请司徒显当教练，司徒显二话没说，走马上任。他一边在曲中上课，一边抽时间来到韶关，对女篮进行训练。经过短时间的指导，这支球队参加在汕头举行的全省篮球比赛中，仅输给广州队而名列亚军。以后，司徒显又继续担任了一些运动队的业余教练，悉心辅导体育苗子。

司徒显在指导开展体育运动的同时，还担任裁判工作，他曾在县市比赛中做过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

体操、游泳等项目的裁判员。司徒显对裁判工作认真负责，执法公证，裁决准确，受到参赛队伍的好评。每逢韶关地区有重大的体育比赛，体委总要聘他做裁判员。后被评为韶关地区“文革”前为数不多的一级裁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司徒显也受到冲击，被挨整批斗，但他还是坚持搞好教学工作，一直到1974年才退休。

司徒显在教坛上奋斗了三十多个春秋，学生遍布海内外，成为各方面的人才，其中有的人成为专业运动员，有的人当上了教练，也有不少人做了体育教师。

（本文作者系韶州师范历史教师）

始兴留穗同学会成立经过和活动简况

饶纪家

1945年9月，我国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由于连年战争等原因，至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始兴留穗学生和全国民众一样，普遍为赖以生存而又早晚时价不同的大米发愁，加上始兴经过沦陷，经济尚未恢复，多数家长要维持在广州等大城市就读的子弟的学习生活费用确实困难，有关学生也普遍存有学业难以继续、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以致无法安心学习。

那时，我从早年就读广州美术专科学校的饶纪汉信中得知，当时饶振澜担任始兴县教育局长时就有一批作为教育基金用的学田，其相当一部分收入是专门用于鼓励和支持始兴学生去外地继续升学深造用的。又据张显歧将军（现为广东省政协常委、省参事室副主任）反映，许多在外地深造的始兴学生都享受过这笔补助费。他在陆军大学学习时，振澜先生就每年都按时寄给他二十元银元作为他在外地学习的补助费，并附有一封鼓励勤奋学习、为家乡争光的亲笔信。可是抗战后期这笔学田谷补助款自转归县政府有关部门统管后，再没有按过去做法继续向在外地就读的始兴学生发放补助费。对此，我认为县里既然有这笔奖学金，就应继续为始兴留外学生济急解困，发挥其奖学和助学的的作用。为此，我曾个别找当时县政府有关人员接触，探询此事，但都避而不谈。后来，我们部分留穗学生聚议，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

集体争取才有力量。于是，决定筹备成立始兴留穗同学会。这一倡议很快就得到始兴留穗同学的热烈响应和在穗知名乡亲的大力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终于在1947年春，始兴留穗同学会在广州原南韶连同乡会二楼会议厅正式成立了。李子德、陈尚勋、林汉周、饶纪寰、何衍英等五人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饶纪寰兼任理事长。是日到会祝贺并一起参加会餐和摄影留念的始兴在穗知名同乡，有华岳高、李大光、黄耘非、李根林、萧湘南等十余人，他们同全体到会的留穗同学亲切把盏，尽欢而散。

同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始兴县政府的正式承认，取得合法地位。正好同年三月，饶纪绵接任始兴县长，他思想比较开明，于是我直接写信请他支持。他也很快就写来复信，同意备案并表示祝贺，并由始兴县政府刻发了“始兴留穗同学会”公章。从此，同学会的活动，就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

1947年夏，广州大中学生举行“五、卅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大游行。始兴留穗同学会在南韶连同乡会二楼举行理事会，李子德（中共地下党员）等同学在会上提议，发动在穗各校始兴同学参加示威游行和有关学生运动，大家一致同意。

是年暑假，我们回到始兴，便以留穗同学会的名义，再次找当时统管始兴学田谷的县教育科长陈美汉交涉，要求学田谷应按照过去的宗旨，专款专用，继续对始兴留外学生提供学习补助费用，但没有结果。怎么办呢？为了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经大家商议，理事会决定印发传单，公开张贴，把那些贪污吞占学田谷的事实，公诸于始兴广大群众面前。最后，在饶纪绵县长的支持下，终于在是年寒假，第一

次恢复了对部分留穗困难学生的学田谷补助。尽管杯水车薪，数量不多，但也使全体始兴留穗大中学生深受鼓舞。这是始兴留穗同学会通过斗争所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1948年春，我们始兴留穗大中学生三十多人为了进一步密切联系、增进友谊和欢庆初步取得的胜利，在广州康乐村原私立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校址）内举行联欢会。当时，尚在岭南大学读书的张发奎将军女儿张桂芳小姐，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次联欢活动。

1948年夏，我和陈尚勋因毕业离开广州中山大学，李子德等同学亦因转往游击区离开广州。同学会经过改选后，由林汉周、饶振淮等负责，一直坚持到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胜利完成了同学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韶关市政协副主席、民主促进会韶关市委主委）

坪石小忆

(香港)叶惠恒

青年时代一去不返，脑海浮现的片断，已变得迷蒙。坪石就读时刚是一年级，乏善足陈。

虽年级最低，但老师最好，可谓钢铁阵容。郑天熙博士授动物课，他个子矮胖，面挂笑容，讲授明晰，而每于下课前五分钟的速试，令许多同学手足无措。容启东博士授植物课，他身材高瘦，绅士风度十足，讲解不厌其详，并绘图注释，其黑板上绘图之快而准，无人能及，是经验之成果。孔宪保博士从来空枪上阵，手无教本或笔记，他的化学方程式全部熟记，毫无错漏，是今之电脑。他烟斗不离口，授课时英语中常间以嗒嗒之声，是其特色。其他课目则印象模糊。中文科原无教授，越俎代庖，以院长之中文秘书钟文森先生权充。钟先生乡言未改，不擅辞令，上课者寥寥无几，然钟老批改文卷至为详尽，蝇头小楷，一丝不苟，亦足敬重。

坪石校踞山岗，渡河往水牛湾或步行往坪石墟均感不便，课余生活颇为枯燥，娱乐较缺，同学颇有以音乐自娱者。较为方便是小提琴，亦有吹奏管乐器的。人数虽不多，竟能组成小型乐队，并曾于坪石墟上演。因陋就简，小风琴亦出阵，还有邝耀鼎同学所拉之大提琴，竟是木箱一个，容启东博士精音乐，为当日之指挥，他老人家兴趣盎然，十分卖力，不管演出水准如何，而他已乐在其中。学小提琴只一处，即中大师范学院，离岭南农学院甚远，须步行二小时，

山路崎岖，诚非易事，而学者不以为苦。或谓当时之老师马思聪，名闻中外，时机不可失，故纷纷就教焉。

至于农场实习，亦可作娱乐视之。种植蔬菜瓜豆，虽甚劳苦，一旦收获，自觉其甘。有同学竟种出甜美之西瓜，瓜形不大，而甜美犹胜今之台湾无核西瓜，殊属难得。

岭南属教会学校（注：此大学虽为教会人士所办，并不属于任何教会），坪石之宗教生活，因人而异。学院无主日崇拜，有心人则惟有参加培联中学之礼拜聚会，而无圣餐之设。曾经有一次，是由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主持者，但亦仅此一次而已。同学中虔诚笃信者不多。……

日寇将至，学院疏散，狼狈之情，历历在目。不少同学遗下行李，不能搬走，损失惨重而莫可如何。经坪石一散，翌年度在曲江仙人庙复课者仅得六成。而未半载，又一次疏散，苦况自知，毕生难忘。

金鸡岭至今屹立，风景依旧，人事全非。同学有重登岭顶，迎风呼啸者，但与昔时之体验，迥然不同。人生亦如是，幻变莫测，而时光逝去，倏忽四十余年，思之慨然。

（本文作者曾就读于坪石岭南农学院。1988年岭南创校一百周年，一行多人重游坪石旧址，因写此文）

抗战期间的韶关粤剧

唐忠琨

粤剧向来是以广州为其活动的中心。三十年代，省港大班，多是在省、港、澳三地轮番演出；而中、小型班，则多是下乡演出。当时粤剧的观众较多，所以成立的戏班达数十个。这些戏班艺人，大多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清同治年间，如著名的粤剧艺人（邝）新华、钩鼻章（何章）等人就在广州黄沙兴建了八和会馆，艺人们都依赖这个组织去演出谋生，这个组织，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前。

1938年秋，广州沦陷前，八和会馆被日机炸毁，粤剧艺人们纷纷离开广州，有的去了香港或东南亚，有的去了美国、加拿大等地；下乡的中小型班，多数客居异乡。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于1939年迁至韶关，第四战区司令部也设在韶关（曲江）。当时，曾组织过“军剧”。一些粤剧艺人也逃离香港，参加广西和广东的“军剧”。其中有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名伶，他们都是从湛江经粤西进至广西。马师曾组织的抗战粤剧团，名为第四战区粤剧团，曾在韶关演出。

广东划为第七战区后，司令长官余汉谋，也指令成立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剧团。这个剧团开始在广西活动，曾称为“广西动员委员会戏剧宣传团”，后又称为“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任命关德兴（新靓就）为该团的团长，其级别为上校。

在抗战期间，卖艺献金救国的粤剧艺人之中，关德兴表现比较突出。

戏剧家田汉，曾赠关德兴诗二首。序曰：

爱国艺人关德兴（新靓就）领导广东戏剧宣传团出海外宣传，赋诗两绝赠之。

不作寻常粤剧家，一弓一剑走天涯。

但求救得唐山者，我辈何妨作傻瓜。

捐得黄金百万归，牛精只着归时衣。

爱财惜命堪亡国，苦口婆心唱岳飞。

这两首诗作于1940年10月间，可见关德兴于抗战初期就到海外卖艺献金救国。

1941年10月香港沦陷后，关德兴携妻子从香港逃往当时仍为法属殖民地的广州湾（今之湛江）。他入内地所走的路和马师曾不同，他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先到达开平三埠，加入了以男花旦袁是我为主演的胜利年剧团。这个剧团除袁外，有文武生余虎臣，武生李少林，花旦陈醒依、绮罗香等。关德兴加入这个剧团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义演，筹款为抗日救亡而出力。他们在当时的非敌占区的三埠、台山、赤坎、鹤城、沙坪、肇庆、都城一带演出。

这个剧团由于标出“爱国艺人”或“节义艺人”关德兴义演献金救国，声势颇大，很受群众欢迎。1942年夏，该团进入广西，首先是在梧州市的南华天台（戏院）演出。事先关德兴与梧州市的警察局、伤兵医院负责人说明来意，因此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号召市民踊跃购买义演戏票，演出甚为成功，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德兴每到一地义演，必把从上一演出地买来的药品或

筹得的款项，送给附近的驻军或伤兵医院。他的义演救亡行动影响颇大，传遍两广。所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便委托他在梧州组建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剧团。因为当时广东的沦陷区较多，日寇尚无力侵入广西，粤剧在广西各地演出比较方便，而且这个剧团又是在广西组成的，所以既叫广西省动员委员会戏剧宣传团，亦称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

关德兴接受为上校军衔的剧团团长的委任之后，他即着手有计划地建立剧团，团员有来自香港和广州的高飞凤、马少英、马月琼、张远声、李伯秋、陈发等；也有来自胜利年剧团和梧州其他戏班的李少林、锦云天、锦毛鼠、张锡福、袁志光、蒋慧珠、李少卓等。这些演员都是经过关德兴严格挑选过的，因为剧团的生活比较清苦，都要具有抗日救亡意志的人方能坚持下去。这个剧团短小精干，只有三十余人，便于行动。

在梧州建团后，给团员每人发给灰、蓝色制服各一套（中山装。这种广西公务员制服，当时有人称之为“广西袍褂”），并发蓝底银字团徽一枚。他们的模样和纪律，甚似抗战时期的“军剧”，与普通的戏班两样。

关德兴，是小武新北的门徒。新北的门徒还有陈锦棠等人。关有深厚的硬派武功，嗓音洪亮，身材高大魁梧，所以他多是演一些小武、二花脸和武生、红生戏。当时，他所演的剧目，多是有民族意识、刚强威武的硬派戏，如《岳飞》、《戚继光》、《水淹七军》、《华容道》、《武松杀嫂》、《大侠甘凤池》、《神鞭侠》、《千里送嫂》、《月下释貂蝉》、《平贵别窑》等等。剧目内容颇适合于抗战时期演出。关德兴在演《神鞭侠》中有一个绝招，手挥长鞭，将摆

在舞台一侧的三支燃着的腊烛逐支打熄，能做到火熄而腊烛不倒。这种表演常常博得观众的掌声。他对当时的观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这个剧团建立后，先是在梧州演出，后来来到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义演。既然这个剧团又称之为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自然也要到广东各地去演出。因此于建团的第二年，即1943年，便经湘桂路，处道衡阳，进入广东的曲江、韶关。

广东省府自迁韶关（曲江）后，很多文艺团体和知名人士也集中在韶关周围，经大家倡议成立了广东戏剧协会。协会由省艺专校长赵如琳任常务理事，由第七战区政治大队（又称艺宣大队）的负责人李门任剧团联席会议秘书，还有当时广东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如胡春冰、赵越等人支撑该协会。该会虽然主要是管话剧演出的事，但也有著名的粤剧编剧南海十三郎参加该协会。南海十三郎原名叫江誉镠，当时他表现得不错，有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那时编写过一些与抗战相配合的剧本。关德兴也演过他的剧本。

其时在广东省内，韶关尚称为抗日后方，又是省府所在地，有些爱国艺人心向往之，先后逃出沦陷区而到韶关的，有武生少达子，文武生诗百篇，丑生陈醒民（花旦陈珍珠的父亲，已去世多年），以及男花旦金枝叶等人。这些艺人是自发而来，来到韶关才组班演出的。这一班人曾在韶关演出南海十三郎撰写的剧本《紫塞梅花》和《桃花扇底兵》，借用明末朝廷腐败无能之史实，来影射国民政府当局。金枝叶曾在香港大班演戏，以青衣、刀马见长，技艺高超。在韶关时，也曾和文武生陈少侠拍档。金、陈二人当时在韶关东河坝那个醒群戏院演出。金枝叶、陈醒民后来都到广西去了。

此后金枝叶一直呆在广西，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剧团演出颇有成绩，“文革”时逝世。陈少侠在“文革”前曾于广东省粤剧学校任教，也已去世多年。关德兴率领的官办“军剧”到了韶关之后，是在西河大桥头（现西堤中路市纺织品公司又是当年“关帝庙”对面）的大同戏院举行义演的。当时这个只有三十多人的剧团感到演员不够用，于是派出行政人员刘杏波偷越日寇的封锁线，经过一些三不管之地芦苞，转到南海里水到广州去招兵买马聘请演员。当时广州市内确实还有些粤剧艺人不愿在沦陷区演戏，不愿背上“落水伶人”之名的，于是有些人便应聘到韶关，参加官办的粤剧团演戏。但在当时，韶关常常遇到敌机的轰炸，空袭警报频繁，艺人们白天离城，到偏远的五里亭、十里亭等地方躲避空袭，晚上才入城鸣锣演戏。当然演戏是没有电灯作照明的，都是以大光灯照明，也没有扩音器，演出条件很不好，但艺人们仍坚持演戏，观众不少。据说有一次，关德兴在演《武松杀嫂》时，他扮演武松，有那么两句台词：“唉，好酒！好酒！……”，他是用广州话念的，观众听来似是“好走，好走”，以为是有空袭警报来了，于是一片哗乱，纷纷离开剧场逃跑，几经解释也止不住观众再看戏了。当时的官办剧团，办起来后，由于各种原因，遇到不少困难。从广州聘来的艺人，只好自己组织起兄弟班，穿乡过县，在南雄、始兴、坪石、乐昌、英德、清远各地演出。演的是《六国大封相》、《火烧阿房宫》等剧目。关德兴率的原班人马也辗转于英德、清远、四会、肇庆一带去义演。有不少人说关德兴是爱国艺人，铮铮好汉。

解放前韶关的文化活动

苏 信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至韶关解放前夕，曲江（韶关）县城的文化活动，比之抗战期间作临时省会时冷落沉寂多了。现将当时影剧院国泰、曲江、大华（又名中南）、醒群，以及民众教育馆等有关情况记述于下。

影 剧 院

国泰电影院

位于风采楼侧，现为北江电影院。该院于1947年建成。算是当时韶州最大最新的电影院，多映美国片。开张时，地面还是泥地凹凸不平，座椅概为长椅，杉木制成，一排排过，楼座则稍为讲究。

影院经理（老板）是陈华乐，新会人。主持院务（主要是宣传）的是祝荫庭，还有一位姓白的（名字忘记），协助宣传，另有财务（账房）一人，人员十分精简，其余都是职工。除每日张贴彩色海报、街招之外，还印发“戏桥”（说明介绍），遇到“猛片”，还出“特刊”，在票房出售。

当时各影院竞争十分激烈，努力争取观众，国泰电影院开幕那天，放映美国片《星光灿烂》，观众十分踊跃。

当时所进影片，由广州北上，赣州南下。美国片全是英语对白，并无翻译，资料也仅限于剧情简介。因此，影院中

没有懂英文的人才，就会吃亏。

祝荫庭与姓白的青年，很懂宣传行情，新片一到，经理与祝、白几人，即先行放映，边看边译，字幕随即写好，下午、晚上即用幻灯打出，效率很高。

院方最头疼的，是应付国民党驻军的要求，按规定，逢星期日上午，部队放假，驻军由帽子峰、五里亭、十里亭、犁市、黄岗倾巢进城，院方得为军队放“劳军场”，全是义务，分文不付，是职工最感头痛和麻烦的事。

为对付那些看白戏占便宜的人，院方雇请了两三个身材高大，有点胆识的壮汉把守闸口，入场收票。但对于韶州市区的宪兵、警察局，是不敢得罪的，并在后排留有席位。

有一个晚上，穿对襟唐装衫，敞胸含烟，大摇大摆的便衣侦缉，来院看戏，守闸口的问他们要票：“飞呢？”（广州话买票叫“买飞”）侦缉老爷一言不发，从口袋里探出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放于手心，说：“飞！”，（子弹广州人也叫“飞”，同音）见此情形，只好放进，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影院工作，十分辛苦。下午、晚上连放多场，有时连坐的工夫也没有。次日一早，就要作好各项准备，打扫院内外，因此，常常睡眠不足。又无节假日，待遇也不高，稍有办法的人，都不愿干。

中南影院

在风度中路东侧一条小胡同式的夹巷内，没有楼座，地形窄长，设备不如国泰。既放国产片，也放美国片。宣传工作也不如国泰，但地处闹市，颇得地利。

曲江影院

影院在西堤路，近河边，对面即为原河西浮桥。设备、场地也比中南好。亦放美国片。

醒群剧院

剧院设在东堤路也近河边，金字屋顶，十分简陋。专演粤剧，记得当时演员有谢先觉（文武生）、黄露霜（花旦）、小哪吒等。

1947年，曾有一歌舞团来韶演出，名曰“菲菲歌舞团”，主要演员是袁菲菲、袁圆圆、袁扁扁等三姐妹，表演的大多为大腿舞，用时代曲《郎是春日风》伴奏。也演过一些短话剧，上座率不低。

民众教育馆

曲江民众教育馆设在县城韶关北门原中山公园内（现市府大院一带）。1946—1947年间，韶关不再设市，县政府在建国路口，北江行政督察署设在薰风路，专员是沈秉强先生。

民众教育馆归县府所辖，因在公园内，环境宁静，但树木、花卉不多，平时冷落异常。

入门的甬道，可直通北门至北直街、帽子峰，右边有间黄色建筑物，门前围以竹篱笆，庭院内有一茶室，曰民众茶室，档次不高。

这座建筑物其实是个舞台，后台右侧便是民众教育馆办公室。舞台对面，是个球场。设有篮球架、旁边有一间狭小的阅览室，放置一些报纸杂志，供读者阅读。

民众教育馆与中山公园管理处，对外挂了两个招牌，实质上是一个单位。人员寥寥可数。馆长叫梁士嵩，兼公园管理处主任，他还在平治巷与湖南人张廷梁、黄三辛合办了一份四开的《中国日报》，由梁士嵩任总主笔。馆内除郑抒灵（馆长之妻）实际掌权外，还有一个姓黄的人员负责管理阅

览室；另有一青年姓朱，负责广告宣传。此外，还有一个花王，两个听差。

民众教育馆进行了如下一些活动：

一、举办过曲江健美儿童赛。1946年“四·四”儿童节，曲江各界曾办过儿童（学龄前）健美赛，地点于中山公园内。当时曲江也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许多救济物资，如克宁奶粉、罐头淡奶水、黄豆、衣物等。获得第一名的孩子叫张力行，肩上斜挂着一条白底红字的佩带，由他的父母代领克宁奶粉等奖品。

二、举办过男子篮球赛。曲江当时的男子篮球赛经常有赛事，有县级赛、有各区、乡联赛。除樟市、乌石、周田、白土、龙归、枫湾、大塘等地均有代表参加外，驻军也出场参加。记得有一次是驻军少将旅长张显岐也来参观，由梁士蕙陪同（张显岐解放后任省政协委员）。张部后来奉调山东。

三、粤剧演出。曲江当时驻有第九军官总队，队长是林廷华。总队有粤剧团，演出地点在中山公园的舞台，只演夜场。

演员有李楚帆、严慕贞（花名“肥婆莲”）等，与醒群戏院为韶关两处粤剧演出地点。

四、中山公园内球类活动。各学校的师生经常来此进行体育活动，如志锐中学、韶州师范、励群中学等。

此外，中山公园内有民众茶园，白天喝茶，晚上唱“女伶”，演出的都是曲艺节目，上座率很高。

阅览室与报纸

另，还有风采楼上的阅览室，内有各种报刊，稍具规

模，全日开放。

报业情况

当时的韶关报业，不甚发达。广州、香港报纸日日涌至，争取了广大的读者。

韶城的大型对开报纸，有《大光报》一家，总社设广州。曲江为分社，社址设风度中。记者有邓杰逢、黎瑞生、陈梅青等人。该报是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

《中国日报》社址设在平治巷内，是四开小报。社长为湖南人张廷梁、黄三辛。总编梁士藹。发行量不多，影响不大。

《和平日报》发行站。该报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原名《扫荡报》。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迁返南京，易名为《和平日报》。在韶关设了发行站，但读者极少。

（本文作者系广州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

忆韶关新建设出版社

陈 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包括各地的分支店）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迫害，纷纷封闭；广西桂林的生活书店还被禁止了营业，桂林的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和它的桂林分店也被迫结束营业了。进步的文化出版工作处于政治上极为艰苦的时期。

当时广东一带属第七战区。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是余汉谋，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韶关。韶关同时也是广东省政府的所在地。这样，韶关就成了华南的重地，不仅在政治上如此，而且在文化上也如此。前此，第四战区成立时，余汉谋等人为了抗日宣传，就成立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委员会，请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老国民党党员许崇清担任该编委会的主任委员。第七战区时，机构不变。

编纂委员会出版有二种杂志：一种是《新建设》杂志，这是本综合性的学术期刊，由许崇清担任主编，撰稿人大部分都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另一本是《阵中文汇》，内容是宣传抗战，主要是给部队士兵阅读的。此外还出版一些宣传三民主义及所谓抗战建国的书籍。

许崇清那时正在物色出版方面的各种人才，当时我与大时代书局的经理魏志澄由于业务上的关系，比较熟悉，许在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时，魏在教育厅任过科长。魏知道我这时

正遇新知书店结束，于是介绍我去广东韶关编篡委员会工作。

当时，新知书店已经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迫结束了业务，许多存书无法再行销售，工作显然要暂时停顿，但是停顿能行吗？可是又想：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编篡委员会显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机构，我参加到这种机构里去工作能行吗？于是我向新知书店领导作了请示。经过徐雪寒、华应申等同志的研究，认为新知书店既然不能再在桂林营业了，那就得另辟据点。我们考虑到许崇清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从他公开的著作上分析，可说是国民党的左派（解放后他仍作为中山大学校长、人大代表，又是广东省的副省长，文革时不幸去世）。而当时的两广与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蒋介石与余汉谋等也有矛盾；我们可以参与到里面去，见机行事。徐雪寒同志大力鼓励我到这个编篡委员会去工作，并要我设法带些新知书店的同志去，开辟另一战场。

经过魏志澄的介绍，许崇清知道我是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出版部主任，认为我对出版工作有经验，就委任我为编篡委员会的出版部主任干事。编委会为了扩大组织，把发行工作也抓起来，要另成立新建设出版社——设有门市部、批发部、邮购部等，发行和经售本外版书刊。许崇清要我负责筹建，并加委我兼任了新建设出版社的经理。

新建设出版社成立后，对继续进行革命进步书刊的发行工作起了很有利的作用。我一方面接受了新知书店领导上派来的同志，并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如：刘宗诒、王祖基、刘逊夫、李力行、严光裔、拾力、王坚、王斌、刘映辉等，销售书刊的大权都在我们的手里；只有会计和出纳是编委会派来的。另一方面我们借口新建设出版社开张要经销各

种图书，就把生活书店曲江分店的全部存书买了下来，实洋约四五千元，把桂林新知书店的存书买下了一半（一半由当时的广西文化供应社买下了）实洋约六七千元，再加上买下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图书，总共付了一万四五千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大数了。虽然在购买生活、新知等店存书时，折扣打得很厉害，基本上只有四折左右，但不是这样，这些书就只能搁置起来，无法送到读者手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同时，生活、新知等店遭到封闭之后，情况是很困难的，现在这样既能使存书有一个安全的出路，又能得到一大笔现款作为人员的结束安排。许崇清是不知道我们立即用这个编委会的经费去购下大批生活、新知等店的存书的，也不知道我们用国民党的钱来买下被国民党查禁封闭的图书，而且把它又发行出去的。

新建设出版社在韶关开幕了，双开间门面，还很象样。当时在韶关还有两家书店：一家叫“动员书店”，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办的；另一家是“青年书店”，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的。我们新建设出版社名义上是国民党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编纂委员会主办，它发行这个编委会编辑的《新建设》和《阵中文汇》杂志，并印刷出版了一些宣传三民主义和阐述经济军事方面的书，如：邱斌存的《广东币制与金融》，刘耀燊的《中日经济战》，李浴日的《闪电战论丛》，汪洪法的《1940年中国经济社会概况》等书，但实际上却从事着进步书刊的发行工作，把生活、新知书店等单位的宣传马列主义或含有革命思想的图书，巧妙而迅速地送到广大读者群众中去，同时又通过批发手段分送到全国同业中去。

新建设出版社成立时，职工几乎都是我们的人，长官部

的编委会只派了一个男会计，一个女出纳，借以掌握经济。国民党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只要防止贪污和经济上的走私，不去做别行生意就够了，这个会计和出纳，在政治上较幼稚，同时，他们正忙于社会交际，顾不到我们的业务性质。尽管当时由新知书店转来了不少同志，但我们的人手仍不够，还在当地招聘了十多个职员，但这些新添的人，均经过严格的考查。

因为我们在秘密地发行进步书籍，这就吸引了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读者，特别是中山大学的一些学生。我们把生活、新知、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店的存书三三两两地放在书架上，有的则夹在书桌上排列的那些宣传三民主义图书的中间。又由于我们和重庆苏联领事馆有关系，有办法弄到《莫斯科新闻》放在门市部发卖。这样，我们的新建设出版社就得到了进步读者的信任和喜爱，同时也就与动员书店、青年书店这两家国民党办的书店有了鲜明的区别。他们是一色的宣传国民党的图书，我们则图书种类繁多。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书店一开门就涌进大量读者，一直到晚上九点钟，还灯火通明，人头挤挤，读者恋恋于此，不忍回去，而我们的工作人忙得不亦乐乎，实感人手缺乏，每到晚饭后，干部、包括厨房里的炊事员都自动出来帮助（当时因日寇经常空袭我后方城市，韶关的各店营业时间是自下午三时到晚上九时，故我们也从三时忙到晚上九时）。

我们在发行这些进步书籍时，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也采取一些对策。例如：往往在三点钟开始，我们就主动“请”一批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到出版社来参观，这些人来书店，总是警卫保镖，乘着汽车，呼么喝六、威风凛凛，我们就利用他们的官场威势作为掩护，使得在同一条马

路的“动员”、“青年”两书店人员只能瞠目而视。这时新建设的书架、书桌上陈列的书当然都是“堂堂正正”的书，当这些人一离开，店堂里的红色书籍就隐隐现现的和读者们陆续见面了。有些读者对我们的业务也有所了解，暗示要进步书籍，我们尽量地满足。不过我们总是把进步的书夹在其它书籍中间存放，便于出售。每天晚饭后，出售到最多，因为那些要人们和大小特务们都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去了。于是我们的门市部陈列的书就换了样子。有时在白天，干部站在店门外望风，店员们在店内出售各种进步书，每当有特殊人物来时，望风者就打暗号，店内的同志就迅速地收起了进步的书；也有时某些人物竟会突然出现，店的主要干部就招待他们进入内室休息款待，让店内同志收掉进步书，不让“来客”看到真情。如果漏出了破绽，也不要紧。如某次来了一个广东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稽查员，指着进步书大发雷霆，干部们就假意批评店员，还说“长官部办的书店不许卖红色书”，就这样，使得一场可能发生的风暴，很快就平息了。

但是，利用新建设出版社从事发行进步书刊的工作，后来也受到特务们的注意。最初他们认为这是战区长官司令部办的，是自己人，用不到操心。但逐步觉得新建设出版社的门市部营业特别好，而“动员”、“青年”两家却是门可罗雀，不免引起“同业妒忌”，当他们发现我们有进步书在卖，就开始寻衅找岔子。当时我的职务地位比那些人高，于是当这些人来找岔子时，我就出来，看是有官衔的，就请到经理室款待，一面则表面批评店员不该卖某些书，一面也就故意骂给特务们听的。有时为了使一些小脚色不致捣乱，我们也结交这些人，请他们吃饭，看戏。当时我的月薪较高，

每月有三百多元收入（除工资外还有车马费），大多数花在这方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当地的一个戏院里，还每天包了一排座位，作为应酬之用。

当时，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对新建设出版社注意起来了。他为什么会对新建设出版社注意呢？除了新建设出版社暗中卖进步书，卖莫斯科新闻，以及在同业中引起“动员”、“青年”两书店的妒忌告密外，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新建设》杂志上刊出了中山大学一个教授写的文章《释〈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是毛主席写的，国民党办的杂志怎可为共产党的文章宣传？这一释就出了大问题，许崇清受到了当局的警告。并且还派了一个少将参谋来担任编纂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实际上是来进行监视的。这位少将参谋还派了他的弟弟来新建设出版社担任副经理，此人是国民党中校，实际上是来监视我的，同时有好几次发现我的信件被私拆查阅的现象。当时也有人告诉过我，要我自己注意一些。显然，反动派要施展阴险毒辣的手段了，形势紧张起来了。当时我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于是我开始做撤退工作，刘宗诒因有他事，早离开了韶关回桂林，王祖基、刘逊夫等先我离职，我也向许崇清提出了书面辞呈。在这之前我们把已发掉的一万多元进步书刊和还留上的一些进步图书，在帐面上都作了处理，细致地把每一本书名都改作简称，使人看不出是本啥性质的书，办理移交时，在图书清册上不发生一个那怕是细小的可疑点。当时编纂委员会只以为我任新建设出版社经理时捞饱了钞票，当然，我们是不会捞钞票的，为了进步的文化事业，把自己的工资都赔进用光了。此外，他们只是怀疑我，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所以我的辞职被同意了。

1942年春，我办完了移交手续，离开了韶关。

在这里还必须说明，新建设出版社除了上述在反动派的魔爪下，争夺下大批已濒于毁灭的进步书图，在全国白色恐怖下，继续使这批图书发挥作用外，它还帮助当时这三家进步书店——生活、新知、读书生活出版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协助曲江生活书店的分店启封工作，营救当时在曲江被捕的同志。新建设出版社在经营过程中，还给这三家进步书店的同志做了不少掩护工作，如他们跑单帮时给予开证明，给路条，在食宿上也给予方便等。

（原载《出版史料》第一辑，现作了部分改动）

爱国艺人关德兴

王斯德

关德兴先生，艺名新靓就，广东开平县人。他是粤剧武生，与薛觉先、马师曾齐名，闻名省港澳各埠。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旧金山本跟一家戏院订了三年合同，刚刚演满一年，抗战爆发，他就决心从事救亡工作并即向院主提出要求毁约，院主为他的热诚所感动，也就答应了他。他使用种种方法募得许多金钱和物品，寄回祖国支援抗战。

根据抗战十年《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一卷第一期，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写的《介绍一位斗士》一文中记载：

“他在旧金山为响应‘一碗饭运动’（按：捐献救济难民），便特置大饭碗一个，叫两个小孩扮成难民抬着前头走，他身上背三个小孩，再两只手一边抱一个，嘴里一面说一面唱，劝人捐款，就这样走过十五里的长街。走了一半已经走不动了。他振作精神，居然坚持下去，达到了他的目的。接着又有人举出一个五十磅重的龙头，说倘若他能舞过一条街便可捐若干钱。他本来很疲倦了，但是一来不肯服输，二来他索性认定了一桩事就拚命到底，所以他毫不迟疑，举起龙头舞动起来，可是这一次他病了十天。

他有一把三百斤的弓，放在门外，哪个开得三把，他便捐美金十元放进救济箱，如果拉不开，他便要求那人随便捐多少，这样也捐到不少钱。

他从旧金山回国，所过各处，随地募捐，募得大卡车多辆给政府。有一次，因为有一部车还不够钱，他排了一台新戏，等座中客满，他的戏演到一半的时候，他演说一番，跪在台前，那些阔佬，摔齐了二千美金他才站起来。

他到香港，义演募捐的事当然不少，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发起售旗运动，他第一个响应。他把行头全部都当了，买下第一面国旗，再到兵灾会去领了许多国旗沿街去卖，银行、百货公司、公共场所、普通商店他都去，有的人笑他，不理他，有的以为在另一方面捐过了便不再买国旗，可是他完全不管，他挺身立正在大商店的柜台前面，发出动听的演说，作极恳切的求请，有时站到二小时，脚不离位，口不停说。同去的人觉得难过，劝他回去，他毫不为动，始终等那商店的经理派人来接受了他手里的国旗才称谢而去。这样他募到六千余元。可是，火一般的热天，从早到晚，把他又累病了。他带着病一面组织粤剧救亡服务团，一面还为救济伤兵难民演着很重的戏。

他因为辞班许久，收入不足以养家口，他的太太因为债头过期被人告了，关进监牢去，慈善会的友人，都想从他所募得的款项当中提出一二成替他还债，他说：‘那不成假公济私吗？让我老婆去坐几天牢没有关系。’他严词拒绝，过后那个债主看见他卖旗那样热心，认他是个好汉，自愿请华民政务司把关师奶放出来，欠的钱暂时不问。

纽约、菲律宾聘他去演戏，他放弃了大量的收入，带着一班同事，自筹资金入内地宣传。他募了好几箱药品献给广东、广西两省的政府，沿途在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市）为征募寒衣演了一晚戏，筹得国币万元；又在遂溪、廉江、陆州、玉林等地室内和街头表演，玉林一晚，也筹得国币千余

元……”

又根据过去资料记载，关德兴于1942年随剧团转移至广西梧州，因为积极宣传爱国抗日，每到一地都举行义演捐献，影响不断扩大，并深得当时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好评，遂委托关德兴组建广西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随后又调至韶关，改称广东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活动于韶关乐昌一带。

关德兴，粤剧武功造诣很深。根据一些老艺人的口述和回忆四十多年前，我小时候在乐昌看过他表演的《神鞭侠》、《岳飞》、《千里送嫂》等剧目，他的演技确是名不虚传。

如在《神鞭侠》一剧中，他穿着得当，形象十分威武。操一条一丈多长的软鞭。台中央点燃三根白蜡烛。他开始站在舞台右侧离烛台丈多远，约鞭尾仅可触烛光之处。说要先打熄左边烛光，“啪”的一声，果然左边烛光即被打熄，再说要把右边烛光打熄，也随着鞭响而右烛火灭，最后说要打中间烛光，“啪”的一声也刚好正中烛头。火光虽灭，而三烛仍然直立。随后又将三根蜡烛重新点燃。这次，他声言要一鞭把三烛打熄。这时舞台上锣鼓停了，音乐停了，人们都屏息着呼吸似的，凝视着“侠士”那根长鞭。倏忽听到“噼啪”一声，鞭起声落，三根亮着的蜡烛同时熄灭，但无一根移位。观众又报以热烈的掌声，对关德兴先生成功表演给予好评。

又如关德兴扮演关云长，也确把关公演活了。他不但扮相酷似且具有北派的工架，京剧的武术，南派的唱腔。所以能把关公一腔正气，威镇八方，演得活灵活现，感动了观众。

为了了解关德兴其人其事，我最近还特意前往广州西关

拜访了与关老先生拍档多年的粤剧老前辈高飞凤女士。她今年已七十高龄，原是台山县粤剧团团长。她自1942年开始，跟随关德兴先生在海内外演戏，是剧团的花旦。关是她的长辈，说关先生喜欢演正统戏，不喜欢演卿卿我我的情戏。她与关先生合演过的戏很多，诸如有《岳飞》、《戚继光》、《神鞭侠》、《水淹七军》、《大侠金凤池》、《武松杀嫂》等等。她评价关德兴的人品与欧阳予倩文章内容近似，他不但对社会工作热心，对艺术工作也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他每天一早五六点钟便起床练功。从扎马、开拳、练鞭，从不间断，使其鞭功出神入化，这全是靠苦练而来的。关先生有一个绝招，至今未见二者。他可以“金鸡独立”一二小时，还可以在其练单脚独立时，请她用快速跳扎动作，用脚背把她接住乘起。这个动作后来在《离婚十八年》等剧目中加以运用，博得观众好评。

高飞凤女士还回忆在抗战期间的1943年1月5日，韶关市区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韶关民众死伤惨重。第二天，关德兴先生便率团在韶关市区演出长剧《戚继光》激发观众爱国热情，反对倭奴侵略。他扮演戚继光，演到中场，由于激动，把原来剧本的台词全丢了，竟脱口而出说昨天是1月5日，韶关民众遭受敌机轰炸，多少同胞惨遭杀害，我们能让侵略者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任意杀人吗？并宣传“我们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把身上穿着的戏服脱下，用作捐献，感动台下观众满腔热泪，纷纷捐献。以后又多次组织募捐义演（在当时的曲江大同戏院，即现西堤中路纺织品公司和乐昌的学宫大戏院均举办多次）。

最后，高飞凤女士还谈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关率团赴上海演出的情况。当时，京剧大师梅兰芳和京剧著名演员

麒麟童、林树森等，均亲来迎接关德兴先生。他到沪后第二天，京、粤二大剧种进行了艺术交流。由于京剧艺术家林树森是演关公戏很成功的演员，便由林演关戏，而关德兴就演出《岳飞刺背》（高飞凤饰演岳母），双方都演得很成功。在旧社会，同行有如敌国，二大剧种能进行艺术交流，剔除门户之见，也可见关先生思想开明，襟怀豁达，在沪粤两地艺坛传为佳话。

自日本投降后，关先生仍奔走于海内外为国难孤儿及残疾人募捐。他移居香港、美国期间，仍经常参加慈善筹款活动，深受艺苑同仁及群众敬仰与尊崇。

（本文作者系韶关市文化局艺术档案室主任）

民俗学家张清水

刘坚南

张清水，原名景优。1902年出生于翁源县李村。父亲张厚初、伯父张晓初均是清末秀才，毕生以授学为业。清水在这“书香之家”的熏陶下，自幼喜欢请父母及屋中长老讲古，如痴如醉常至深夜。由于他勤奋好学，于1924年考入广州市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预科就读。

在中大读书时，开始接近进步师生，阅读进步书籍，与徐尚同、李心钧、李德厚等同学，组织“翁源留省学会”，创办了《燃犀》刊物，内容着重：正视社会现实；抨击翁源的封建恶劣势力；呼吁官吏们须清正廉洁；严禁吹、赌、嫖不良习气。在此时期，清水还对民间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加入了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创导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常常在课余时间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创作。1927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民间故事集《海龙王的女儿》，该书由历史学家、教授顾颉刚题署，民俗学家容肇祖、赵景深写序。罗香林、谷凤田、林培庐、王先猷等民俗专家撰文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和广州各大报纸上加以评介，有一定的影响，为读者所喜爱（该书始售每册三角，继改四角，畅销城乡各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采取镇压迫害，白色恐怖笼罩广州。清水因常常参加集会游行，写激进文章，被广州市警察

厅作清共对象抓入监狱坐牢三个月，后因证据不足，加之学院出面担保，方始释放。

1930年，清水在翁源蓝李石背宽公小学任教。课余，仍潜心于民间传说的搜集、编写，同年出版了《伯公衣》、《狗耕田的故事》、《新年风俗法》民间故事集。1931年在青山乡中兴社创办私立学校，设古文专修班，着重讲授古典文学。邻乡学子慕名上门求学者，滔滔不绝。次年，编写出版了民间传说集《蔡家麻的故事》、《孟娥郎叫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因生活所迫，1933年春，民办翁大公路开辟竣工后，清水出任翁大公路“生民行车公司”新江车站站长。但在极为繁忙琐碎的事务中，他仍利用工余时间，与学门弟子刘克刚、官世科一起，深入乡村，走访名胜古迹，搜集了翁源、英德、曲江、连平各地方的民间神话传说，并合编出版了《魔术师》民间故事集。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据《清水民间故事集介绍》说：一个孩子读了这本书，会见了编者，扯着他父亲的衫角道：“爸！这是写魔术师的先生么？”“先生！我很爱读它。”另一个已有孩子而不会讲故事的父亲道：“先生！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反映了读者对民间文学的需求。同年，他自己编写了《太阳和月亮》民间神话故事集。该书由浙江绍兴民间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大书坊出售，并由文学家、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周作人，民俗学家、教授赵景深、钟敬文、罗香林写序。钟敬文（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在序文中写道：“这册《太阳和月亮》，是现在许多同性质的出版品中底典型的书物，但至少我总觉得它所收的材料，是非常地有益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等文化科学底研攻探讨

的。”“他对民俗学底资料底搜集，可说是十年如一日的了。他底不好的环境，似乎并不能怎样阻止他对自己所爱好的工作底前进。”罗香林教授撰序道：“清水是一个最努力于辑录关于民俗学材料的青年学者，自离开中大以后，即效力于民俗材料的搜集，数年如一日，终不稍懈。中大民俗百一十期中，清水撰述的稿件不下二百篇。厦门、汕头、揭阳、陆丰、广州、香港、杭州、南京、绍兴、漳州、福州、宁波各地已停版或未停刊的民俗周刊、旬刊、月刊，无往而不有他的记述，其数之多，真是骇人！”“已有的《海龙王的女儿》、《伯公衣》、《宝盒》、《狗耕田的故事》等集，都为海内外研究民俗学的人所称许，在神话与传说的辑录上，总算是最有成绩的了。”

1934年春，清水为了实现他更大的理想，毅然辞去车站站长职务，与同乡刘克刚重返广州，并由水路直达当时的国府所在地南京。罗香林教授在清水后来的著作《一只手》诗集中的序文里回述说：“我认识清水已久。三年前，我在首都中大（中央大学）教书，清水自粤来访，记得他北上时是跟着一个少壮军人同行，意思很明白，是想投笔从戎，凭着他那宏大的歌喉去发动抗战，然而，因别事绊着金陵。”

到南京后，清水栖身于凤阳旅社。由于他以前已与南京、上海的一些名流学者有文笔交往，在一时找不到固定的职业的情况下，只好拿起笔杆子，靠写文章拿稿费过日子。一年之后，经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授的罗香林介绍，到一家报社任编辑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迁居在闹市中的钟鼓楼。在南京两年，他以“清水、景优、愚民、钦佩、旗帜、油槌、鱼速、青水”等笔名发表了很多散文、小说、杂文、诗歌、民间文学作品。如上海赵景深主编的大型杂志《青年界》月

刊、南京《救国日报》以及上海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四川、西安、广州等地的报刊上。这些稿件，因一时来不及整理出版，后来，他编印了《两年来的著作目次》，以便于查阅。

清水在南京生活了两年，他除了埋头写作外，还常常以文会友，结识了不少文坛名宿，从他的来往书信和《纪念册》中获悉，与其书信、学术交流频繁者有郭沫若、周作人、何香凝、顾颉刚、胡风、蒲风、容肇祖、钟敬文、赵景深、罗香林、任启珊等文坛名流。此外，清水还加入了南京的“潮声社”、“青年文艺作家协会”等文艺团体。

1936年夏，清水从南京返回广州。他被聘为广州市一中高中国文教员。这一时期，他在文学创作上，逐渐地转向诗歌方面。在风格上，他十分崇拜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梅县人），曾撰文《诗人黄公度》，推崇介绍。

在此时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编辑翁源同乡会《翁声》，筹款、约稿、编写、印刷，为之日夜奔忙。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天津、上海相继失守，许多作家逐日南下，在广州出版刊物，大力进行抗战宣传。清水常常组织翁源留省学生、同乡会员，参加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知名作家的学术、时事演讲会、诗歌朗诵会。在这一时期，清水加入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广东分会”，与诗人蒲风（梅县人）等创办的“中国诗坛社”，并积极帮助发展社员，为《中国诗坛》月刊积极写稿。为了开展多样形式的宣传抗战，他与诗人们，常常在广州广播电台作诗朗诵和演唱自己创作的“客家山歌”，深受听众的欢迎。

当北平沦陷时，周作人没有离开，文化界的人都担心他有失民族气节，而被日本人所利用，纷纷函电北平，促他南

来。当时，清水亦以私人的名誉打电报晓以大义，劝他南下。

在广州，清水一直没有放弃民俗文学的写作。这段时间，他写作的《抗战故事》约有五十多篇，分别发表在1937至1938年广州出版的《中山日报》、《广州日报》、《民族日报》副刊上。在诗歌创作方面，为了便于朗诵，使群众易听易懂，他对新诗的创作，亦作了一些新的实践、探讨，1938年7月由中国诗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一只手》。诗分三集，汇集了其创作的新体诗三十二首。内容是：号召中华儿女奋起抗日；讴歌抗日民族英雄；声讨汉奸卖国贼。此书由著名诗人蒲风，中山大学教授任启珊，民俗学家罗香林写序。蒲风在序文中写道：“很好，同志，听你坚决地说起了《一只手》已经完稿，而且即将出版。在祖国如此的危急存亡中，无疑，我想像得出：《一只手》必定表现着坚强的意志，为了打倒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受伤，剩下一只手也要抵抗！”“我愿意《一只手》的能够早日出版，对于那些有志杀敌建国的同志，必定会打起无限的兴奋罢！至若那些糊涂的将校或官佐，让他们惭愧直到老死！”任启珊在序文中高度评价道：“清水先生是一个真性的诗人、是一个热情的诗人。因为他是真性的诗人，所以字字出于至诚；因为他是热诚的诗人，所以对于国家民族，事事都有感发。我相信他的诗和宇宙的巨大气流——风，一样，是有不可抵抗的力量的，他所赞美的，死者必能复苏；他所讽刺的，坚强也要摧毁。这一本诗集，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生气，也就是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毒气。”接着，他还创作了第二本抗战诗集《不吹姓名的炮手》，后因广州沦陷，没有出版。

1938年，清水接任《广州日报》副刊主编。7月以后日

寇步步进迫，敌机轰炸不停，羊城一片硝烟。这时，广州的一部分文人已纷纷疏散香港、澳门。清水没有走，与报社部份人员，一直坚持到《广州日报》停刊、广州沦陷前夕才返回翁源故乡。

回乡次年二月，清水被聘任为翁源县第五区高等小学校长，虽教务繁忙，但仍未放弃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创作。在这一时期，他编写了反映客家人的民情风俗、居住、语言的沿革变迁有十余万字的《客家人》专著（未出版）。在教学上，他仰慕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教与学合一”的办学方法，在自己的学校里，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实行战时教育的方针。在全县各学校中首创“学校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师生动手养猪、种菜、办小卖部，力图抵制社会奸商的剥削，以此减轻师生经济上的困难。此外，他仍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发动师生捐献财物救济难民，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对支援抗战竭尽全力。因此，荣获当时广东抗日军事机关第四战区司令部和张发奎将军的传令嘉奖。与此同时，清水还密切配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部份队员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当年的抗宣队员于光远（现中央顾问委员），曾以《我在翁源三个月》为题叙及此事。

在教学上，清水独辟蹊径，在各班级中推广普通话，开设“文章病院”，对学生的每一篇作文逐个讲评，就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写都不放过，并张贴于“病院”专栏上，使学生得到很快的进步。

1940年9月清水被委任翁源县政府督学。后因种种原因，于1942年春辞去督学职务，到乐昌坪石（广州）培联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师。1944年2月因患肺结核病，由学校送往韶关市治疗，住院月余不见好转，后由家属接回家中治疗。由

于病情已到了晚期，加上医药条件甚差，病情日益恶化，治疗无效，于农历4月12日逝世，享年只42岁。

清水逝世后，广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民俗学会和文艺团体以及生前好友纷纷发来电唁祭文，深为这样一个热爱民间文学、热爱文艺工作者的早逝而痛惜！

附：容肇祖教授回忆张清水情况的复信

编者按：本文作者刘坚南同志，为了更翔实地搜集、了解有关张清水先生各个时期的史实，去信过去曾在中山大学任教、著名民俗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离休教授容肇祖，请回忆介绍有关张清水的一些情况。后得到他的答复。现将他给刘坚南同志的复信，附载于下：

刘坚南同志：

你的信经北京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转了给我。你问及张清水先生生前有关情况和人品等。就我所知，答复如下：

我与张清水先生原不认识，只是文字之交。1927年我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28年主编民俗周刊兼任民俗学会主席。凡办刊物，都要有人投稿，张清水很勤奋，经常投稿。这样我对张清水印象很深。1942年，我复任中山大学教授（因抗日，中山大学迁到坪石），张清水当时在乐昌县培正中学教书，曾到坪石我住的一间小房子里看过我。我对张清水热爱祖国、热爱民俗学并为民俗周刊作了辛勤劳动，写出了不

少优秀文章，极为钦佩（他的著作和文章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仍然存在）。在出版张清水《海龙王的女儿》时，我曾为之作序。经过文字之交和面谈，我对张清水过去在中大学习和被迫离开广州有进一步的了解。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对共产党党员和持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采取镇压和迫害，张清水迫于反动政治压力，逃回他的家乡翁源。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问到他的政治面目。在谈话中，他的一腔爱国爱民族热情，溢于言表。当时正是抗战最残酷年代，因而感到他是一位很正直，敢于反抗封建反动势力，有民族感的爱国进步的知识青年。

其后，从民俗学的朋友听说张清水不幸逝世，深为这样热爱民族、民主的有丰富著作、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而痛惜！

我是共产党员，于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离休，现仍兼任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张清水是位热爱民俗学的作者，他早年为民俗事业作过卓有成效的贡献。仅将所知，提供你学习和参考。此致

敬礼！

容肇祖

1988年1月10日

△这是张清水先生部分著作



▷1933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周年纪念。邀请广州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清水被邀出席。图为与会者的签名。



27. 8. 24日在厦时。

回顾国画家许筠台

邱占宜

国画家许筠台先生，字应辑，1888年出生于韶关，毕生从事美术教育活动，终年64岁。

许先生是许菊泉的长子。许菊泉是清末期间驻韶州府盐务局的盐务出官，原籍番禺，祖居广州市高第街。其人忠直仁厚、能书善画，公务之余，欢喜赋诗作画，善于画山水花鸟，创作了不少彩墨画及绢画。筠台出生于这个优越的家庭，自幼深受父亲的诗书画的陶冶，凭借父亲身教的有利条件，利用课余时间，废寝忘食，专心抄习父亲的山水、花鸟画谱。在朝夕临摹前人的技法中，使许先生对书画的笔墨、色彩、气韵、品格都有较深的体会和理解；并使他认识到国画的范围广阔、技法繁多，领悟到国画与诗书金石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民族传统绘画的热爱，为以后从事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那个时期，他又深受广东岭南画派的思想影响，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点上，吸取西洋画法，在作毛笔彩墨画的同时，还常作指墨画，特别画鹰、山岩、松柏等。先生还精刻篆书印章。他的书法功力很深，它能与画格连在一起，颇有诗书画印会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许先生的画风日益成熟，虽生活清贫，但在艺术上却有着自己的展望。他热心、辛勤从事美术教育，前后任教韶关德华女子中学、励群中学、省立第三师范的美术专科教师十

多年。他一面授课，一面深研绘事，经常探索和创作，专心制造了大量动植物标本，绘制了不少作品，同时多次举办画展、讲座，影响颇大，从而成为当地杰出的画家和教育家。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曾亲笔致函许先生，对他的艺术成就，表示赞赏与鼓励。

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机大肆轰炸韶关市区，先生迁居市郊——靖村。在生活动荡中，他坚持作画，研习书法，抗议日寇侵略暴行。画有水墨意愿画：“看它横行到何时”及书法“中国必胜”……等。就在那动乱的日子里，韶州师范校长黄焕福，慕名登门，聘请许先生到校任教。此后，他除了教学与写作外，还积极带动同学参与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亲自制定宣传资料，指导学生绘了大量漫画，举办抗战图片展览，同时利用墙面，画上了大幅标语、壁画，对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起来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许先生仍居山乡仁化，常游丹霞、锦江一带，直接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素材，天天外出写生，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艺术风格更为强烈鲜明，按类编成画集，计有《鸟类大观画集》共6集，每集约40幅；《锦江山水画集》一本共30幅，还有大幅“巾堂”30多幅，四屏每堂4张，共有30堂。其余一批书法、印章、诗词作品，可说是许先生创作最丰盛的时期。

许先生一生为人正直，食衣简朴，他边教学、边创作，以卖画的收入，维持晚年生活。那时，许先生闻得江西解放，军民亲近，社会秩序井然。他期望韶关也能早日解放。到了1949年，解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他知悉自己的学生当上解放军指战员、地方领导等职务时，非常高兴，奔告亲

友。但建国后的第二年，由于年老体弱患病，他急回韶关治理，至1950年3月终以医治无效病逝。现今回顾起来，已是三四十年的事了。可是许先生的人品、画品，记忆犹新。现回顾追述一二，供大家参考。

(1) 二十年代末期，我还在童年时代。一次，我到中山公园（现在市政府所在地）游玩，偶然发现博物馆（现在北苑地址）有画展，牌子是白纸黑字的行书：“许筠台画展”，我快步到馆门探望，正在踌躇时，突然一声“细佬”，仿佛听到一句音质高，又和霭的语言：“入来睇啦！”我回头一看，原来就是国画家许筠台。他身段不高，头大、额高，面形稍长，两眼有神，嘴吧宽，说话快。他对我问道：“你来睇画展？”我默认之后，许先生摸着我的肩背，引导着一幅幅地看下去，并给予介绍讲解，使我初步懂得水墨调色彩画的牡丹、菊花，也有水墨画的雄鹰图和山水画……。有些画幅装裱很长，亦有小幅的昆虫花卉小品，形式多样。接着，他又问道：“你喜欢画画？”还在桌上放开纸张，用手指蘸墨作画。当时，引起了我画画的好奇心，见他先以手指画出鹰的背面，跟着画颈头、嘴甲…，很快画完一只站在岩上的大鹰。接着，以食指写上“雄鹰”隶书字样，还签名盖章，即时一幅壮观的中堂“雄鹰图”，显现在眼前，我感到又惊奇又羡慕。今天回顾起来，虽事隔半个世纪，但是许老的形象，仍令我念念不忘。

(2) 抗战初期，我在仁化县韶州师范念书，由于喜爱画画，特别注重图画课。记得首次上课时，一位穿着唐装的老师进入课室，啊！竟是许筠台老师。我在这里重见他，感到可喜可贵。许老的讲课动态庄重，声调带些番禺口音，声质响亮，语言清晰易懂。他的板书熟练、整齐。在讲解临摹水

墨画的方法时，他边讲边画，范画清楚，构图概括，用笔简练，使同学们精神贯注，不时发出赞叹之声。我按照指导方法，画完交上画纸，许老拿起一看：“那么快画好，不错！”我接着对许老说：“很久以前，看过你的画展，也看过你用指头画画。”许老感到突然，很高兴地说：“好好！我来画给你们看，”立即在讲台上直接挥毫。见他执起毛笔调墨，很快就发生浓淡、枯润的变化。一会儿，他又以水带墨、水破墨，加以色破墨、墨破色，使其墨色的浓淡变化，得到恰当的处理，许老一气呵成，一幅“牡丹图”，就出来了。其表现手法，着眼于牡丹与蝴蝶、色与墨的对比，画面显得格外生动艳丽。许老上课作画示范，使我大开眼界，领悟到它主要是以线造型，是运用色彩构成的。他的作画特点，是造型性强，题款贯注于画面形式的统一，又有强烈对比。许老在有限的课时里，能有步骤地指导国画写作方法，使我对彩墨画创作全过程，有了深刻印象。

忆西南作物品种改良繁殖场

谭 报

抗战期间，在韶关设立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西南作物品种改良繁殖场，是一个有较多的农业专家集中一起的单位，他们都有研究职务。因时间长，很多人和事都记忆不起了，现只能简单地作一些回忆，挂一漏万，记错之处可能很多，望知情者纠正。

自1938年广州沦陷后，省政府迁到粤北韶关。原在广州的大中院校，文化科技团体，也相继先后迁到韶关，使韶关跟着繁荣起来。

1940年，陈济棠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农业部长，关心农业发展，在西南各省设立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单位，以作物品种改良繁殖为中心，直属于农业部。其研究作物的范围包括西南各省，命名为“西南作物品种改良繁殖场”（简称西南场），任命丁颖为场长。当时丁颖是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院长，由梁光商主持具体工作。场的体制分为行政和技术两个方面。行政方面，设主任，由丁颖兼，副主任梁光商。下设有人事，由吕栋负责，财务会计有朱光英，事务有郑世昌等人。

技术方面，设有专员（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农艺师）有梁光商、丁宗墀、杨宗锡、赵善欢、于任杰、林元鑫等人。技正（相当于现在的农艺师），有梁省东、黄水光、史敏济、伍志刚等人，还有技助和见习生等职称，分别进行各项研究

试验工作。研究作物种类有：粮食作物的水稻、番薯、木薯、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甘蔗、花生等。并设有化验室、图书室、仪器室等。

繁殖场场址设在曲江县桂头（现属乳源）镇的松土围村与黑石头村之间的山岗上。购置有水田180多亩，在视永围村前段，属大垌田类，以山坡作旱地，约有200余亩。研究环境条件较简，但有一定山区代表性。水田种植水稻，进行品种国内品种改良、选育和栽培技术研究。水稻品种资源有二万多个，除外，还有国外的品种和野生稻、千粒穗后代系统等，都进行保存以供研究改良利用。经改良繁殖推广的水稻品种有：南特16号、白谷粒16号、暹黑7号、选占305号、黑督4号、大刚占、沙占等品种，在生产上起了一定作用。旱坡地种植木薯、玉米、甘蔗、花生等作物，并对各种作物进行引种、品种比较及杂交育种等研究试验工作。甘蔗进行分类选育种及制糖技术研究，设有小型榨蔗机和制白糖用的离心机等。植保工作，进行作物病虫害防治研究，并在水田设有测蛾灯，观察三化螟发生规律。土肥方面，引试种冬夏季各种绿肥品种，改良土壤。木薯是一个耐旱耐瘦高产作物，对木薯品种及栽培技术进行研究。梁光商教授编著了一本木薯的书，也是当时研究的产物。在抗战的几年中，繁殖场做了一定的工作，也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5年1月韶关失陷，场人员被迫迁往阳山县七拱镇，不能带走的品种、物资、仪器等，则搬往草头坪（亦叫草田坪）寄存，并留守部分人员负责管理。1945年9月，日本投降，繁殖场在阳山七拱的全部人员，再迁回桂头。解放战争期间，西南场改为华南区推广繁殖站，由桂头迁往顺德县大良镇，第二年迁回广州石牌。解放后，改为广东省农业试验

场，后改为农科院。

（本文作者是韶关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原市农科所所长，现已退休）。

余靖与《海潮图序》

料
·
资

收录于《武溪集》中的《海潮图序》，是广东第一篇海洋科学论著。

这篇论著里对海洋潮汐所提出的“潮之涨退，海非增减，盖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彼竭此盈，往来不绝，皆系于月不系于日”、“太阳西没之期常缓于日三刻有奇，海潮之日缓其期率亦如是”，一年之内“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中”，与近代潮汐研究的成果基本吻合。虽然它仅仅一千字左右，但在广东科研史上却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海潮图序》的作者余靖（公元1000—1064年），字安道，号武溪，曲江县人。官至工部尚书，是北宋一位正直的政治家、有建树的文学家和科学家。欧阳修曾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即佛学）、老子之书，无所不通。”

（冯苗延——1989. 2. 20《羊城晚报·晚会》）

抗战前后粤北医疗卫生概况

张念希

抗日战争爆发前，人们称之为广东“西伯利亚”的粤北山区，不但经济、文化、交通事业落后，而且，医疗卫生事业也极端落后。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山区，缺医少药，有些地方甚至是无医无药。农村中的人病了，小病就地采用土方土法治疗，若治不了的病，就得徒步走上十至几十里路，到较大的墟镇去求医购药；若得了重病，一般乡镇的土医生无法医治，只好抬着病人，走上几十至上百里路到县城去救治。有好些危重病人，常因得不到及时抢救和治疗而死于路途中。

三十年代初期，县以下乡村，根本没有设卫生院或卫生所，只有一些土医。在县级城镇中，也只有几个县，设有卫生所，西医人员极少，且多数没有进过学校。中医占农村医疗力量的大多数，业务水平也比较低。一些老百姓无钱看病，只好去求神拜佛，求助巫婆救治，或是听天由命。

以前，即使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比较兴盛的曲江县所在地韶关市，也有一间规模较大、设备较全，由英国教会开办的曲江循道医院。另有曲江救济院、市政局麻疯院以及民办宏仁善堂、广生堂、韶州汉医会、保产留产所等。在市区内，私人开设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诊疗所，也是屈指可数。

那时城乡环境卫生条件，非常恶劣，伤寒、霍乱、白

喉、天花、鼠疫、痢疾、疟疾、麻疹等传染病，广泛反复流行。每次传染病流行，死亡人数甚高，致使整个粤北地区，人均寿命仅有三十五岁。

抗战后的第二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政府机关北撤到韶关。此时，韶关是广东省战时省会所在地，各种机关单位和人员大量增加，使韶关城市气氛倍增，热闹异常。各种医疗机构纷纷迁来或建立，从而促进了粤北医疗卫生事业的较大发展。

由于韶关市及粤北各县变为抗日的后方腹地，在曲江、翁源、始兴、南雄、乐昌、仁化县的驻军，都设有后方医院，计有：陆军182抗日后方医院、军政部第85陆军总医院，广东绥靖主任公署陆军医院、军政部73后方医院、军政部第七战区177后方医院、陆军117伤兵医院、暂八师医院。

地方政府各种医疗机构和战时救护机构，也遍布各地。1939年1月，省卫生处随广东省政府迁来韶关。此时迁来粤北乐昌的，有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万国红十字会医院，在南雄有粤东盐务局医院。同年2月5日，成立广东省战时救护委员会韶州分会，并任命周添贤为主任委员，会址设在孝悌路（现西堤横）。曲江县救护委员会，也于同一天成立，任命张子良为主任委员，同时在黎市、西河、马坝、乌石、大坑口分设有救护网点。广东省政府，并于3月27日，在韶关市东堤路61号，设立“第一救护治疗所”。由于处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医药非常奇缺，平民患病，就医至难。救护所平时亦为平民百姓诊治疾病，对穷苦民众亦实行赠医赠药。

同年8月间，广东省政府卫生处所在地及黄岗、马坝、田螺冲、丝茅坪（后迁上窰村），亦分别设立第一、二、三、四间卫生所。卫生所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所在机关环

境卫生的检查督促和为政府公务人员、驻地人民群众诊治疾病”。9月25日，中央卫生署在曲江上窑村设立中央第五防疫医院。后因经济关系等原因，于同年12月结束。

1940年1月，广东省卫生处，接收“中央第五防疫医院”后，把该院改名为“广东省卫生处防疫医院”。但因该院位于曲江上游，对韶关市市民饮水卫生有碍，后来才改移于下游的长乐村梨花园新址。

1940年1月，广东省立医院正式成立。院址设在西河上窑村。由于成立时院舍未完工，药械设备未周，延至3月4日才正式开始收容病人。医院院舍一共有24座、医务人员共有70多人、药械共约有15万元。临床科室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产妇、眼耳鼻喉科、皮花科（皮肤花柳）等六个大科。辅助科室有：药械、检验、电疗、X光、事务、会计等六室。病房分有：特等、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共五类病房。医院当时还在韶关市区内开设门诊。随着工作及设备日渐扩展和完善，在当时成为本省公立之最高医疗机构。

为适应粤北地区抗击日寇，积极协助军事行动计划的需要，1940年1月间，广东省政府在曲江成立第一间病兵收容所，容量约三百人。省府于同月还在韶关市五里亭设立第五卫生诊疗所，在仁化县成立第二辅助医院。省政府又在二月份成立流动医疗队一队和粤北战后卫生队四队。省卫生处南路办事处的广源诊所，也于同月成立。

1940年8月1日，曲江县卫生院成立，首任院长为张子良，院址设在韶关市九成北路56号的民众寓所（现西堤北路）。广东省救济院同时成立，以竹棚为临时院舍，院址设在韶关市东河坝。同年冬季，由于前方伤员运抵韶关，伤病军人骤增所迫，省政府又在曲江长乐村筹设第二补助医院，

收容量为一千人、此纯为辅助军事临时医疗机构。

1940年间，各地相应地加快和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南雄、始兴、乐昌、英德、清远、连平、河源、龙川、花县等县，都成立了县卫生院。到1941年时、仁化、乳源、阳山等县的卫生院也先后成立。

1944年5月，温俊略医师（西医），在韶关市风度北路127号，创办一所“博爱医院”。内有医师二名、护士一名。药剂生一名。有普通诊疗器械设备，共设病床四张，业务范围以内儿科为主。同年9月，曲江县健婴留产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韶关市风度北路中华街，负责人是李群英、麦爱群。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45年1月曲江县领有私人开业执照证的，有西医师14人、牙医7人、中医48人、助产士6人。这些持有行医执照的医生，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城市，尤以市区为主。这些个体开业医师中，当时比较知名的有中医李仁溥（擅长内科、妇科、小儿科。还兼任熟药业公会理事长、商会会长，曲江县国医馆馆长之职）。还有杨庆麟、侯亦华、黄崇邦都擅长内科。谈伟雄擅长骨科。李抱真擅长针灸、杂症（是本市第一位针灸中医师）。西医中有苏日新、潘允和、袁涤山等人。

1945年1月22日，曲江告急，日本侵略军在1月27日攻占韶州城。当时本市所有医院的医务人员已撤离，曲江循道医院被日军改作日本陆军医院之用。

1945年8月23日，日本宣布投降，日军撤出循道医院。朱志刚、张新培等正式接管该院。并于9月1日恢复医院正常工作。9月30日，美国基督教也在连县双喜山重建惠爱、博爱两间医院，并开办民生、光惠两间护校。11月，曲江循

道医院为了方便民众就医，在市区东风中路115号，循道会礼拜堂前座屋中开设市区门诊。抗战胜利后，原来疏散了的医护人员都回城开业了，原来随省府来韶关的医务人员大都在1945年11月前撤走，返回广州。

抗战胜利后，粤北地区原驻防抗日后方医院及公立医院，都在1946年前全部撤离，这时，在韶关附近公立医院少了，私人个体开业逐渐回升。从抗战后的1941年至1949年算起，共增加私人开业诊所25间，而且每间诊所至少有一名医师，其中有6间诊所兼有护士，8间诊所还有助产士配备。

1949年1月，仅曲江县国药业，商业同业公会登记，就已发展为有甲级行堂8间、乙级行堂12间、丙级行堂15间、丁级行堂19间，共54间。韶关市内有中医诊所51间，其中中医内科医师有34人、骨伤科医师9人、草医杂症、针灸及游医8人。这些医师及其诊所，都集中在市区内，东西两河甚少。

是年在韶关的公立医院，除曲江县卫生院、曲江循道医院外，尚有从南京搬来的中央医院、后勤部71后方医院、94军后方医院，以及71后方医院院长私办的韶关医院。

解放前曲江循道医院

张玉俊

曲江（今韶关市）地处广东与湖南、广西、江西等省交界，水陆交通方便，历来是军事上必争的重镇。

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亦称卫斯礼会）以传教为名，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1878年派遣英籍牧师斯多马来韶。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反对洋教，对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一律不准进城。斯多马只得一直住在老东门外停泊的大货船——石马船上。循道会继在广西梧州、广东佛山开办医院后，又派人前来曲江筹建医院。原在佛山循道医院工作的英籍医师麦路德（Dr. Roderick Macdonald）于1888年受命来此，院址的选点开始是在东河坝，但在挖地基时遇上老百姓的祖坟，即遭到群众的抗议而被迫放弃该址。以后，曾先后在吾牙巷教友陈石柔家及原民生路教友孔广仁家租房，分别设立传道所和医疗所（吾牙巷在西门，民生路在东关，当时都算是城外）。

循道会牧师为了在曲江有立足之地，于1905年在河西尾买地建成西教士的住所（即原干部疗养所，现拆建为东病区的带花园的那三幢楼房以及现仍存在的，曾为荣军疗养院使用过，如今是粤北人民医院实习医生和职工宿舍的那幢两层楼房）。因此，1908年循道会再次派遣佛山循道医院英籍医师史密斯（Dr. Dansey Smith）来曲江发展医疗工作时，便在紧靠西教士住所的北面，买地建起几间平房和一座二层

楼房开设诊所，然后通过一位肖姓农民购得文昌阁石狮头小巷旁的一所油榨房，拆建为病房，兴办医院。经过几年的规划筹备，初具规模的医院基本落成。史密斯医师由于健康问题提早退休，1914年，循道会另派许诚恩医师（Dr. A. W. Hooker）前来担任曲江循道医院第一任院长。当时仅有病床10张，职工10人。后来医院规模逐渐扩大，并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

1923年，英籍医师卫保罗（Dr. B. R. Viekers）接替了许诚恩的院长工作，而1924年卫保罗又交班给外科医师何灵士（Dr. G. W. Hollings），由何担任院长。同年，英籍护士长韩敦小姐（Miss G. H mton）奉派来院创办护士学校。

1925年，广州“六二三”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上海举行反英游行，所有英国人都必须离开中国，医院及护校均告停办，医院和护校的房屋财物，暂由在医院工作的一位华人医师范亦峰（佛冈人）代为管理，而范本人则在风度中路与一位姓李的同事合办一间济民医院。

此时，在中国的英国卫斯礼会，易名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名义上一切教会的行政及牧业均交由华人管理，但实权仍在英国差会派遣来华的牧师、医师手中。例如差会拨款时，已明确分为医务费、教育费、传道费等项目，即使是先后担任华南教区主席的华人牧师黄仲凯、关更有和熊真沛等，也只能按照英差会的既定方针办事而已。凡是英差会主办的医院、学校，都有派遣进驻的英籍牧师和医师控制。曲江循道医院驻院的英籍牧师，先后有谢雅各、钟爱华、余维信和李惠霖等。

1929年，华南教区委派华人医师苏自新复办医院。苏是

第四任院长，也是曲江循道医院第一位华人院长。复办之初，只有几张床位，职工9人，以后逐渐发展至20张床位。在医院附设的护校尚未恢复招生之前，是由佛山循道医院护士学校的学生来院实习、上班的，每期半年。

英籍医师梅守德（Dr. S. H. Moore）于1933年派来医院后，为了掌管医院大权，宁可给钱让院长苏自新去自行开业，而由他自任院长。据此，更可说明循道医院虽然隶属于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华南教区医药事业委员会，但由于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英国循道差会手中，因此，中国人仍然没有什么自主权，一切必须服从外国人的安排。不过，梅守德院长对于医院的建设和以后的发展，亦有所贡献。

进入抗日战争初期，日本飞机常来轰炸韶关，当时医院就成为收容伤员的主要场所，而在必要时还派出救护队，奔赴现场抢救被炸的伤员。例如关帝庙（即现市区西河桥头左侧河边）挨炸的那次，据当时担任救护大队长的陈爱心总护长说：伤者血肉模糊的躯体，那被炸飞挂在树杈上的手脚，的确令人惨不忍睹；不少伤员有的被埋在断木瓦砾底下，呻吟呼叫之声，使人不寒而栗。这种惨状，她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广州、香港由于相继沦陷，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北撤，韶关一度成为广东省政府及战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于是，政府机构、驻军部队、商业、企业、医院、学校等纷纷迁来，一时之间，达官贵人、学者教授、富商巨贾、老百姓、逃难者等形形色色的人们云集于此，因此，求医的、住院的病人倍增，医院就“应运”而发展。开始大兴土木，增建病房，延揽技术人才，添置药物仪器设备，床位扩展到百馀张。有专任医师8名，实习医师3名，护士（毕业护士，担任护长

工作)、护佐(护理员)6名,复办后的有护校护生55名,医技人员5名,总务职员6名,工友50余名,全院职工约150余名,成为粤北唯一规模宏大、设备较为完善的医院,深得社会人士之称许及赞誉。在此期间,医院更成为几间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场所,如港大、岭大、上海、贵阳及光华等医学院,都有学生前来实习。医院并与岭南大学医学院合作,提供一切教材及实习资料,派出7位医师担任教职,以尽造就医药人员之任务。这期间,可谓曲江循道医院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由于时局关系,医院大部分建筑物都是抗战时期的产物——竹织批盪,其中最好的一幢青砖结构叁层楼房的护生宿舍,则是早年英光小学的校舍(现是韶关卫校学生宿舍)。楼底下挖有防空洞,放置药品器材和贵重物资;空袭警报时,病人、工作人员可到地下室暂避。有幸的是,因为医院是属于外国人的产业,在钟楼顶上悬挂着英国国旗作标志,日本飞机的炸弹从不投向此处,因此,所有建筑物才完好地保存下来,职工学生和住院病人,才免受生命财产的损失。

1944年夏,曲江告急,政府限令疏散,当时梅守德院长奉派赴盟军服务,离开医院,由随佛山万国医务团来韶关的、循道公会培养的、在山东齐鲁医科大学毕业的伍学宗医师接长院政。六月间,医院人员及物资全部疏散转移至连县,得到惠爱医院及中华基督教会与青年会的支持协助,借给地方开展工作。一方面,派人与惠爱医院筹组一合作式医院;另方面,在连县青年会开办诊疗所,三江设分诊所,并在东陂设贮藏仓库。这样,工作人员有继续服务的机会,生活有了保障,医院工作不致停顿,物资亦得以部分保存。数

月后，日军转犯桂境，曲江乃告偏安。九月间，医院护校全部人、物分批由水陆两路兼程趋返原址，恢复医疗教学工作。经此首度疏散后，医院职工员生略有更动，有离职他往另谋高就者，有随家人疏散退学转学者，也有应聘增添的生力军。这段时间，可说是转变时期。

随着时局的发展，医院领导考虑到曲江迟早必会成为战场，吸取首度疏散的经验，未雨绸缪，与教会及华英中学共同筹划，在远离城市的龙归乡多田村租赁房屋，贮备杂物，以备为万一疏散的避难区。果然不出所料，1945年1月22日，适值护校举行第三届毕业典礼期中，即接获最后紧急疏散令，本院职工暨借读于此之零陵普爱护校员生合共70余人，由伍学宗院长带领，分批逃往多田村，途中惊险丛生，狼狈情形前所未有。韶关沦陷后，1月27日，日军占用医院改作陆军医院。医院留守人员邝天与医师等被迫撤离，退入左邻天主堂（现红星综合厂）暂避，以图日后之计。在此正式逃亡生活中，医院领导不辞艰辛险阻，多方谋求出路，一则忍耐以静待时机，一则筹划开展工作区，总求医院生命之延续，全体职工员生安全渡过难关。

当时，医院计划中的工作区有三：

一、曲乳工作区——该区派李精龙医师主持，主要工作为农村工作之实施，在多田村丘氏家祠设一临时性质之医疗服务站及留医场所，随院校来此的员生，则继续作流动式的上课及实习，对附近各乡之求医者，尽了不少义务。并曾派出人员随军服务，更有因公牺牲者。在此偏僻的乡村，环境特殊，惊险交集，遭受贼匪及日军之双重威胁，人人提心吊胆，天天担惊受怕，但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事业心，以及领导者的机智，终于安然地度过这非常时期。

二、东江工作区——该区派邝天与医师负责，主要工作，为过境难胞医疗服务并准备配合盟军工作。事先曾派出人员多方查勘，洽商一切，随即于5月中旬，一行10余人，分批折道前往，沿线设站服务，并与广东国际救济委员会合作，开设医疗站。如华屋、坝子、连平、忠信等地，并在梅县、平远筹设诊所。此时日本宣告投降，各站人员陆续撤退韶关。

三、连阳工作区——该区派朱志刚医师负责筹划，但因沿途崎岖，以及经济缺乏等种种原因，工作受到阻滞，但亦先后数次派人携带药物到达连县进行筹设诊所，时值抗日战争胜利来临而罢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8月28日，日军刚自医院前门退出，朱志刚医师、张新培先生即由后门进院正式接管。疏散至各地的人员，亦陆续返回韶关，于9月1日恢复门诊及留医工作。为当时韶关市各机关团体中最先复业的单位之一。

医院自被日军占用后，对其国情及习惯不合的设备，或加以破坏，或加以改装，及至其退出之日，已面目全非，到处破碎零乱，疮痍满目。加上在此混乱时期，医院又遭匪类歹徒洗劫，以致被服、药物、器材等损失不少，可幸建筑物无多大破坏，亦属侥幸之事。估计损失总值约合时值国币325万余元之巨。

此时的韶关已不再是“广东省府所在地”，外地搬来的机关、单位、医院、学校等全部撤走，省港人士纷纷南返，一度畸形发展的韶关，又回复原来山城的面貌。医院里有些医务人员自动辞职，就医住院人数锐减，业务萧条，经济上出现不景现象。当时主要靠争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给的

大批药械、食品、布匹、被服等物资来恢复和发展医院工作。并获联总专家医药卫生视导员、粤善救分署专员、加拿大红十字会专员、公谊救护队服务人员暨其他社会人士，多次莅院视察及予以资助。

为方便市区病人就诊，于11月15日开始在市区风度中路115号循道会礼拜堂前座（原青年会旧址，今市一幼儿园）开设诊所，每天由总院派医师轮值前往主诊，并配护士、药剂、挂号收费员各1人，早出午返，开诊半天，日诊30~50人次。

1946年8月28日，医院为复员周年纪念，举行盛大集会。张新培先生、陈道新牧师合编出版了纪念特刊。并由迪慧填词选唱一首《复员纪念歌》以志不忘。

当时医院设12人组成的院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名单如下：伍学宗（主席），张新培（书记），李精龙，陈爱心，刘兆良，陈约翰、周慕君，董礼润，司徒美云，陈润桂，甘非比，陈道新。

还有几个小组委员会：

1. 宗教事业委员会（集会不例定）：

陈道新（主席），张新培（书记），甘非比，李精龙，吴国庆。

顾问：伍学宗。

宗教部职员：

主任：陈道新。圣餐执事：陈爱心。

献金执事及理财：甘非比。

诗班班长：吴国庆。司琴：甘非比、曾仪美。

2. 工友管理辅导委员会（每月集会一次）：伍学宗（主席），张新培（书记），陈爱心，董礼润。

3. 康乐小组委员会（集会不例定）：

张新培（主席），吴国庆（书记），陈爱心，甘非比，陈约翰，陈道新。顾问：伍学宗。

康乐小组委员会各股职员

（一）学术股：伍学宗、陈道新，

（二）音乐股：吴国庆、甘非比，

（三）体育股：巢铿铃、张新培，

（四）游艺股：李精龙、冯式菲。

（五）交谊股：何风纶、陈润桂，

（六）服务股：陈爱心、彭昭彝，

（七）事务股：霍炳棠、陈丽荷。

4. 膳食委员会（集会不例定）：

陈贵芝（主席）、董礼润、陈爱心。

1946年底，医院仅有四位医师：内儿科——伍学宗院长、刘拍枝医师；妇产科——陈贵芝医师；外科（含五官科）——李精龙医师。而在看门诊时，就都是全科医师。当时开放病床约60张，除妇产科病房立外，其余病床无明确分科，哪里有床位，病人就收到哪个病房，谁收的病人，就谁管到底。仅有一台15MA的X光机，只能透视，是经治医师自己操作，没有专科医师。那时才开始应用青霉素肌肉注射，成人5万u/次，儿童2—3万u/次。输液是采用腹部和大腿外侧的皮下途径。外科手术可做阑尾切除术，疝修补术、膀胱切开取石术、包皮环切术等。产科能做剖腹产——“帝王产术”。

解放前，医院收治的病种，除一般疾病外，传染病中的伤寒、麻疹、疟疾（含恶性脑型疟）、性病（梅毒、淋病）是常见病；斑疹伤寒、回归热亦多见；白喉、天花也不少；

流行性脑膜炎和霍乱曾有大流行。医院鉴于时疫流行甚烈，特高请粤善救分署第三工作队拨助，开设贫苦免费治疗之隔离病室，以收容一切霍乱疫症患者。为了抢救危重病人，1946年开始采用静脉输液代替皮下输液，明显提高了霍乱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在流脑大流行时，本无医学知识的挂号员，看见送来眼斜颈硬的病人，他也可以作出初步诊断，马上给挂急诊。

由于医院是教会办的“慈善事业单位”，在战后又受善救分署第三工作队的委托，特辟普通病床5张，免费收治贫苦病人，在门诊亦有赠医施药之举，以符救济的宗旨。据现河西北江大桥西巷22号农民黄开祥大伯回忆说：1946年，他做田工伤了脚，无钱上医院便自敷草药，谁知越弄越糟，小伤口变成了大溃疡，不得不过来医院求医。接诊的李精龙医师了解到他的困难，就给他免费治疗。由在门诊值班的十八姑持续一个多月为他换药，治好了他的脚伤。

医院亦负责一些社会性的防疫工作，如春季免费施种牛痘；免费进行霍乱疫苗、斑疹伤寒疫苗和鼠疫疫苗的注射、恢复赠医麻疯服务工作等。同时负责英光小学员生的保健工作。并应聘为粤汉铁路管理局及韶关中国银行等机关的特约医院。

1947年，伍学宗院长调往佛山（后去英国留学），由佛山循道医院的英籍院长卢约翰接任（卢是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早年来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曾被关进集中营。抗战胜利获释后，返回英国休养一年，1946年再次来中国任佛山循道医院院长，1947年与伍学宗互换岗位了）

解放战争时期，医院床位约有100张，职工员生100人左右。先后在医院工作过的医师（含实习医师）有英籍卢约

翰、叶彼得、欧士敦；华人伍学宗、陈贵芝（女）刘柏枝、梁震亚、方有均、梁君烈、李惠莲（女）、马典初、叶××、许蕴芳（女）、李韶莲（女）、陈成伟等。韶关解放时仍在医院工作的医师是英籍卢约翰、欧士敦；华人李精龙、李韶莲和实习医师陈成伟。由南京中央医院撤退来的眼科主任张文山、耳鼻喉科主任孙宝荣也曾短时间受聘于医院。南京中央护校老师带领三年级学生来此借址上课及给学生考毕业试。

1949年2月，医院总护长、护校校长陈爱心赴英深造，总护长职由毛漱霞（张文山之妻）、司徒美云先后担任，何凤伦则接任校长职务。



（从左至右）

后排：李精龙 李惠霖（牧师） 欧士敦 卢约翰（院长）

前排：李志馨 张玉俊 李爱心（校长） 朱婉馨 刘宝琰

当时医院的小型发电机往往电力不足，常用小油灯照

明，开大会或做手时就点汽灯。食用水是靠院内的三口水井。职工伙食费全由医院支付，个人不必缴交。那时的毕业医师月薪港币120元（折合大洋40元），实习医师发津贴费港币30元，毕业护士月薪港币92元。医务人员的薪水是按年资逐年增的。职工宿舍有专职工人料理，如冲水、铺床、打扫卫生，送洗衣服等，目的是让医务人员能够把全部精力投放到为病人服务的工作中去。

循道医院虽然隶属于教会，但在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渗透到了医院。部分青年医务工作者受到了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自发地警惕着防止发生任何破坏活动，保证了医院的人员、财物在解放时能够完整、安全地保护下来。

1950年冬，循道医院由韶关市人民政府托管改称为韶关市人民政府嘱托医院。1951年又改为韶关市人民医院。1952年6月韶关专员公署下令地区中心卫生院（原曲江卫生院）与韶关市人民医院调换院址后，地区中心卫生院改名地区人民医院，1987年10月地市合并，改名为粤北医院。

附注：1950年，为满足充实各县卫生技术人员建立了广东省第三医士学校，以短期速成学制一年半毕业。1952年，第三医士学校迁入原美光小学，循道护士学校同时并入，即现在的韶关卫校。

抗战时创建的广东省立医院

赵秀生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韶关定为广东省的临时省会。1939—1945年，李汉魂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省会在播迁初期，百废待举，而日寇每天从早至晚，都派飞机十数架次轮番轰炸韶关。群众伤亡不少，破腹断肢者有之，焦头烂额者有之，血肉横飞者有之，妻亡子残者有之。有的在街道搂抱号啕，有的在家呻吟痛楚，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加以恶性疟疾及霍乱病在粤北一带流行蔓延，医药两缺，死、病的人不可胜数。广东省府除多方设法拯救灾民外，并在省务会议决定，拨款设立广东省立医院，紧急救死扶伤，安定群众。还决定委派赵秀生医生为医院院长，着即筹备成立，以适应形势需要。

院址之选择

当时，为避免敌机之轰炸，需选择树林茂密的地方，以掩蔽敌机之侦察，又要让群众到院诊病，水陆交通方便，于是择定韶关市郊之上窑村小山上为院址。此地林森树茂，古木参天，地势平坦，四通八达。院址坐南向北，西为老虎岩，与电讯局为邻，东隔黄岗，有广东省政府及民政厅临时办公署所，南邻广东省卫生处、教育厅、广州大学、广东艺术学院、广东地政局、建设厅等。水路有武江河，陆路有黄

岗及黄田坝公路，均可直达医院。

在战时形势下，院内房屋建筑一切从简，利用本地盛产的竹木，盖起大小建筑物十余座，其中三座，作为内科、外科、留医病房，可收容100多病人。另一座为妇产科病房，可收容30余名产妇。一座外科手术室，可做大小手术，另一座办公室包括药房、会计室、出纳室及挂号处、内外科、口腔科门诊部等。另一座大竹棚，系省府拨出专款十万元兴建的隔离病房，收容霍乱及传染病人，该病房可收容30个病人。实际只收过七、八名霍乱病人，一个死亡，其余全部痊愈出院。当时卫生处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每人注射霍乱疫苗一次，并指定专人办理用漂白粉消毒食用水，如发现病例，强迫入院隔离治疗。因此，霍乱病迅速得到控制和消灭。

医院附近还搭有医生、院长、职工、护士等宿舍。院之周围，挖有坚固之防空洞、避弹沟，以备敌机空袭时躲避。至于食水方面，因战时韶关没有安装自来水管，只好开挖三个水井，供全院病人和工作人员饮用。

医院人事安排

医院分两个组。（1）行政组：院长负全院医务和行政管理事宜。院监赵子林，协助院长管理全院医务及行政事宜。（2）医务组：分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口腔科、妇产科、药房、护士等部门。

当时内科的主任由院长赵秀生兼任。内科医生系李赐端、廖盘基、古书卿、曾享源。外科主任陆学燮，外科医生李嘉诚、轲永钦，儿科主任吴润芬，妇产科主任叶赐荣，产妇科医生敖镜魂，五官科主任吴鲁圣，皮肤科主任邓镇辅，

检验室主任丁作人，检验员陈卓贞、陈桂芬，药房主任赵奕生，司药廖慕清、吴佩霞、朱艳馨、赵惠兰。事务室主任一人，文书一人，庶务员三人，人事室主任一人，会计室主任一人，会计员二人。庶务管理全院工人及分配工作另有口腔科主任左氏，医生麦子光，护士长一人为黎志德，管理和分配护士工作。

另设分诊所两间：一间在韶关风度路，每日下午派医生护士若干人到诊所主持门诊工作（上午因避敌机空袭，集中下午开诊），为患病者作诊疗治病。另一间在抗战大后方的连县，由郭兆驹医生主持，亦作为本院后方贮藏药物和医疗器械处所，由医院派出医生两人，事务员一人、护士一人、工人两名，担任当地病人的诊疗工作。

我院的医务人员如陆学燮、李嘉诚、吴润芬、叶钧荣、吴鲁圣、丁作人等均来自港澳和大陆各地，他们抱着一腔抗日救国热情又有湛深医疗学识和临床诊断经验，虽然敌机每日飞韶轰炸投弹并用重型机枪向地面扫射，但医务人员均非常镇定，照常不懈工作。一遇解除警报，医院的担架救护队与医务人员，一齐奔赴灾区抢救被炸受伤市民，轻者就地消毒包扎，重者抬回医院救治。1941年冬季，日寇有一次狂轰滥炸韶关市郊黄田坝居民住宅区，投掷燃烧弹数十枚，以致所在千数百间竹织批荡板杉木屋，燃起数十个火头，瞬息全部化为灰烬，火焰数日不息。幸赖群众早得警报逃离灾区，故死伤不多，惟是解除警报归来，目睹一片焦土，妇哭儿啼，加以凄风惨雨，真令人悲愤满腔，更增添对敌人恨入骨髓。

日寇在1939和1943年，先后数次集中兵力猛攻北江至大坑口一带，以威胁韶关驻军及群众，虽经奋起抵抗，后因湖南

衡阳失守，战局大受影响，韶关首尾受敌，广东省府逐令所属厅、处、会、局、行、医院等单位紧急疏散。省医院也立即将重病号用专车或民船，先行从水陆两路运往后方连县安置，其余职工乘车到坪石星子。由于当时运输繁忙，交通工具缺少，一部分人步行入连县，虽备尝艰苦，却无一人口出怨言。医院大部分职工疏散到仁化，另一部分职工跟随省府疏散东江龙川，转至平远大柘。迨至1945年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全体医生员工才复员返回广州，后奉令移交曾宪文医生接管，我的责任就此结束。

〔作者简介〕赵秀生，新会人，现年85岁。1931年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一向从事医务工作。广州解放后，在广州市公安医院、广州越秀区第一人民医院，任内科顾问医生，儿科负责人等职务。1977年退休。

战抗后期的一七七医院

陈 劲 何 桃

抗日期间，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的一七七医院，设在乐昌，为时数年。现回忆一下该院1942年后的一些情况。因时隔四十多年，错漏难免，请知情者给予补充、指正。



一七七医院是间专门收容国民党军队伤、病员的第七战区后方军医院。医院通讯，用军邮“适字二十五号信箱”为代号。

一七七医院的院址，设在乐昌县城南边，占用的建筑物，有众桶街的楚南会馆，仁和街的广同会馆，沙堤市（街）（油桶、仁和、沙堤市现统为先锋街）的华光庙，河南街的江西会馆等四处。楚南会馆作医院办公地点，内用木板、竹篾隔成院长、荣军管理、政训、医务、军需、药房、书记等几个办公室；大门后的廊楼上，住着仅有的二名女性工作人员，并设了间电话值班室；大门口有手持武器的士兵站岗。广同、江西两会馆作医疗伤、病员病房，除广同会馆正厅用作“纪念周”活动地外，所有厅房都列着一排排用条凳架木板、上铺白布的病床。为了充分利用地方，每两张病床背靠背地连在一起，门口没有岗哨，进入自由。华光庙未派固定

用场，机动使用，一般只作文娱活动场所，有时也住上伤、病员。

医院的管理体制，由院长、荣军管理员（战区荣军管理处派驻）、政训主任划分职权管理。院长一名，上校军阶，总揽院政、医务事宜；荣军管理员一名，中校军阶，专管伤、病员生活动态，组织纪律；政训主任一名，中校军阶，专管伤、病员政治思想，教育学习。医院以医务人员最多。1942年后的人员情况是：院长下设医务主任（中校），下属有处方权的军医助十多二十人，看护四、五十人，护理员六、七十人（约五、六十名伤、病员划为一病区，每病区有看护二至三人，护理员四人）。此外，尚有少校药房主任、上尉副官、上尉书记、上尉军需、少尉特务长各一名，司书、文书、军士、勤务兵各若干名，守卫办公室用一个武装班。荣军管理员和政训主任下各设一名干事。人员中除二名助产士实际为看护的女性外，全部为男性工作人员。

医院还有个小型粤剧团，演员和乐手全为男性，共约二、三十人。一个扮花旦和一个扮小生的主角挂中尉军衔。时而在华光庙大门后的那层楼式木构戏台上，演出救亡宣传或传统性粤剧，为伤、病员服务，也对外给百姓卖票。戏班人员，临时凑合，并非长驻，愿意在医院时发给工资，要离去也自由随便。

二

一七七医院的伤、病员来源，是由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分配的。收容数一般为六、七百人。伤、病员运送，大部分由陆路的火车，少数由水路的船舶。有伤、病员送院，总监

部先用电话通知，医院派人到车站码头去接。由于医院没有车子，伤、病员到下车下船后，能走路的自行走路到医院，不能走路的预先准备好担架去抬。送来就医的伤员多于病员，绝大部分是营级以下官兵。那时虽是国难当头，但团以上的军官伤、病，大都有条件住入设备较好的药物较齐的医院。营级军官来就医的也很少，偶尔来一名，便安置去住“长官房”单人病室。伤、病员中以广东（尤其下四府）籍最多，其次为广西籍，还有部分云南、四川等外省籍的。伤、病员入院后，每人发给胸前印有红十字符号的白色病服两套，冬天加件蓝色棉衣，还有蚊帐、被盖、碗、筷等用品。

一七七医院所用药物，亦由总监部拨给。设备和药物质量都很差，只有平常很少用的显微镜及种类不多的一般外科手术器械，日常用的镊子也没有，将筷子破开两边，缠上胶布以代用。一些较复杂的化验无法进行。军医用药，凭临床经验和对伤病情的印象。药品缺乏，全部只有消炎、退热止痛、帮助消化、止疟止痢及外科药品、敷料等二百种左右。抗战期间药物来源困难，有些药品还被人做过“手脚”，或将值钱的换回低下廉价的。如稀有的黄胺、呋苏、呋咭等，被列为药房的名贵的一类药。其时，疟疾很多，常见的见连丸是溶结成团的，无法分成颗粒，便按原瓶数量和所含分量冲入一定倍数开水溶解，用量杯分配药液给病号服用。有时得到些慰劳品如美国援助的阿涤平，就如获致宝。

伤、病员每日用药，液剂没瓶子装，用个土碗盛着放在床头，护理员口头交代碗内药水分多少次服完便算，片（丸）剂也没个药袋，名为后方医院，条件却非常简单和粗陋。

医院的医务人员，面对恶劣环境，还是勇于克服困难，尽力去做工作，以“同仇敌忾”精神作好伤、病员的护理，并在可能内寻找医疗上的代用品。各地的宣传队，时派人到伤、病房内作救亡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出壁报，编话剧，鼓励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为民族争光。每月都有人数不等的伤、病员治愈出院回到军队去。

1944年夏季，国际红十字会派来一个有五、六名成员的匈牙利医疗队，住在华光庙，帮助医治骨科和截肢手术，医术不错，态度也好，并带来部分药品，工作了四个月左右，解决了一些医疗难度较大的问题，给伤、病员和医院留下了好印象。

三

战时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一七七医院的工作人员生活很艰苦。官兵上下，饷粮（工资）不高，上尉军医助每月七十多元（国币，下同），少校九十多元，中校一百一十多元，上校一百三十多元。在一段时间里，虽有时断时续的廉价米，每人每月配给几十斤，但从院长到护理员，就凭那点微薄襟粮，去解决全家当时一元一斤米的飞涨生活费，真是捉衽见肘。加之又经常遇到压饷（不能如期发饷），以至有些经济负担较重的人，便常诉断炊之苦。

由于生活难以为计，至使医务主任也只得去乐昌中学兼课，有的军医助还去替百姓看病，与人搭档做生意，个别还秘密聚赌渔利……。这些现象，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期墙报出现讽刺漫画，画了一个军医，手挟皮包，奔驰在道，满头大汗，傍文提问：“此公来去匆匆，为公乎？为私乎！”

但也有少数秉性刚直，一心致力于抗战救亡的，如医务主任刘觉先，一家五口（一妻二子一女），境况艰难。其妻为了帮助家计，也去做小贩，卖松糕，但他本人坚持工作，始终不去找“外快”。

医院的工作人员生活尚且艰苦，伤、病员的生活则更苦了。伤、病员的膳食，规定每餐二毫（角），统一由医院的伤、病员饭堂办理，质量很差，只能做到不饿肚皮。一日两餐，上午十一点，下午五点。开饭时，分菜不分饭，每人一份青菜加上几片薄肉，糙米饭用箩盛着自己去装。有些伤、病员胃口不好，无法下咽，时闻砸碗摔筷和骂娘的声音。但始终无法解决。

伤、病员住院，待遇有别：伤员照原军阶待遇按月发饷钱，另津贴伙食（住院吃饭不交钱）；病员则取消原饷薪，只给膳食和每月给二、三元生活费。那时的二、三元，实在买不到多少东西，有抽烟嗜好的常因“无米（烟）可炊”。伤、病员受不起物质引诱，而身体又能活动，便不理医院的规定，私行外出，或合本做点小买卖，或到处游逛，窥测可变钱的门路，去倒塌的废墟里，挖点残铜烂铁去卖，甚至聚众赌博，偷盗。

四

一七七医院处在后方，在一定的时间里，院情稳定。每年，战区兵站总监部都派人来视察，发现问题，便要追查，还将全部院员集合在楚南会馆侧边的操场上，逐个点名，防食空额。对于伤、病员，年中另有一套人马前来查管，可伤、病员却往往不吃那一套，致闹剧时有发生。

伤、病员中，广东籍的自恃人多，对外省籍的开口就侮辱，加上一些伤兵头（老伤号）在内搞鬼操纵，聚众闹事几成习惯。他们以一副“亡命之徒”的嘴脸，自命“有功”，天不怕，地不怕，发展到每天晚饭后，便成群结队到太平街或武江河侧沙滩上赌番摊、推牌九。

那时乐昌县长梁汉耀，明令禁赌。得知一七七医院的伤、病员，每晚点起煤油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聚赌，无视禁令，致意医院禁止无效，便与驻乐昌宪兵队磋商，当县政府派出巡查队时，宪兵也派人协助捉赌。有个晚上，有宪兵参加的巡查队到武江沙滩上包围了赌场，于是展开了一方要抓人，一方作反抗的“肉搏战”，双方都抓人。事发后，医院便派人去县政府要求放回被抓伤兵，县政府则以理在手，且有宪兵支持，不肯放人。这激起了伤、病员的愤怒。次日上午，从广同会馆涌出近两百名伤兵，大部分手持铁枝、木棒等器械，连跛脚的也支着拐棍“参战”，冲向县府，扬言要揪县长，吼叫立即放人。梁汉耀只得慌忙打电话去韶关向省政府报告，省政府答复“要息事宁人”。县长无可奈何派人与伤兵谈判。伤兵一举得逞，要县政府立即放人；要为被捉两伤兵赔偿名誉，沿路烧炮仗送返医院。县长害怕那些连省政府都不想得罪的伤兵，只好无条件答应。

伤、病兵闹完县政府后，对宪兵仍不放过，说宪兵队与县政府勾结，定有不可告人的名堂，要宪兵队来讲“数口”（条件）才放那两个被抓进医院的宪兵。但宪兵队自恃是“兵王”，不理伤兵那套，并放出说话，如伤兵要斗，就不客气搞到第七战区司令部去。伤兵自知赌博理短，搞到战区处理时自己站不住脚，要吃亏，到第三天，终于放了那两名宪兵。

五

1945年1月，日寇为了打通粤汉铁路，从南、北两路向韶关进犯，乐昌首当其冲，消息传来，人心惶惶。医院为了稳定情绪，只内部授意：如日寇打来，医院要“转移”到有利地方去，不论职员、军医、伤、病员，能随医院转移的就轻装随行，不愿随医院转移的任由自择。个人如何应变，立时成了个头等大事。不少人以为随院转移，既无交通工具，又人多口众，行动缓慢，日寇追来，不是逃避不开被打死，就会因人多弄不到吃的而饿死，倒不如自谋出路，还可赌点运气，因此不愿跟随医院走的近百人。此时最惨的还是那些伤、病员，他们顾虑背上被铺行李，体力不支而掉队，幸而这时的伤、病员不少已近康复，大部分没有跟随医院走。

到1月21日，形势恶化，坪石陷落敌手。乐昌驻军毁老虎头铁路桥撤退了。

22日，风声更紧，早晨，医院撤出乐昌。原定先到韶关跟随兵站总监部行动，但因日寇已到马坝，总监部早已撤走，便改道直奔仁化。随院的有职员、军医约八十多人，伤、病员近百人。医院物品，除药房人员带上少量较名贵药品，炊事员挑上铁锅外，其余物件，全部都丢弃，狼狽万分，下午至仁化县的董塘。董塘驻有一团团的军队，但近傍晚，董塘驻军也要撤退，医院只得一边集合隐蔽在山上的全体院员，一边派了两人下山去董塘关照那些伤、病员。但两人未及下山，就听到“叭叭、叭叭”的日式枪声，据说董塘附近已发现日寇，日寇也发现了他们。派下山的陈劲，腰间

皮带被打穿了个洞，没法进董塘招呼那些伤、病员了。院长随即下令向江西方向撤退，这时已无一个随院的伤、病员了。

在去江西的途中，遇上了兵站总监部，总监部叫医院到龙南暂驻听候消息。一路行去，饱一顿饿一顿，总算挨到了龙南，住在一间庙堂里。后来找到了驻在龙南的总监部，发了工资，大家才安下心来。

在龙南住了几个多月，终于传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莫不举额相庆，眼泪夺眶而出，欢喜到跳起来。

接着一七七医院先回韶关，后去老隆继续办军医院，到1946年初，取消一七七医院，大部分职员回韶关编入第九军官总队收容，后办理退役手续，发给“胜利奖金”后，遣去。

（乐昌政协供稿）

抗战时期的一八二医院

刘远廷 谢彦枚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省政府、第十二集团军总部都相继撤到韶关市和翁源县，粤北就成为广东抗日的后方。这时，国民党陆军总部，在始兴县江口设立了一个医院，番号为“陆军182抗日后方医院”，收容来自广东、湖南等地抗日部队的伤病员。

这个医院以进步人士古鸿烈为院长（建国后古曾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以一姓黄的留德学生为副院长。全院医务人员和行政人员有200多人，另外还有数十名家属。下设院党部、政治部、政训室、俱乐部、手术室等。还招有江口附近的民工临时充任担架兵、看护兵、葬尸兵、缝衣兵、炊事兵等数十人。

医院没有建房子，只搭了一些简易棚厂，大量占用街道民房和附近农民的住房，如江口的石上庙（即现在的江口粮所、林业站）、关帝庙、盐埠、江口围（即现在江口卫生院）、竹园顶、上中下街等，但都能给回适量租金。

医院从1938年至1945年，一共办了八年。设院期间，几乎天天都有伤病员送来，少则五、七个，最多的是1941年至1942年间，那时因正值长沙大会战，几乎每天都有数百号伤病员送来。当然，也天天有治愈的战士返前线。被送上前线的，有军官护送，医院要开欢送会。会上，古院长、政治部主任等都要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以鼓励将士们卫国杀

敌。对于抢救无效而死亡的将士，医院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当时还在猪公岭建造了一座六角亭，亭内有一石制碑牌，铭记着为抗日捐躯的将士名字和事迹（此亭与碑大跃进时已毁）。

那时由于战事频仍，送来的伤员又是用船只运来的，途中辗转时日长，许多尚未送到医院就已死亡。所以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初时还用棺材，一尸一棺，两尸一棺，其后就钉木板，最后连买板也有困难，就只有挖大坑，葬大坟了。据群众估计，单是细坝、猪公岭两地，就埋葬着约两千多具抗日将士的尸骨。

1943年，韶关沦陷前夕，为确保医院的安全，在南雄的宾阳门外建了一个分院。到1944年，又在江西的寻邬县再建了一个分院（那时第七战区司令部也搬到寻邬了）。但设在江口的抗日后方医院却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后才结束，只是在日本进攻始兴时临时疏散了一段时间。

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医院的群众关系搞得不错。建院八年长，纪律是严明的，没有发生过伤兵骚扰百姓的事，群众也愿意从物质上帮助医院解决各种困难。不仅如此，医院还常常免费为群众治病，群众得益良多。人们至今还传颂着一件这样的事：石下村有一寡妇，不明不白肚子就大起来，村中流言蜚语满天飞，说她“伤风败俗”呀，“寡妇怀春”呀，背后还指手点脚，弄得她日夜不安，痛苦不堪，跑去找古院长，要求诊治。谁知一去就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她肚子里割下一个24斤重的肿瘤，而且药费手术费都免交。人们除了惊叹医生的高明技术和颂扬良好的医风医德之外，对这个寡妇的“贞洁风波”问题，也很快就平息了下来。

抗战初期，当地老百姓对西医治病还很生疏。八约乡里

坑村有一个陈氏妇女，犯严重的胃溃疡，四处求医均不愈。最后到伤兵医院请古院长救命。古判断病情后，立刻开刀切除，但在手术中要及时输血，而当时又一时找不到相同的血型。最后由她的儿子饶振明供血，才转危为安。在始兴山区开刀剖腹的事，视为奇迹，到处传诵。他儿子也在各处宣传古院长救母亲性命恩德，一时传为佳话。

韶关名中医李仁溥

张念希

韶关名老中医李仁溥先生，字有德，别号锦文，祖籍广东番禺县人。其父在清朝末年到韶关业医。仁溥先生于1907年9月21日，出生于韶关，年仅5岁即丧父，由其兄长抚养长大，9岁时始进学堂念私塾。14岁时从学于广东会馆儒医卫拔俦先生，习医4年。18岁时随兄长临床实习。21岁时（即1928年）业已学成，即在韶关市风度北路“天佑堂”药店，开始悬壶应诊执业。

勤奋好学、刻苦钻研

李仁溥先生，从事中医53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62年，1978年两次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医”光荣称号。

李老学习中医，根本就没有进过什么学校。而是在老师的指点下，靠艰辛的自学、钻研、奋斗而成为一代名医的。

早年，他在私塾念书期间，就表现出聪明好学，意志弥坚，秉性刚直，深得卫拔俦老师的见爱。卫老师是广东会馆儒医，他精通中医学术，除教李仁溥学习文化知识外，还授以中医学理论和技术。因此，从开始，就使他对中医药学术有正确认识，加上治学严谨，刻苦钻研，为后来从医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李先生，自从走上医学道路后，就胸怀大志，誓当良

医。数十年来，他不倦地耽嗜典籍，勤奋实践。

到青年时代，就已熟读《黄帝内经》、《内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著作，还精读了《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及金元时代四大家著作，《景岳全书》、《本草綱目》、《医宗金鉴》、《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等等。但他遵经不泥古，从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非常注重社会临床经验，虚心汲取群众智慧，不耻下问，向同行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临床中，他又善于辨证施治，处方立法严谨，临证用药不拘泥于时方、经方，处方药味少、剂量小，恰到好处。从不拘于寒、热、温、清派别，熟练地灵活地运用《伤寒论》、《温病学》，对其他杂病诸方，也运用自如。因而执医不久，便医名日噪，饮誉韶城及粤北地区。抗日战争期间，韶关成为临时省会，当时省在韶关出版的中医刊物《广东医药旬刊》，仁溥先生是编辑委员之一。

李仁溥先生，从医53年，在专业技术上擅长于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专病方面较为突出的有：咳嗽、哮喘、胃痛、泄泻、麻疹、崩漏、不孕症等。

李仁溥先生，由于毕生勤于自学，锲而不舍，又在繁忙的医政工作中，勤于总结临床经验，和进行学术探讨，使医学进一步得到发展。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六篇论著：《哮喘的治疗经验》、《麻疹的辨证治疗》、《保产无忧汤治疗胎位不正》、《百日咳的辨证治疗》、《慢性肝炎的辨证治疗》、《逍遥散应用经验》。未发表的三篇：《崩漏的辨证治疗》、《漫谈活血化瘀法的应用》、《谈胃痛的治疗经验》，都有一定的价值。另自拟方剂亦多，如治疗肝热头晕、头痛（早期高血压者）的《金桑汤》，治疗小儿腹泻（中毒性消化不良）《柯子止泻汤》等等。他主编过《韶关

市中医秘方验方集锦三辑》、《韶关市中医院经验交流集》，可见一斑。自1935年起，他即被选为历届韶关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解放后，于1950年被选为曲江县医联会副主任。1952年起担任历届韶关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并被选为省卫协委员。

李先生不但医术精湛，还具有高尚的医德。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六、七月间，韶关市区霍乱流行。省政府虽强迫施行预防注射疫苗一万多人，但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在这传染病流行之际，李先生不顾一切，夜以继日地投入治疗霍乱。他运用古方治疗霍乱病时，分为二大类型：即热霍、寒霍。热霍用蚕矢汤、连朴饮、寒霍用五苓散、理中汤，疗效卓著，求医者益众。对那些确实贫困群众，他不但免费诊病，而且还经常为病人赠钱购药治病，恤民救灾。他常对其学生弟子说：“做医生如果没有仁爱为怀，济世救人的品德，是不能从医的，即是从医也是无学、无术、无德，唯利是图，草菅人命，根本不可能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解放前，韶关由于卫生环境差，疟疾流行。他针对这种情况，苦心研究，首创自制治疗疟疾的蜀漆常山苗研末为丸内服，疗效颇佳。他治疗哮喘病，善于用小青龙汤加减以定喘，并创制砒麻丸及鱼蚕粉以截哮，以紫河固本治疗。并尝以桂枝人参汤加减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动过缓等症，都有一番独到之处。他不但善于应用方药，尤着重辨证，对其门生常说：“识药不识证，十医九不应；识证不识药，十医九不着”。

李仁溥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勇于进取和接受党组织对他的考验，早在1954年和1959年先后两次

积极参加党的知识学习班，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1959年就决心加入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贡献一生力量并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还多次申请，并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并反复表示批准与否仍努力工作，从不气馁。他说：“我只向往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如够条件就加入共产党，不够条件就做民主人士。”他处处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光明磊落，廉洁奉公。

带头组织联诊所

1953年，李任韶关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期间，出席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有所提高，明确了方向。会后，他放弃个人利益，于1953年4月，带头在韶关市组织起健群联合诊所，并任所长。健群联合诊所的建立，是当时粤北地区最早的联合诊所，它不但带动了整个粤北，还被推广到广州市。1958年，他又放弃个人优厚的经济收入，在韶关市带头组织起大联合诊所，任所主任。在所内首次采取了固定工资。1959年，李老为培养中医人材建设育才基地、在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前提下，依靠集体力量、自筹资金、因陋就简，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办起了韶关市中医学校，他兼任校长，自编教材，亲自授课。该校先后举办了中医针灸班、中医正骨班、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培训班，共培养出了二百多名中医人材，直至1967年撤销为止。

1962年，国民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李老带领广大医务人员，顶住社会上各种歪风，向贪污、盗窃、搞地下诊所牟取暴利、走江湖行医欺骗群众、非法打胎医疗道德败坏等违法乱纪的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爱护集体利益。为发展韶关

市的中医事业，李老在1960年起，就到处奔波筹备设立韶关市中医院，于1964年9月，在原韶关市中医联合诊所的基础上，改为韶关市中医院。设病床40张，下设3个门诊，他任院长。对创办中医医疗机构和发展韶关市中医事业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努力培育人才

1965年初，党号召“努力发掘，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李仁溥带了一批中医学徒，打破旧的带徒形式，采取了以集体上课，分别传授带教的形式，进行培养中医人材。但他并不满足，认为这种方法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数量少，时间长，必须有培养人才的基地，才能尽快解决中医后继人材问题。通过充分酝酿，于1959年4月11日，依靠集体力量，自筹资金，创办起了韶关市中医学校。李任校长，开设了内科、针灸科、正骨科三个班共240多名学员，后来又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1964年后又招了三期学员，直到“文革”动乱中才被迫停止。

李老除在校亲自授课外，在临床带教中，都诚心尽智地对青年、中年医生、学徒，进行传帮带，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临床学术经验，传授给他们。还经常为实习学员，进修医生上辅导课，尽快提高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水平。直到他晚年在家养病期间，仍坚持诲人不倦地为青年医师作理论和临床难题指导。自五十年代起，经他培养的学徒、进修医师及学生（指学校学生），数量不少，大都已成为韶关地区各级中医技术骨干和领导。

李老，毕生为中医事业奋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和人

民不会忘记他。从1952年起，被选为韶关市历届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1960年起又被选为广东省历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直至“文革”为止。1959年又被评为出席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出席全国文教卫生群英大会，1960年被评为广东省文教卫生先代会代表，1962年又被评为出席韶关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同年又被省卫生厅评为广东省名老中医。1978年被授于“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

李仁溥先生于1980年因肺部感染合并心衰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3岁。

（本文作者系韶关市粤北第二人民医院中医主治医师）

毕生从事医疗事业的李精龙

甘非比

李精龙医生，1917年出生于印尼，原籍广东惠阳淡水。其父李炳魁是侨商，在当地颇有威望，曾多次向海外侨胞募捐集资，支援孙中山先生革命；私人也捐款给广州岭南大学筹建校舍，并带领许多贫穷乡亲到印尼谋生。他自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父亲临终前还吩咐他一定要回唐山（中国）念书。

他于1932年初回到祖国，先在香港、上海岭南大学分校附中读书。大哥李任龙是该校校长。不久，抗日战争波及上海，他只得疏散到广东佛山华英中学继续就读初高中。1937年考入岭南大学医学院，1943年毕业。应征服兵役一年，被分配到广东第八医防大队当军医，期满后，领取毕业证书。

他毕业后原想去国外就业，但目睹祖国贫穷落后，人民缺医少药，他就决心留在荒凉的粤北山区，为劳苦大众解除疾病痛苦；并应曲江循道医院邀请，任外科医生。

1948—1951年，他任曲江循道医院院长，原准备去英国深造，可惜遭遇到某些原因，致失良机。1956—1959年，在韶关专区医院，1959—1966年，任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免去职务。1978—1984年，复任副院长职。又是韶关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委。1984年，退居二线，为市卫生局技术顾问。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旧中国留下的贫困，广大农村人群中，患沙眼的特别严重，是当时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将眼睑内翻矫正，是防止致盲的重要手段，可说是一种小手术的常见病、多发病，但李院长总是认真对待，说这些病人因受倒睫刺激，两眼羞明流泪，十分辛苦，所以一旦病人到诊，要立即拔除倒睫，待炎症减轻再行手术。这样，既解除病人被倒睫刺激不能张眼之苦，也为日后手术，树立了成功的信心。事实确是如此，以后医院为不少病人，解除了痛苦。

李医生自小勤奋学习，对待医疗事业，比较认真钻研，因此医术高明，医德良好，在韶关市慕名求医者众。为满足群众要求，他每周门诊一次。当他门诊那天，指名要李院长诊病的各科病人，常达一百多名。面对如此众多病人，他始终和颜悦色地倾听病人主诉，认真检查，从不马虎了事，尽管到了下班时间，延误进餐时间，他坚持把最后一个病人送走。

他自从参加工作后，一向以院为家，本科及各科室抢救都要参加，工作时间不分昼夜，随叫随到。此外，还要负责院外会诊及手术，每次手术完毕，一定待病人病情稳定后才回院。

1960年夏，曲仁马口煤矿发生一宗很严重的瓦斯爆炸（简称马口事件），事件发生后，领导动员省市许多医务工作者参加抢救，当时省医院院长查树兰和李精龙也一起前去，在抢救中七天七夜未闭上眼睛，回到韶关时，双眼都熬红了，但次日又继续上班。

“输血”在今天看来已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但在五十

年代的医院，既无血库，也没有输血员，更因卫生知识贫乏，人们把血看得十分宝贵，所谓“男人滴血值千金”。那时如若病人需要输血才能挽救生命的话，只有患者家属才肯输血，假如血型不合，患者便有失去生存的可能。李精龙医生几次遇此情况，常常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有一次，一个危急病人，急需动手术，但手术成功了，患者却失血过多，他脱下手术衣，马上在自己身上抽了五百毫升血，可惜病人病情太严重，输血也来不及了！他叹气之余，只好把血倒去喂狗。以后，他为了解决急症病人用血，自己带头，把医院自愿献血的工作人员，组成了输血团，把他们的名字、血型、张贴在外科办公室，以备急时之需。

为了减轻病人负担，当时医院是不留陪人的，但要使病人住得安心，家属放心，李精龙经常教育和督促各级医护人员，认真做好医疗护理工作，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主动解决病人的具体困难，尤其对小孩。他根据儿童心理，早上查房时，带些糖果给孩子们，所以每当他进入病房，孩子们迅速回到自己床上等他检查，使医患关系十分融洽，加速了病者病情好转，提早出院。

打倒“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摘掉了他精神枷锁，1969年，他在政治上尚未平反。医院安排他担任医生工作，他毫不计较愉快接受，自己带着病，仍坚持走家庭病床，同工护士不会骑自行车，他陪同一起，每天步行在市区、东西两河，穿街过巷，送医送药，每个病人每天巡视一次，重者二次。那时家庭病床比较多，每天常常过[时]下班，但他从无说过一句怨言。有一次去到一户孤寡老人家，因无人照料，整个上午未进饮食，他和护士分头煲开水，买早点侍候他，老人很感动，连声道谢。病人及家属[写]了许

多表扬信回医院，当年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并不骄傲自满，对工作一直认真、负责，认为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五十年代，专区医院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只有外科医生3—4人，而能独立手术者，可以说仅有1—2人。为了不影 响外科病床工作的开展，李精龙可以说从没有休息日，即使偶然去看场电影，也要把自己去向告诉住院医生，以便有急事随时叫他回去。当时诊断手术简单，整间医院仅有一部X光机，化验室只能做三大常规。遇有比较疑难患者，诊断不容易，但为了不致延误病情，而又能获得准确的临床资料，李总是带医护人员守护在病床旁边，密切观察病者病情改变，掌握手术时机。那时手术，既没麻醉机，又没有吸引器，光源只能靠天然阳光或手电。在此简陋的情况下，手术范围，包括常见简朴手术，如胃穿孔、肠切除、鼻喉、气管切开、扁桃腺摘除、剖腹产等等手术，仍尽力进行。此外，还负担各科危重病人的抢救和会诊。

尽管工作很忙，当时他仍抽空翻译美国外科急症一书，供大家参考，但由于当时处境，无法出版发行。

粤北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于1953年3月在韶关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该院，并一直在李精龙身边工作，长达八年之久。当她回忆起过去的事，深有感触地说：“李院长是我的良师益友，是学习的楷模，他对待我的学习和工作，始终是认真指导，严格要求。他教导我如何使用听诊器，外科的一刀、一剪、一针、一线，他都耐心启导，为了使我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毕业的头一年，他隔天带我值廿四小时

班，当我能逐渐独立手术时，他经常站在旁边观察。五十年代国内医士书籍很少，他常常利用休息时间翻译外国资料，给我讲解，以提高我的理论水平。每当我有些微进步，便及时给予鼓励，发现错误立即给予指正。尽管他当时处境不好，但他始终相信党的政策。他常对人说：“对待病人，我们个人辛苦一些是应该的，但功劳应当归于党。”

市一医院外科池中轩副主任医师，六十年代初刚毕业，来到粤北山区，人地生疏，又无亲朋，思虑重重。到市一医院报到后，得到当时担任院长的李精龙等的热情接待，把他安顿好，并向他作了医院简单的情况介绍，李的和霭可亲容貌，给刚来医院的池医生，留下了良好印象。随后池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病回院治疗，李精龙经常去病房探视，关心他的病情，使他深受感动。回院后，他分配到外科，李又亲自带他到全院熟悉情况，如床位、医师配备、技术开展等及医院发展蓝图，从而增加了他对外科专业的热爱，并立志在外科专业上，为人民的健康贡献毕生精力。

在开始临床实践后，池中轩医生碰到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李并没有训斥他，而是启发及诱导，把每一个疾病的治疗原则，用他丰富的经验详尽地加以说明。又在他进行手术操作过程中首先肯定他操作好的方面，同时纠正不足之处。这使新到任的医生，心里感到扎实，手术操作也顺利得多。

有一次，一位骨盆骨折患者，因进食不慎而下泻，日达二十余次，值班医生未听清楚高年资医生的嘱咐，应用Y片酞止泻因掌握剂量不准而造成中毒，被李及时发现，经3—4小时的积极处理，中毒症状得以缓解。事后，李严肃地分析这次中毒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没有过多指责，而是及时地指出一些剧毒药品的应用应该慎重，及中毒时的应急处理，

使值班医生得到很深的教育，也增长了知识。

那时，李精龙已五十多岁了，只是以一般医生的职务留在外科。外科的重担交由一位年青医生负责。但李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工作，与留院工作青年医生同台手术操作。他仍和过去一样，精力充沛，并善于做病人思想工作，使之愉快地接受治疗，在手术过程中，操作轻柔细致，手术良好，该切除的组织切去了，组织的损伤减低到最低限度，每周有4—5次在手术台连站3—4小时，而且都是延迟下班。但他从未有迟到早退，一直以高质量的工作态度，来培养教育年轻一代医生的成长。

李精龙副院长于1987年12月25日因心肌梗塞，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0岁。他虽然离开我们，但在韶关医院的建设与发展上，在培养外科医生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对工作那样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诊治病人那样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技术上不断学习、精益求精，对年轻的医生关心他的成长；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值得我们悼念和认真学习的。

记陈大勋中医师

李子德 张 艺

深受人们敬重的陈大勋医师含冤逝世已36周年。笔者为表达对这位革命老朋友的思念，特撰写此文。

(一)

陈大勋，是广东始兴县知名的中医师，始兴八约外营村人（现为沈所乡“八·一”村），1888年出生于雇农家庭。

陈医师年幼时摔伤腿，因家贫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脚残腿拐，步履艰难。

他从小便赋有天资，自学勤奋。父母看到儿子读书心切，忍痛变卖了母亲陪嫁带来的微薄衣物，支持儿子在村中私塾就读，后又由亲朋资助到县城崇阳学堂就读。

由于脚残难于务农，辍学后便立志学医。开始拜村中参加过太平军起义的茂老大爷为师，学习跌打医术。几年过去了，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便开始成为行医者，为乡中方圆几十里的民众诊治病痛。

推翻袁世凯称帝后的民国元年，为了纪念光复民国，陈医师在各界人士支持下，到始兴县城开设了“光复堂”中药店。他一面行医，一面总结经验，进一步钻研医学理论。他参加上海、广州等地几所中医函授学习，获得了好成绩。一

次，他的论文在上海《中华医学》见刊后，深受广州著名医师陈伯坛赞赏，并于1933秋函约会晤。从此，彼此建立师徒关系，书信来往频繁，陈大勋医师深得教益。

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陈医师由始兴革命先辈、他的挚友张光第的推荐出任始兴商会长期间，他积极发动各界人士捐款献粮支援路过始兴的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他辞去商会长，专心于县医药公会主席工作。任职公会主席的20年中，经常召集中医生经验交流会，为县中中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给医药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医师医术精通，对医治恶性流行病，如对霍乱（当时叫“人瘟”）、黄胆和伤寒等症，更有独到之处。对被不能治的狂犬咬伤并发症以及妇、儿科和眼科等亦有独特见解。

他不但医术精通，医德也广为人们钦佩，传颂至今。由于他是熬苦过来的人，很体谅贫苦人家的难处，对特别贫苦人上门求医，大都免费看病给药。有时远途的贫苦人来请他出诊，因陈医师脚残不能远行，不时自费坐轿前往。他在农村的老家也放着许多成药，懂得一些医务知识的老伴李洋鸾，也常为村民治病。

（二）

陈医师出生于贫苦之家，经历过清王朝和民国的黑暗年代，历尽坎坷。他早年因受到过始兴革命先辈张光第（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开导和影响，思想进步。对腐败没落的反动阶级和社会现实，感到痛恨。看到祖国大片河山沦为帝国主义之手，深感费解和忧虑。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医师很关心时局，订阅了《新华日报》。他说这份报纸的消息最可靠，社论写得好。他看过朱老总的《两个战场》后说：“救中国的在北方”（意指延安）。

1938年春，陈医师支持大儿子陈培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支持二儿子陈培松在南雄中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参加了共产党）。一次，陈培松在进行宣传活动时，被“三青团”分子打得头破血流，陈医师非常气愤，公开斥骂那些人是民族败类。

陈医师对革命同志非常关心，衷心支持。如在外营村日新小学任教的李柏松（李辟，中共广东省委交通员），因工资收入微薄，患了肺病也无能医治。陈医师知悉后，不但赠医送药，还在生活上给予资助。正如曾在始兴坚持地下革命活动的何葆蕴同志回忆说：“陈大勋老人简直是我们共产党的保健医生，同志们有病都去找他。”他也很关心革命同志的安全。如“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始兴也刮起了反革命妖风，千家营农会主席陈竹君遭反动派杀害，张光第被通缉。陈医师面对危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将张光第掩藏在药店内，并在一天深夜雇了小艇由后门送往外地，使张光第免遭于难。

光复堂药店，是陈医师早年开始为民治病的地方，又是革命活动的场所。农民运动时期是农会会员频繁出入活动之地。1940年以后，是中共始兴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据点和交通联络站。当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从南雄迁到始兴时，电台的手摇发电机就隐藏在陈医师的床底下。从外地到始兴的中共地党同志，如吴伯仲、张励、许平、李柏松、梁淑媛等许多同志，到达始兴时均先到药店接上头。外地来的一些同志，

为了避开国民党检查不住客栈，住在药店后楼。许多同志都以找陈医师看病为名进出药店，开展活动。1940年曾在始兴担任中共县委书记、后任中共五岭地委书记的张华同志（同志们称他“所长”）回忆说：“当时县委许多重要会议是在光复堂药店后楼召开的”。

1944年秋，中共始兴县委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风度小学建立了一支以护校公开名义的武装护校独立分队。此时，陈医师将转移到清化地区存放的、价值二千多元的中药慷慨地捐献给独立分队。

1945年春始兴沦陷后，独立分队（后改为风度抗日游击大队）挺进前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陈医师又先后几次将价值一千多元的药品捐献给风度抗日游击队。由于武装部队不断扩大，人员剧增，粮食供应困难，陈医师又将家存的四千多斤稻谷捐助游击队。

日、伪军不时窜到农村进行抢劫。为了安全，陈医师一家搬到游击队的根据地黄坑村。在根据地，陈医师象游击队的军医一样，积极为游击队诊治伤病员。他的老伴李泮鸾，积极上山采摘山草药，为伤病员煲茶煎药，游击队同志都亲切称她老大娘。二儿子陈培松负责南、北山游击队交通联络工作。二儿媳朱倩如、其兄朱光贞（后牺牲了）以及养女陈顺采等人的老家北山总铺和水口村设立交通站，负责交通联络工作。老伴李泮鸾还担负黄坑至外营的联络任务。

1945年5月，风度抗日游击队和民众一起开大会公审在乡中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又暗中私通日寇的国民党八约乡乡长邱槐生时，陈医师主张“耕者有其田”，委托儿子、风度抗日游击大队政治处主任陈培兴，将他家的田契在大会上当众烧毁，还将原自耕的十多亩田交给民众耕种，深受民众拥

护。他家宁可在黄坑山耕种杂粮度日。

由于陈培兴是游击队的负责人，陈培松又参加了游击队，家人又支持游击队，故日、伪划定陈医师家为“匪属”，光复堂药店被查封，转移到沈所冯屋等地的大批药材被日、伪军烧毁。

1947年7月间，风度抗日游击队光复了始兴县城。不久，原躲逃到江西大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向始兴猛扑过来，疯狂追剿游击队，残酷镇压民众，到处呈现出地震般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派又继日、伪宣布陈医师家为“匪属”，要抓捕陈一家的老少。一次，国民党军队进犯黄坑村，幸被黄履锦的母亲等背着陈医师躲入密林，使他免遭于难。陈医师的老家外营村，是游击队的老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该村民众倍加仇恨，一百多位游击队员和村民惨遭杀害，陈医师家也失去三位亲人。几十户人家的外营村，遭国民党军队三天三晚烧劫后，几乎夷为废墟。

1947年冬，国民党迫于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在上层人士饶振澜等的具保下，陈医师和儿子陈培松医生返回县城恢复光复堂药店，继续开业行医。但是祸不单行，国民党县党部曾海澄在陈医师开业不久，生活仍难于度日的境况下，伴作是陈医师的“具保人”，勒索大洋三百。地方上一些流氓和国民党的爪牙抓住陈家是“匪属”的把柄，不时闯进药店“敲竹杠”。国民党派出武装特务进驻药店，监视陈医师父亲和出入药店的人。更有甚者，一次国民党逼陈医师交出大儿子陈培兴。陈医师气愤地说：“报纸已经登了陈培兴已北撤到山东去了，你们有本事就到山东去抓他吧！”他这一说，气得国民党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由于国民党接踵而来的恐吓刁难，致使陈医师精神一度

失常，曾起寻短见之念。但他比较清醒时一想，自己一生为民救死扶伤，没有做过亏心事，对得起乡中父老，死也要死个清白，再难也要活下去。中共地党和游击队知道陈医师处境非常困难，常派同志去开导他，鼓励他。

陈医师尽管处境困难，但他的心始终不渝地向着共产党，只要有来人告诉他“山上有人（即游击队）病了”，他还是秘密地送上药。恢复后的药店，也恢复了原来建立的革命据点和交通站，在陈医师的掩护下一直坚持到解放。

（三）

解放后，陈医师因长期遭受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折磨而体弱多病，表示不适宜工作，但仍被选为县医药工会委员。

他在始兴医药界享有盛誉，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精研医术，处方确当，声誉久著”、“对新医学，悉心研究，深得民望”。县人民政府对陈医师在始兴医术和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敬意。

不幸的是，在土改运动中，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竟错把同中共地党和游击队长期真诚合作的忠实朋友陈医师和他老伴、二儿子视为“地主分子”，进行残酷批斗，致使他们心身俱伤，不幸含冤而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始兴县委按照党的政策，给陈医师一家平了反，恢复了政治名誉，给受到株连的家人也落实了政策。

平反书中写道：“陈培兴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后，其父母弟弟在他影响下，思想是进步的，政治上拥护革命，行动上

是支持革命的”。“陈培兴同志一家为革命做过大量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陈大勋的家庭成份已定为“自由职业者”。对此，九泉之下的陈医师他们会得到安慰。

附：原中共始兴地党县委书记、五岭地委书记、北二支队政委兼司令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华同志的题字和赋诗。

一、为光复堂药店的题字：

解放前地下党、武装斗争主要交通站光复堂。

二、为陈大勋医师的赋诗：

青山此处理忠骨，绿水蓝天伴英豪。

凌阁诸公知了否？阴风夜雨怨魂嚎。

（笔者在革命武装斗争时期，经常活动于八约地区，同陈大勋医师有较多的交往，了解其为人。撰写此文时，得到了李子衡、黄银福、陈培兴以及原常出入药店交通站的交通员张必达、曾昭棠、黄履锦、黄履文等许多同志的帮助。特致谢意！）

把一生献给护理教育事业的陈爱心

黄筱曼

勤奋好学 努力成才

主任护师陈爱心，1912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父亲早逝，家境清贫。1928年就读于佛山循道高级护士学校。1931年获中华护理学会全国高级护士毕业统考优等生奖，开创该校历史纪录。毕业后，留在佛山循道医院工作。她通过在医院的临床实践锻炼，进一步巩固所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大大提高临床护理的实际技能。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独立完成病室护理工作，很快被提升为护士长及全院夜班总护士长，还兼任护校教师职务。

1934年，她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师资进修班学习，考得优异成绩。1935年，任韶关循道医院护理主任，兼循理护校校长，至1949年1月，到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得也母子医院产科班和在伦敦、利勿蒲、伯明翰三大医院学习骨科和热带病学、医院、护校行政管理业务。曾参加英国皇家妇产科毕业考试，在笔试、口试中均获得优秀成绩，荣获英国皇家颁发的毕业证书。

解放后，陈爱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1956年9月至1983年5月长期担任韶关卫生学校副校长。忠诚于祖国的卫生教育事业。由于她通晓护理专业的理论知识，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熟练地掌握护理技术操作，能解决护理工作

中复杂疑难问题，在业务范围内又能阅读英语原文本及能操流利的英语会话，因而有助于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赤诚之心 报效祖国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爱心担任韶关战伤救护队队长，在敌机大轰炸韶关的日子里，她以身作则，不怕牺牲，带领师生投入火线，救出重伤员过百人，及时包扎转送治疗，为救死扶伤作出了贡献。

在战火纷飞，学校转移的艰苦日子里，妇产科医生请不上课，怎么办？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她努力钻研妇产科教材，亲自顶上这一课，统考时全部学生合格，填补了教学课程上的空白。有时在病人的要求下，她亦乐意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手术，在艰苦的环境里不忘为病人解除痛苦。例如有个外国人患了阑尾炎，决定动手术，外科医生在途中被过江艇耽误了时间，未及时赶到，病人十分痛苦，陈爱心不避风险为病人做了手术，大家都很满意。

当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危及祖国安全，党和政府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有位同学邀请留学英国行将毕业的陈爱心到加拿大服务，但她想到：有国才有家，在外国服务不如回祖国服务好，就婉言谢绝了。她于1951年回归祖国。途径香港时，有几间医院拟聘她任总护长，她不贪图高薪与享受，一一谢绝。返回韶关后，在同年六月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任手术队护士长。

手术队被安排在湖南醴陵伤兵医院，陈爱心任手术队副队长，外科手术医生。当时主要是承担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手术，后因转来的伤员不多，陈爱心兼任对护理人员讲营养

学，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受到上级表彰，直至胜利完成任务才返单位工作。

陈爱心，人如其名。她对祖国、对人民、对学生、对病人，都充满一片爱心。为了祖国的护理事业，她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曾经有人问她：“陈校长，你为什么终生不结婚？”回答是：“为了护理事业。护士工作不分日夜，我曾一贯三年当夜班护士长。如果结婚、生孩子，夜班工作就会受影响，牺牲一个人就受益许多人。不结婚对提高学业、专心事业有好处。”

她收了一个养女，人们或许认为这是为了“养儿防老”，其实不然。据陈的养女陈美莲说：她的生母当时因怀双胞胎，产前患病兼难产，产后除我经医院抢救幸免于难，生母和另一姐妹都死去。但所应付的医疗费用甚巨，生父无力支付，只得弃婴逃债。陈爱心便把美莲收养在病房里，稍大即转送普光孤儿院。抗美援朝期间，该院解散，又把美莲接回家中，请保姆照料，直至六岁上学。解放后，在历次捐献运动中，陈爱心都很积极，尤其当年从英国归来，正值抗美援朝，她把自己私蓄的三条大金链（每条两多重）都捐献给国家。

治学严谨 关心学生

陈爱心对医学技术精益求精，对护理、教学工作要求严格，她重视基础医学教育，坚持上好临床诊断基础课。在十年动乱，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她虽被批斗，游街示众，蒙受许多冤屈，但她对抓教学质量，坚不动摇。在五十年代，她按照国家要求，执行苏联教学法，同时吸收英、美教学法之

精华，要求教师提早一星期写好教案，报学科委员会主任批准后才能上课。对新教师，也做到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她亲自参加听试讲，一次不行，提出指导意见后来第二次，二次不行再来第三次，不达到讲课的要求就不罢休。对病房护士亦强调：带实习学生要手把手地教，学会了还应放手不放眼，以防事故发生。她针对社会上“重医轻护”“护理工作低人一等”的错误思想，在新生入学时就注意抓好巩固专业思想教育课。她常说：“三分医，七分护，一个高明的医生诊断对了，手术做成功了，如果护理失败，或是打错针，发错药，就会前功尽弃，给病人带来痛苦或导致死亡，责任多重啊！”她不管白天黑夜，亲自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许多学生都讲：我们对陈校长既害怕又尊敬，学业上不敢偷闲，上夜班也不敢偷懒，老老实实地去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有位同学输血搞错病人，差点出事故，她指定要补习三个月，让学生都记着：在关键时刻不要出差错。凡有一科不合格的学生，亦要坚持补考，合格后才能发毕业证书。她对学生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经常深更半夜到宿舍和病室巡查，替学生加衣盖被，亲如子女，有个少数民族班的女学生，因家庭问题受刺激，患了精神分裂症，为免生意外，陈校长不计较少数民族与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把学生接来和养女一起挤在一所十二平方米的狭窄房间里监护起来。病人由于得到及时的护理与开导，使这个女学生几天后病情缓解并能上课，未耽误学业。这位学生现已成为韶关医务界的骨干——在粤北人民医院任烧伤科主任。对出差错、犯纪律、受处分的学生既严厉批评，严肃处理，又倍加关心。学校地处北江边，为防止犯错误的学生发生意外，就指导班主任要特别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共同做过细的思想教育工

作。俗语说：“严师出高徒。”陈校长教导出来的学生在技术上、医德上都表现较好，有些成为省、市大医院的护理骨干。有位曾在陈爱心已退休后的韶关卫生学校读书，现在香港定居的学生说：“假如我的毕业证书签有陈爱心校长的名字就好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这是陈爱心治学严谨，受人们信任的反映。今日卫校和医院有些讲师和主管护师也还说：“我们的好方法、好作风，是从陈校长那里学来的。”

把一生献给祖国的护理事业

护理工作是医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精湛的艺术。为培养高尚于平凡的护士，陈爱心无私地奋斗了一生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她常说：“我一生可以自豪的是：热爱护理专业，坚守护士岗位。”“削弱护理工作，就必然影响医疗质量，对病人不利。”她关心护理建设，早就建议国家创办“护士大学”，用更高的标准培养护士人才。

当陈爱心留学英国，获得产科毕业证书回国后，由于工作需要，领导多次动员她放弃护理工作，改行当妇产科医生时，她考虑到：“我是护士出身的，自己一改行，就会影响一大片，会动摇护理人员的思想，会削弱医疗工作的力量。”为了稳定护士队伍，安心本职工作，她多次拒绝了领导的好心要求，不转行当医生，仍然坚守在护理工作岗位上。

在临床工作上，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配合医生抢救过不少危重病人。在术后护理中，发现手术有问题时，敢于向主刀医生提出改进意见，使病人转危为安。年青医生在术前参阅资料，手捧英文版的产科学向陈爱心请教时，她都是热情和耐心的指导。在教学工作中，也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

验，无保留地传授出去，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由于陈爱心对病人有高度的同情心和工作责任感，勤于巡视，密切观察，往往及时制止了一些危险事故。一次，有个近视眼的学生看不见酒精灯仍亮着火光就去加酒精，当酒精瓶惹火行将爆炸时，被陈爱心及时发现，立即扑灭了。又由于她勤于巡视，还制止了一个病孩险些坠楼丧命的事件。原来二楼病房有个高热、神志模糊的女孩，避开了疲乏瞌睡的妈妈，离开病房，爬上栏杆，在正要往下堕落的危急关头，被陈爱心发现及时抢救了。孩子的母亲万分感动，认为陈爱心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对护士工作肃然起敬。后来送孩子读卫校、当护士。母女常来探望救命恩人哩。根据陈爱心的业务水平及工作表现，1979年被晋升为主任护师。

陈爱心1983年5月退休。她一生奋斗在高尚而又平凡的护理教育岗位上，一生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人民亦给予她崇高的荣誉。她从1956年开始当选为韶关市历届人民代表、韶关市和广东省的历届政协委员。又是广东省护理学会理事、委员，韶关市护理学会理事长，现任韶关市卫生局技术顾问。1986年，陈爱心的事迹被载入《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

桃李满天下

陈校长一生致力医院护理管理和护理教育五十余年，培养了近4000名中级技术人才，其中护士1500人。所培养的学生广布于国内和海外。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起着救死扶伤、维护人民身心健康的作用，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每逢临近圣诞、元旦佳节，陈校长收到不少从美国、英国、加拿大、香港、澳门工作的学生寄来的圣诞卡或贺年片，亦收到国内学生寄来的慰问信。大家都感谢她教育之情，祝愿她健康长寿！

· 一位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陈琼香，知道陈校长患病，为感谢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来源中断时支援过自己，才不致于中断学业和沦作难民，1985年专程从美国归来探望她，表达了师生友好的情谊。

（作者黄筱雯，系原韶关卫生学校政工干部，
现已退休）

解放前韶关市私立医院、个体诊所 调 查 表

张汝开 (整理)

一、私立医院、西医个体诊所

医院、诊所 名 称	地 址	成立 时间 (公元)	病床 数 (张)	工作人数					备 注
				医 生	护 士	助 产 士	药 剂 生	调 剂 员	
曲江循道医院	韶关市西河尾	1914	10						为英国人 创办, 开 办时有职 工10人。
博爱医院	韶关市风 度北路	1924		2	1		1		
曲江救济院		1935.8							内分养老 教养育婴 三所
谢淑英 保产留产诊所	韶关市河西 豆 粉 街	1926.3		1					
苏自新诊所	韶关市民权路	1934.3		1					
潘永和诊所	韶关市风度中 路33号	1934.2		1	1				诊疗业务
陈尚智诊所	韶关市风采路 16号	1934. 11.		1	1				皮肤花柳 科
刘洁心诊所	市风度公园前 135号	1940.5		2					妇产、儿 科业务
袁富海诊所	风度中路 平治巷	1937.9		1					内儿科
李国辉牙诊所	风采路16号	1940.5	1	1					技术员 1个
刘定云牙诊所	风度中路 249号	1938.5		1					

诊 所 名 称	地 址	成 立 时 间 (公 元)	病 床 数 (张)	工 作 人 员 数				备 注
				医 生	护 士	助 产 士	药 剂 生	
李宝衡 牙诊所	仁爱路 46号	.1915.5	1					
肖敬之 牙诊所	仁爱路 65号	1926.2	1					
李华生 牙诊所	风度北路 127号	1940.6	1					口腔齿牙科
曲江健 留产所	风度北路 中华街		4	1				主管人：李群英、 麦爱群
博爱疗 养所	风度北路 公园前	1944.3.	1					主办人：温俊略、 门诊留产业务，护 士兼助产士
蓝天诊 疗所	东堤路	1949.6	1					
邓国光 诊所	建国路 13号	1949.7	1					诊疗急救业务
林少雄 诊所	风度中路 239号	1949.7.	1					门诊诊疗业务
黄明藻 诊所	风度南路 88号	1946.5.	1	1	1	1		门诊业务
民众医 社	忠信路 48号	1944.11.	2	1	1			主办人：邓君侠 内科产科业务
自强诊 疗所	忠信路 42号	1945.1.	1	1	1			主办人：李德兴 内科留产业务
志德诊 疗所	和平路 14号	1949.6.	1	1	1			主办人：王志庵 门诊医疗及接生业务
林秋园 诊所	风度南路 44号	1946.7.	1					内科门诊
袁涤山 诊所	风度中路 179号	1945.10.	1					诊疗业务
袁一立 诊所	南韶路 7号	1949.3.	1					诊疗业务

诊 所 名 称	地 址	成 立 时 间 (公元)	病 床 数 (张)	工 作 人 员 数					备 注
				医 生	护 士	助 产 士	调 剂 生	调 剂 员	
卢杰增 诊所	风度中路 58号	1945.10		1		1			门诊诊疗业务
卢放中 诊所	风烈路 151号	1941.1.	3	1	1	2			医疗及救护工作
卢日新 诊所	风度北路 21号	1947.4		1	1				诊疗业务
仁爱诊 所	风度中路 177号			1		1			主办人：苏志良 妇产科、儿科业务 (留产房四间)
吴超良 诊所	风度南路 106号	1947.2			1				诊疗业务
济民医 社	风度中 路1号	1941.10		1	1				主办人：潘济民 内、外科业务
雷仲平 诊所	中山路 25号	1947.2.		1					内儿、皮肤花柳、 普通外科
大众医 社	风度北路 公园前 141号	1949.9.		1					主办人：李宝钟 业余门诊
卢鼎新 诊所	仁爱路 40号	1947.3.		2	1				医疗及救护
杜绍庭 诊所	仁爱路 55号	1945.9.		1					统理内外全科
骆星云 诊所	中华新 街34号	1943.6.		1					
李牙荫 诊所	民权路								医学会韶关分会卢 杰增同志提供资料
曾惠欣 诊所	风度北路 121号2楼	1945.9		1					

二、中医个体行业

姓名	地址	执业类别	备注
*李仁溥	中信路口风 度横脚	内科坐堂	采芝堂药材铺
*江汉歧	民权路	内 科	永盛药材行
*李家任	民权路	内科坐堂	同兴义药材行
*邹宗贤	民生路	内科坐堂	
黎鉴谱		内 科	
*杨庆麟	风度中路	内科坐堂	福和堂
*邹庚福	民权路	骨伤科	
*邹镜波	民生路	骨 科	初办在英德连江口，后在 韶关市开业
*叶汉臣	西桥街	内 科	
*莫镜中	“青石街”	皮肤疮疡科	
*温学圃	解放路	坐 堂	
邓爽秋	北门	内 科	
*李郁清	南门	内科坐堂	
*欧文兴	南门	内科坐堂	
*张溥天	风度路	内科坐堂	保元堂
*侯亦华	南门	内科坐堂	万福堂
*马学新	风采楼脚	内科坐堂	
*邓超常	风度中路	内科坐堂	福和堂
*曹鼎荣		内科坐堂	
*孔晓云	风度南路	内科坐堂	赞元堂

姓 名	地 址	执业类别	备 注
*谈伟雄	民族路	骨 科	自搭木屋开业
*宋保仁	东堤中路	骨 科	少达子
*黄均荣	现市委后面	中医眼科	自搭木屋开业
*彭启汉	北 门	内科坐堂	
*杨韶森	风度南路	内科坐堂	
*伍剑飞	四庙街	骨 科	
肖景岳	民族路	内 科	
*黄玉珍	东河坝	内科坐堂	
*黄惠良	民生路	内科坐堂	惠和堂
白如天	风采路	坐 堂	天生堂、解放时迁香港
*李春园	亚魁里巷	内 科	先在亚魁里巷执业后在保元堂坐堂
*丘志中	南 门	草医杂症	
*甄 良	九成路	骨 科	
*詹少康 詹益康	忠信路口	骨 科	父子俩
*朱子然	南 门	内 科 (花柳性病)	
*谭小邦	风度路	内 科	仁和堂
*魏韶康	西桥街	内科坐堂	
*魏勃全	西桥街	内科坐堂	
范德有	西桥街	内科坐堂	六和堂
*范少威	豆粉街	骨 科	
*叶应科	南 门	内 科	
*李抱真	风度北路	针灸杂症 坐 堂	公信药材行(为韶关市第一位搞针灸的中医师)

姓名	地址	执业类别	备注
*刘树生	民族路	草医杂症	
*何文俊	武江南路	内科坐堂	
邓汝良	北 门	内科坐堂	
*黄志光	风度南路	内科坐堂	
*蔡直庭	忠信路	内 科	
*黄初富	南 门	草医杂症	
黄崇邦	西桥街	内科、骨科	
*黎则民	风度北路	内 科	
叶静波		游 医	

注“*”表示此人已故

有关资料来源说明：

1. 私立医院及西医个体诊所资料来源于市档案馆。
2. 中医个体行业资料由韶关市中医院骨科主任、武江区人大代表谈吉兆同志根据笔记记录材料提供，可作参考。

在韶关青年会的国际友人骆爱华

谢琼孙 王以敦 邵明耀

基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骆爱华，在广州服务的西方干事中，历史最久。他在1919年初来，1951年最后一次回美。每来几年，又回去几年，前后共34年。一般西方干事在华工作，是顾问性质，辅导会务。骆爱华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青年会总干事李应林，对其母校临危受命，重返岭南大学任校长。青年会董事会为适应当时情况，接受李的建议，由骆任顾问、总干事，顾理内部，对外由会长潘聚东出名，这期间，实际由李应林遥领。

从1937年“七七”起，骆在华工作有突出表现。由于他组织了居留广州的外国人，成立广州“外侨对华正义会”，任秘书长，办事处设青年会。其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神甫、教育界、工商业者，以及其他各界还有二、三十人。皆响应参加这一组织。骆发动他们，将其亲见亲闻的日军侵华罪迹和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笔之于书及其照片，出版英文刊物，作为《广州青年》号外（此刊经内政部立案、中华邮政特准认为新闻纸类），遍寄各国，以揭发日本侵华暴行，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要求各国制止日本侵略中国。此一义举，影响甚大。不仅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拥护，各国人民亦深为赞许，作出正义反应。除居留广州的外侨外，居住香港的外侨，也写来日军侵华证据，寄来正义会发表。其时，广州外侨前来青年会同骆工作的，几乎络绎不绝。外国人到青

年会之多，前所未有。“骆爱华”名字，蜚声雀起，是始于这段期间。

广州沦陷前十天，骆偕同李应林、谢恩禄牧师（青年会创办人之一，原为副总干事，沪战回穗任青年会名誉干事）旅行罗浮山，途次，骆患急性盲肠炎，转港抢救，幸获医治。病后返美，其时广州已沦陷个多月了。

骆于1940年秋再度来华，参加韶关青年会工作，仍以顾问、总干事名义负责会务。骆抵韶后，中国老朋友纷来探望，称为“国际友人”。省府主席李汉魂还设宴欢迎。席设省府招待室竹棚。室内四周无物，独挂锦旗一面。这锦旗，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在南浔线随同李的部队服务时赠给他的，是一面光荣的旗帜。它代表着后方民众向前方守土卫国的战士致敬、慰劳的象征，反映了李为国效忠的战功。招待室独挂这面旗迎接美国贵宾，表明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也表明它同青年会有着并肩作战的关系，意义是重大的。同席的有随青年会随军团首次随同出发江苏东战场务服的香翰屏将军，有省府胡铭藻、黄麟书、黄元彬三个厅长，有保安司令邓坚白、省府主任秘书张尔超等。青年会由干事谢琼孙陪骆赴席。之后，骆为青年会事，常拜访李主席，并同广东省战时儿童教养院院长——李夫人吴菊芳有所联系。

骆在韶五年，工作积极，有较大献贡，主要有下列诸端：

（1）由他向英美教会联合援华会领来赈款，办理各种救济事业：1. 先办归侨服务，在东、西、北江设服务站，为香港沦陷后进入内地的侨胞作行旅上的服务，并建筑归侨宿舍。2. 继在韶关成立战时救济会，为入内地生活有困难的作救济，并代转赈款给广东各地分会。其次，以转款数增大，另组广东国际救济委员会。3. 同青年会全国协会联

系，恢复办理学生救济。4。韶陷前夕，骆交给青年会钞票及药物各四箱，由青年会办理“枫连线”（曲江枫湾连平）的疏散救济，等等。

（2）由骆出面，商得浸信会西教士山德士将其在公园前的大片地方及楼宇，交给青年会使用，成立公园前工区，开设能容三百学生的职业学校，并将一半地方给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使用，兴建礼拜堂。

（3）同女青年会加深合作关系，接受其派来两位干事一李季琼、陈姬，参加青年会干事部工作。

（4）同香港会督何明华合作，接受其派来牧师许碧璋，在坪石设立学生服务处，为该区的“中大”各学院及“岭大”农学院的学生服务。

（5）青年会在韶举行三届会友征求运动，邀请余汉谋任名誉队长，李汉魂任总队长，发动各界知名人士任队长，使征求会员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成绩，以支持青年会战时事业经费（救济费不在内）。

（6）在骆的影响下，军政界及社会各界人士对青年会的赞助更为踊跃，为群众服务的工作更加发展，表现在各部门事业中。

（7）青年会办的国际联谊社在韶恢复活动。

（8）由骆以青年会华南区干事名义，召集粤桂湘赣四省青年会，举行总干事会议凡三次，一次在韶，二次在南岳。

（9）骆受英国领事馆委托，顾理香港政府来韶的人员，并予以救济。

（10）对教会及教会学校内迁，予以支持及资助。

（11）由骆向青年会董事会提议，聘请原干事王以敦为

总干事，提升干事谢琼孙为副总干事，以继续青年会五年来未有由中国人任总干事的系统。这也是骆这次来华的一个任务。

(12) 1944年韶关疏散期间，骆留韶有三个月，除周末外，每晚在青年会举行时事报告会，引起群众踊跃参加。这个演讲会开得很特别，不需青年会人员办理，也不需事前作准备。够钟了，群众自觉开门入会场、开灯；讲完关门、熄灯，每晚如是。成为别开生面的演讲会。这也反映出骆的工作极受群众欢迎。

骆在中国数十年，一向同情中国社会，喜欢同中国人做朋友，是名副其实的“爱华”。他对工作不辞劳瘁。养成有中国人一样的生活习惯。常骑单车到几十华里的龙归等工区察看。由于他同“岭大”农学院院长李沛文（留学美国）是好朋友，当偕同谢琼孙去广西视察时，道经桂林，特去拜访了李的父亲李济深。韶疏散期间，李曾建议要物色一个比较适宜的地方，以作疏散的准备。后由青年会董事潘允和陪骆同去枫湾察看，其后即选定了“枫连线”，作为疏散救济的主要地点。

1942年间，骆来华务服25周年，韶关的老朋友们为骆氏夫妇举行庆祝晚会。当晚，在黄田坝随军团团部草坪举行。到会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几对夫妇。晚会由李大超主持。大家席地而坐，在月白风清之夜，前临武江流水，谈笑风生，充分表现出中美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大家对骆氏来华服务的一片热忱，表示敬意。至今事隔四十余年，而骆氏辞世亦已三十多年，往事依稀，令人怀念。

骆于1947年再度来华，1951年返美，此为他最后一度的往来。回美前，他亲眼看到广州解放情况，写报告及将照片寄

给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回美后，又四处演讲广州解放情况。1956年《麦卡锡法案》通过后，骆被怀疑为亲共分子，不准其演讲，也不准其离开寓所若干英里。骆很气愤，郁郁于怀，竟于次年（1957）逝世。1986年骆的夫人携同儿女及外孙来广州，探望青年会老朋友，备受欢迎。

利玛窦在韶州

梁观福（整理）

利瑪竇生平簡介

在韶州传教六年的利玛窦（MATTE RICCI），1552年10月6日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城。父亲是职业药物家，曾一度担任该城总督，他16岁中学毕业后，在罗马日耳曼大学学法律，但中途放弃法学，于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在该会主办的罗马学院攻读哲学和神学，并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学习天文学、应用数学、地理等。罗马学院毕业后，于1577年到东方传教。1582年抵达我国澳门，一直居留在中国进行传教等活动，长达27年之久。其中澳门一年，肇庆六年，韶州（今韶关）六年，南昌三年，南京一年，北京十年。1596年起任耶稣会中国教区区长。1610年5月因病死于北京，终年58岁。死后，明神宗赐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1966年利氏墓地在“文革”时被捣毁，现已修复，为北京历史文物之一。

利玛窦在华期间撰写和翻译的汉文著作，据统计共有19种之多。对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以及思想、语音、美术、音乐、学术等都有重大的影响和贡献。他与我国数学家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六卷，介绍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成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开始。利的《明末罗马字注音

文章》，在五十年代，我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还重新再版，并指出：“这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他在晚年撰著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对研究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韶州居留六年

一、择地建教堂

利玛窦于1583年到肇庆传教六年，1589年8月，偕麦安东神父离开肇庆乘船由西江经三水溯北江而上，八天后抵达南华寺。受到当地官员、方丈欢迎。利初拟在寺的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造房居住，当地主人不敢作主，便陪同他们前往韶州城。

利玛窦拜访了韶州通判吕良佐，并述说在南华寺不适合他们说居住的理由：我们不信奉偶像，只信奉天和他的唯一真神。说我不想栖身梵刹。由于利玛窦不仅懂得中国礼节，又懂得中国语言，深得官员们的好感，因此同意他在河西的光孝寺先住下来，再找建筑教堂地点。吕良佐还派一名胥使照料利等人。利要求在光孝寺旁边空地建堂，吕答应他的要求，并要他按当地管理土地的规定付80银元把地买下来，用书面报告总督申请建筑教堂。不久批准了他使用土地所有权。从此，利等就着手修建住宅。韶州，从此成了利等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二个立脚点。

利玛窦定居韶州的消息传到澳门后，耶稣会总视察员即指示利玛窦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传教中心。同时把第一批在澳门接受入会并受过教育和培养的钟鸣仁、黄明沙（均为中国人）派往韶州协助修建教堂和工作。很快一座中国式的一

层楼的住宅，就建起来了。接着又在附近盖起一座比较宏大的教堂。

二、社交活动

利玛窦在韶州居留期间，注意到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从他们中选拔的，是实际的掌权人物。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是开展传教活动的关键。因而想方设法同他们结交，使他们得以在韶州立足和从事传教活动。

利玛窦第一个结交的是韶州府官员吕良佐。吕成了利的好“好朋友”，利直言不讳：“每逢有事，吕总是很慎重处理他们在韶州的事情。”由于利玛窦同韶州府官员友好，府属辖的县官有曲江、南雄、英德亦与他结交。南雄知府王玉沙“一见利子，深相爱慕”。利氏歿后，王还为利撰写《钦救大西洋国土葬地居舍碑文》，这是一篇最早关于利玛窦事迹的汉文传记资料。

利玛窦因与中国官员的交际，亦提高了他在韶州的声誉，不论是本省，还是从外省来的官员，他们来韶都要去拜访利玛窦，这为他开展传教活动，创造了条件和得到了保证。对此，利玛窦直言不讳：“有了这些达官贵人作为保护人，事业得到了发展，困难也减少了。”

三、传播科技

利玛窦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当然不是他的根本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最关心的是基督。”但是，利玛窦在华传播科技，可说是他在华活动的重大影响和贡献。

利玛窦在韶州期间，为传教服务比较系统地向上层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并首先接受这些知识的是瞿太素，也就是利玛窦入华后收下的第一个学习西方科学的学生。瞿

太素是江苏常熟人，是礼部尚书瞿文懿公景淳长子。利说瞿太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败家子，有天才，由于沉于炼金术，家产花光，到处流荡。1589年，瞿太素去肇庆找朋友刘继文和同乡黄时雨时认识利玛窦。当时利在肇庆是逆境，和瞿几乎没有交往。后来瞿太素听到利已到韶州，立即赴韶州找他，并奉送贵重礼物，要利收他做学生，教他炼丹术。后来瞿太素知道利并不是炼丹术士，又在利玛窦的教育下，才转向学习西方科学。

利玛窦开始教瞿太素学习算术。又教瞿学习克拉维乌斯的天球仪和《欧几里得几何》。

瞿太素对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很努力，成绩也很显著。他通过学习，能够绘制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还能用图表示装点他的手稿，那些图表可以与最佳的欧洲相媲美。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利玛窦传授的算术与几何新知识，瞿太素或是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是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它们译成通顺流畅的论文，传给他各地的朋友看。由此可见，瞿太素是较早接受并翻译西方笔算方法和《欧几德里几何》的中国人。他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在南京还被利玛窦当作教材使用。随着瞿太素的译本在各地流传，利玛窦数学家称号，也到处扬开。

四、传教活动

传教，是利玛窦入华的目的。利在韶州的传教活动，与在肇庆相比，其传教的策略方法不仅有所发展也有不同的特点，传教的范围和成效也有一定的发展。

利玛窦在韶传教期间，来自澳门的外国传教士共达四十余名。

利玛窦来韶传教站稳脚跟后，为使整个传教事业的成功不依赖于单独的一个据点，就计划要在别的地方开设教堂，开展传教活动。他不仅注重在韶州府治范围进行，附近的曲江、南雄、英德、乳源等县，也留下了他们的传教足迹。其中曲江和南雄较为突出。如在曲江马坝开辟新传教点，三年中发展入耶稣会的信徒增长到300名。在城北的靖村入会的信徒达100余人，还组成有执事常务会，并修建了一座教堂。后来，信仰逐渐渗入附近的村落。1592年2月利玛窦应瞿太素邀请去南雄宣传基督教教义。受洗入教有10名。

据不完全统计，自利玛窦到韶州至他走后的几年内，入教人数达，700名之众，同肇庆仅80名相比，增加了很大。

印发教理书是利玛窦在韶州进行传教的一种方法。在韶期间，利玛窦和其他神父们都比较注意利用印好的《天主教要》和基督教手册进行传教活动。他认为：“基督教信仰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

争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也是在韶州传教活动的一种方法。利吸取在肇庆时的教训，到韶州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于与当地官员交结，不忙于传教。获得当地官员作为保护人。首先站稳脚跟，再开展传教活动。

在传教方法上，利采取汉化策略，在韶州时重用华人信徒，为他们传教服务。明末华人最早皈依天主教的钟鸣仁和黄明沙，奉派遣来韶州帮助利玛窦传教活动，就做了不少工作。在华人缙绅当中，利氏重用的是瞿太素。利瞿两人共事两年，瞿既是利的得意学生，又是他的得力助手，在各方面都给教会以很大的帮助。既做了耶稣会传教的鼓吹者和耶稣会的保护者。

利玛窦在韶州传教的汉化策略，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也

逐步深化。他在韶州通过官员和士大夫交往的实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也不断加深，使他逐步发现和认识到，他们在肇庆时采用的剃发剪须，披袈沙，取僧名的佛教习尚，在社会上地位是低贱的，不能被中国人尊重；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士为四民之首，儒生是中国占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儒为荣的思想。还特地把自已的姓名马太奥利奇，改为中国的姓名利玛窦。又在瞿太素的建议下，经澳门当局的同意，决定取消“僧”名和“寺”名，按儒者装扮，留须蓄发，穿丝服，适应“中国国情”，使传教活动，得到很大进展。

通过传播西方科学的知识，也是利玛窦在华传教的一贯策略方法。也为他本人在韶州赢得了声誉，使传教活动得以顺利的开展。

教会在韶关设立的学校

民国八年（1919年），美国基督教循道会在西河创办英光学校，德国基督教巴陵会在德华女子小学附设盲女学校，意大利天主教会孝悌路创办励群学校，兼办皮鞋厂，美国浸信会在东河坝创办普光学校，兼办孤儿院。

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仁化云龙寺塔

张树棠

云龙寺塔即西山寺塔，位于仁化县董塘镇西北3公里安



岗村的后山窝中，塔东南距云龙寺50米。寺庙旧称西山寺，清代更名云龙寺，塔也因此得名。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重建西山古寺碑记》中所载：“宝塔峨巍，上载乾宁之号，断碑始迹，中书光化之年”。塔下曾出土唐代青灰色滴水和莲花瓣瓦当，可见此塔乃是唐昭宗乾宁至光化年间（公元894~901年）所建，是有绝对年代可考的一座晚唐古塔，1979年已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

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塔为四角五层，斗拱檐平座楼阁式实心砖塔，外貌完好，高10.4米，方位337°，方型的须弥塔座中有一个锥形小室。塔身第一层等边宽2×2米，各层每面设一个壶形佛龕（假壶门），排列在正中成一直线。有砖砌倚柱、额、枋、斗拱，转角用三个一跳华拱，第二层以上则用一个杪斗。

第一层高2.1米，在1.35米高的斗拱之上横铺平砖、菱角牙子砖三层叠涩出檐，第三至五层叠涩两层出檐。檐短浅，檐之上为叠涩须弥平座，平座高窄。反叠涩四注攒尖顶，无塔刹。

塔身第一、二层大小相仿，三至五层大小相仿，与一、二层稍小。全塔用34×16×5厘米的红和灰色夹心砖膏泥砌筑而成，表面残留的灰浆批荡乃明代重修时所加饰。外型虽不雄伟壮观，其粗肥古朴、造型独特，却是唐代方型砖塔的典型特点和风格，对研究唐代佛教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是研究唐代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

附：《重建西山古寺碑记》

“城西三十里许，古之有寺，曰西山。何耶？西山若有西竺之国，瞿昙之地，惟明帝时，于此皈心象教，此境古今，名为西山，乃天下之名山。潼阳之□□□，宝塔峨巍，上载乾宁之号，断碑始迹，中书光化之年。金带前湾，一流清秀，左有灵迥回拱于左，右□伸蛇蟠环于右。云蒸贵地，神灵阴佑。于此采芳，心诚□□，□施于世，招提久倾，古基遗在，正德丙寅岁（公元1506年），会首谭质鲁□□□住持僧了□□□缘，鳩工重建。

注：《广东文博资料》1963年第一期载：“云龙寺塔建于唐乾宁至光化年间（公元894~901年），是我省新发现的

另一种唐塔的塔制，外型粗肥，富有唐风格，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附注：“□”是指碑内缺字未经考正。

（本文片为江军撰）

基督教的分支与分布

料小 世界有三大宗——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我国习惯称
·资 回教）。

基督教自公元一世纪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产生二百多年以后，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这一派别最大，世界各国信仰天主教的人数约有四亿。分布的国家主要是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

“基督教”是个总的名称。它分为三大派，除天主教外，还有“正教”、“新教”。正教的主要国家是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等国。“新教”又分许多宗派：如：长老会、圣公会、浸礼会、公理会等，主要分布于英、美、德、瑞士、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天主教，曾于元朝和明末两度传入中国；新教于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而传入中国。《圣经》是基督教各派的共同经典。（靳）

南雄三影塔

庄礼味

南雄三影塔（即延祥寺塔）。在《直隶南雄州志·古迹》中载：“延祥寺中世传祥符二年乙酉（公元1009年）异



人建。塔其影有三，因立“三影堂”。其影阴晴俱见于壁间，二影倒悬，一影向上。见于厅堂间则吉，见于房室中则凶，今不存。”因而称三影塔。其塔第三层壁间刻有宋大中祥符二年，建筑年代确实。

塔的来历怎样呢？

明大学士邱浚，海南琼山人，曾为塔作过《延祥寺浮图记》云：“延祥寺在南雄府东二里，宋大中祥符间僧祖善始建也。寺有浮图，盖自孙吴，时僧康会创于金陵（南京）始·及晋南迁，重加修饰，天下傲而为之。于是下至偏州

小邑，无不建立以为标表焉。而延祥寺之有，相传为异人所创。子闻西竺氏之教法派，相传凡二十八代至达摩始至中国。又五传至卢能而止焉。其始也达摩自南天竺浮海至广州，祝发终于曹溪居焉。遂不复传，是则禅教之兴，始终毕在于岭南，而雄郡乃岭南往来必由之道。而寺适当其冲，而浮图在于是焉。谓异人之建，虽不可必要之不能无意也。募缘重修者寺僧智广主其事。千户谭以聪兴工始，景泰乙亥（公元1455年）八月毕工。寺之先后修建，不与浮图者。兹不载。”此记石碑本树于塔前，今无存。

“寺右一塔，高拾丈许，每风起，铃铎之音，宫商迭奏。长老传言：塔影靡定，时见居民家，其家辄勃勃兴。”塔后余地，旧为旷芜之地，后来在此地创弥陀殿。据群众反映，佛殿塑铸有丈六高法象叫指贰大师（俗称接引菩萨）左又有善才童子，右有韦陀菩萨。建国初已废。

《直隶南雄州志》载：“雄州太子庙各街坊皆有。相传梁昭明太子至止受经于傅大士，始兴有书堂，后尝显灵，郡中因庙祀之，每岁端阳，出其神，以遣瘟疫。”由此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南朝时候，梁武帝肖衍的长子肖统，曾经隐居于始兴的傅大士那里读书。有一年，始兴、南雄疫病流行，死人甚多。肖统为了治病救民，奋起追瘟，从始兴追到南雄的瑞应山（即延祥寺塔后旷地处）。见到一只貔貅，便捉住它，斩去它的角，磨水给民众治病，这样，很快扑灭了这场瘟疫。百姓得了救，但肖统却染上了疫病，在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日病亡了。历史与传说并不一样，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性情温和心地仁慈的太子，便在瑞应山前建了一间延祥寺来祭祀。到了宋代建塔时候，又将陶制貔貅在檐角顶，寄以祛灾托福之意。

这塔历史上重修有五六次，但史志记载的仅有明正统丙寅（公元1446年）重修《金氏通志》，和千户谭以聪兴工于景泰乙亥（公元1455年）八月毕工。根据1981年再次重修时，发现塔身批荡的沙灰有五六层，可能历来有大修小修之分，大概每百多年修葺一次。

清朝时曾修葺过，原建筑物第九层的顶层有如帽顶的红柱绿瓦画栋的清朝建筑的气派。谁料多年来，三影塔饱经风雨，数遭雷击，塔顶早已倾斜，但因基础坚固地心引力关系而未全倾倒，原塔身有如光棍没有栏干，且残破不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经常来炸南雄，塔顶层设置警钟，为防空警报。三影塔历经沧桑。1981年南雄县人民政府开始重修。前后化了三年时间。第一阶段，1981年至1983年，只修塔身，得到广东省华南工学院古建筑专家副教授邓其生的绘图设计与指导，以恢复塔的真面貌，所以一层一层用钢筋水泥加固塔心以修补加固原有建筑为主。原三影塔六角九层，全高四十二米，重修时撤掉顶层的清朝建筑，全部仿北宋建筑，再加上仿宋代贯珠形铸铁塔顶，并设置有一鍍金铜葫芦，现竟高达五十多米（不包括新设的避雷针）。第二阶段建附阶，先后将近一年时间，1986年竣工。宝塔低层有附阶，各边宽5.5米，有巨大木柱，附阶瓦檐置木斗拱一米多长。宝塔身直径为7.95米，加附阶周围直径宽18.95米。塔身向上伸延逐步缩小，最高层塔身直径4米，加上周围栏干为七米。现在以上八层都加固栏干为赤浆色木栏干，塔身以前只用黄泥浆批荡。现在塔身内部全面用钢筋水泥沙浆加固，用石灰批荡。砖、瓦、瓦当都采取仿宋色彩。塔身外面全部不批荡而显露出青砖色，保持北宋建筑本色。

三影塔的塔身每层都伸出飞檐和栏干，每个檐角都悬挂

着一只小铜钟，上八层共四十八只小铜钟，小铜钟附近有木雕龙首，加上附阶屋檐的龙共五十四只；每条脊顶的端部各蹲着一只酱红色的陶貔貅，加上附阶层檐顶的六只貔貅和以上八层共五十四只貔貅。貔貅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形状似虎，毛色灰白。古人常用来作为军队的称呼。而这里的貔貅就是与肖统太子有关传说中的动物再现。三影塔是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保持着古朴的宋塔。

该塔的修葺已于1986年全面竣工。资金的筹集，得到澳门同乡卢道和先生捐助人民币十六万元，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支持经费十六万元，广东省文化厅支持二万元。先后共集资三十六万元。1985年8月2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把这塔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学者葛兆光曾于《人民日报》载文论述“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说禅宗的传入，以及当时士大夫到君主及至平民百姓，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遗存的，从民族心里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观念形态，艺术形色创造的不断生成积淀，整合来展示禅宗这枝花穿在中国文化的木本上，成活开花结实的全过程。南雄三影塔九百多年来的巍然矗立，可以从物理学力学和禅宗艺术价值去研究禅宗融入中国文化。它对现代的高楼大厦的建筑颇有借鉴之处。

三影塔为南雄州名胜古迹之一，古今诗人墨客留题不少，现摘录数首以共飨：

明南雄州人，提举陈进作“阴晴塔影”七律一首：
浮图千尺起层层，半入虚无看不明。
月转黄昏移玉树，露垂清夜滴金茎。
觚棱直压花阴重，斗角横铺水面轻。

几度攀缘登绝顶，倒身翻与地相平。
 清南雄知州戴纶咏“三影塔”五绝一首。
 古塞宅神仙，浮图留幻景。
 谁能作记来，不愧展三影。

1983年9月间一批书法家来南雄，其中原广州师范学院院长、诗人、书法家潘佛章登临新修的三影塔吟诗曰：

浮图三影旧相传，依样重修胜昔年，
 为览雄城新气象，登临直上最高层。

如今南雄三影塔包入在南雄博物馆处，馆内还设有恐龙化石的展览。可供人们参观游览。（本文照片为欧阳克兴摄）

本刊第12辑勘误表

页	行	错	正
目录1页	15	支店生活琐忆	支店琐忆
目录2页	19	资资	资料
37	3	租数十亩	买数十亩
37	倒数1	樟脑社从投产到结束	(此句应删去)
131	6	林燥如	林灿如
131	13	在在	在地
132	4、10	燥	灿
186	(铭曰)	灵，星，亮，生，	灵·星·亮·生。
186	倒数3	词	祠
190	倒数5	《侠粤日记》	《佻粤日记》
191	4	“风度淮岩”	“风度维岩”
193	4	疗	廖
193	倒数2、3、4	扬	杨

韶关市政协第六届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任：饶纪寰

副主任：张冠祥 徐志滨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斯德 刘礼芳 黄日有 蔡宗魁
蔡洁芳

《韶关市文史资料》编辑：

刘平 饶纲钧 谢君豪

封面设计：黄安仁

封面题字：柳 倩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三 辑

韶 关 市 粤 北 印 刷 厂 印 刷
广 东 省 非 营 利 出 版 物 准 印 证

89 粤 印 准 字 第 096 号

邮 政 编 码：512002

工 本 费：2.00 元